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20—40年代改良旗袍与上海社会

姓名：初艳萍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洪煜

20100301

20 世纪 20——40 年代改良旗袍与上海社会

摘要：改良旗袍是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上海社会的女装样式，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渐渐淡出当时妇女的日常穿着。改良旗袍成为近代上海妇女社会地位及时尚变化的历史记忆。清末，经过长期的统治与漫长的社会变迁，满族妇女的旗袍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代表上层高贵与典雅的服饰，这种符号化的服饰语言的形成是近代旗袍复兴中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近代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为改良旗袍在上海复兴提供了条件。改良旗袍不仅是当时上海妇女的名片，也是上海风情流行的媒体。改良旗袍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妇女身份的重塑。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上海妇女的职业道路、消费心态和家庭婚姻生活，反映在改良旗袍上是近代上海社会妇女矛盾身份的写照。同时改良旗袍在上海社会的变化受到了政府力量的控制和社会舆论的关注。政府通过对旗袍式样的控制实现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和控制，上海妇女则通过对旗袍的改良实现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舆论也通过各种形式重塑了符合当时上海文化的新女性形象，并通过改良旗袍这一符号语言展现了出来。民国年间以改良旗袍为代表的上海服饰能够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与上海文化的外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与左右，改良旗袍的发展与演变也呈现出了独特的上海特色。改良旗袍，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反映。它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带给我们关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上海社会时尚的遐想。

关键词：改良旗袍 近代上海 消费文化 符号

Abstract: In 1920s, the reformed cheongsam came into existence in shanghai society as a lady' s clothing, and it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women' s everyday dress until the end of 1940s. Thus, it became a historical memory of social status and fashion changes for women in modern shangha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eongsam of Manchu women evolved as a garment which represented the nobleness and elegance of upper class throughout a long

20 世纪 20——40 年代改良旗袍与上海社会

摘要：改良旗袍是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上海社会的女装样式，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渐渐淡出当时妇女的日常穿着。改良旗袍成为近代上海妇女社会地位及时尚变化的历史记忆。清末，经过长期的统治与漫长的社会变迁，满族妇女的旗袍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代表上层高贵与典雅的服饰，这种符号化的服饰语言的形成是近代旗袍复兴中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近代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为改良旗袍在上海复兴提供了条件。改良旗袍不仅是当时上海妇女的名片，也是上海风情流行的媒体。改良旗袍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妇女身份的重塑。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上海妇女的职业道路、消费心态和家庭婚姻生活，反映在改良旗袍上是近代上海社会妇女矛盾身份的写照。同时改良旗袍在上海社会的变化受到了政府力量的控制和社会舆论的关注。政府通过对旗袍式样的控制实现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和控制，上海妇女则通过对旗袍的改良实现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舆论也通过各种形式重塑了符合当时上海文化的新女性形象，并通过改良旗袍这一符号语言展现了出来。民国年间以改良旗袍为代表的上海服饰能够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与上海文化的外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与左右，改良旗袍的发展与演变也呈现出了独特的上海特色。改良旗袍，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反映。它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带给我们关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上海社会时尚的遐想。

关键词：改良旗袍 近代上海 消费文化 符号

Abstract: In 1920s, the reformed cheongsam came into existence in shanghai society as a lady' s clothing, and it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women' s everyday dress until the end of 1940s. Thus, it became a historical memory of social status and fashion changes for women in modern shangha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eongsam of Manchu women evolved as a garment which represented the nobleness and elegance of upper class throughout a long

reign and sustaining social chang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signified clothing language proved to be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revival of cheongsam. However, the uniqu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its revival in modern shanghai. The cheongsam was not merely the name card of shanghai women, it was also the medium of popular amorous feelings in shanghai. Moreover, the emerge of the reformed cheongsam catered to social changes and the remolding of women identities of the time. During the 1920s and 1940s, the career path, attitude of consumption and marital family life of shanghai women were reflected in the reformed cheongsam and they were the authentic portrayal of women' s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in modern shanghai society. Mean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ongsam had been subjected to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power and the close atten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shanghai society. The ruling government achieved their purposes of disciplining and controlling women' s body through regulating their cheongsam patterns, yet the women in shanghai also realize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public by modifying cheongsam. Futhermore, the public opinion simultaneously reshaped the new female figur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forms in line with shanghai culture, and thereby displayed these changes by cheongsam, a kind of symbolic language. In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shanghai style represented by the reformed cheongsam led a nationwide fashion trend, which probably had intimate relation with the extraversion of shanghai culture. Owing to the inevitable influence and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reformed cheongsam presented a particular shanghai characteristic. The reformed cheongsam, as a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reflection of shanghai urban culture, brought us fanciful senses of fashion in shanghai society during the 1920s and 1940s.

Key words: the reformed cheongsam modern shanghai consumer culture symbol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初艳萍 日期: 2010.5.26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初艳萍 导师签名: 谈XX 日期: 10.5.26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

2007 年 7 月以“寻找中国元素，感知中国人文，弘扬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助力人文奥运”为主题，由中国网、人文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百度网、TOM 网、腾讯网、中华网、淘宝网等媒体单位主办，人民网、国际在线、奇虎网、空中网、酷 6 网、人文奥运网、天涯社区、凤凰网、千龙网、红网等网站联合主办，近百家媒体共同发起推出了“寻找中国 100 元素”大型网络调查活动。力求从网络调查和网络宣传推广的角度，与国人共同寻找中国元素，感知中国人文历史。2007 年 8 月 8 号结果全面公布。在 50 余万张的网络有效投票中旗袍位列第 62 位。是着装类中国元素中排名最靠前的，力挫同类排名第 77 位的唐装和排名第 100 位的汉服。而与旗袍同时流行于中国大地的中山装竟然名落孙山，排名在 150 位以后。个中意义着实耐人寻味！

恐怕没有什么比旗袍更能演绎东方女性的万千风情和含蓄温婉的气质和神韵了吧。有人把旗袍比喻成一件官窑的瓷器，精致而温润，我认为，如果是，那它也是一件斗彩的花瓶，女性的身体犹如花枝盛放其中，妖娆而美丽的生存。它的入选恐怕更多人看重的是旗袍演绎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温雅丰韵，就像一幅充满了韵味的水墨山水。

但是与此同时恐怕也没有比旗袍更令人尴尬的服装了。2007 年 6 月 22 日在《时代信报》记者的街头采访中，一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赵小姐说“我的衣橱里没有一件旗袍，我不穿旗袍，因为旗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上旗袍的感觉就像是迎宾小姐”。风情万种的旗袍曾遭遇过一个时代的嘲弄。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革命的浪潮和热情荡涤了旗袍恬淡、舒适的生存空间。此后，这种在诞生之初还带有鲜明革命色彩并入选民国女子国服的服装，又在新的革命话语权中沦为剥削享乐和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种身价的狂跌恐怕比 2008 年的中国股市还要剧烈一些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久，旗袍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花样年华》、《色·戒》、《旗袍》等影视作品的热播，旗袍也开始随之升温，但是旗袍的普及还是遇到了开头的那尴尬一幕。近年来旗袍的穿着群体中一部分以影视明星居多，出席国际场合，主持节目等等，她们所着的旗袍往大了说只能

是一些中国元素而已，紧扣的元宝领后面露出了大半个背部，粉红的缎面旗袍下穿了一双耀眼的紫色袜子……怪异的让人心头犯堵，况且她们穿着的款式也并不适合老百姓日常穿着；另一部分就是一些酒店的坐台小姐，服务员，各种场合的迎宾员等等，笔者并没有歧视这些工作的意思，毕竟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是她们穿着的旗袍要么开叉很高，要么下摆很短，用料也很不讲究。这也难怪重庆冯氏旗袍大王第三代掌门人冯继清会感慨“旗袍正在走向陨落”。旗袍在我们时代呈现了一种怪现象，或许这就是史学家称之为悖论的现象吧，一方面是服饰学专家对其文化语义的无限拔高，香港作家林燕妮说：“旗袍是全世界公认的美丽国服，评价之高，肯定高过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服装”。“高贵、典雅、精致、”似乎成了旗袍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强调无性别差异的中性美的时代年轻人似乎也并不买账，网友们也在发难：旗袍沦为服务员、坐台女的制服，我们还能称之为国服吗？在1988年4月至6月，时为日本女子文化大学服装构成学专业的硕士生冉光旭对北京和上海的两地的18~58岁的在职妇女及女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北京妇女94名，上海妇女16名，并撰文《民族服装的时代感与传统性——调查分析不同地区、年龄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被收录于《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中。从调查结果的整体来看，“对旗袍的发展持积极态度者为多数”¹。同时通过作者的调查发现广大妇女仍然非常喜爱带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旗袍。尽管旗袍存在着对体型有着较高的要求，以及跟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相适应等不利因素，但是调查中的多数妇女仍然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穿着并赞成把旗袍作为礼服加以普及，并且赞成普及的人群中以青年人居多。这可视为旗袍普及风暴中的生力军吧。

其实不管外界的纷争结果如何，或许大部分的中国女人都曾经在某一个静寂下来的时刻，脑子里回旋过一个梦幻的画面，这个画面或许是这样的吧：江南的飘着如雾霭般春雨的小巷，水一样的女子，撑着一把画着水仙花的油纸伞，着了或葱绿，或嫩黄，或嫣红的旗袍，细细镶滚的元宝领，精致的蝴蝶盘扣，盈盈的腰身，行动处如闲花落地，回眸时恍如风卷珠帘。这个时候又有谁不渴望画中的主角就是自己呢？或许那样的诗意的恬淡，只能是一个梦了，那么就请允许我用这篇论文来追寻我的梦境，并借由它来讲述上海时尚一百年的故事吧。

¹ 冉光旭：《民族服装的时代感与传统性——调查分析不同地区、年龄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潘坤柔主编：《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二 研究综述

服饰史的研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尤其在中国,当它成为礼仪的物化形式与主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时,注定了服饰的研究是不会寂寞的。同任何一门学科一样,服饰学早期的学术专著,大都集中在服饰考古和记载上。中国历代《舆服志》,详细记载着历代服饰的沿革,以及不同时期服饰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的关系,它是我们研究中国服饰发展史之所本。黄宗羲的《深衣考》和江永的《深衣考误》¹对深衣的起源,制作标准,发展演变和象征意义都进行了系统而严密的考证,对后世服饰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典范。对于本论文的写作,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美国华盛顿大学布兰奇·佩尼教授遍访世界各著名的博物馆,亲临许多地区,甚至未完全开化地区,经过大量文物考古与田野调查,撰写成《世界服装史》²,堪称一部学术巨著。而日本学者原田二郎的东方视角看《西方服饰史》³也可以说是学界里的新鲜空气。此外美国学者瑞·塔纳·威尔阔克斯著《服饰的历史——从古代东方到现代》,迈克·巴特贝里和阿丽安·巴特贝里著的《时装——历史的镜子》,日本学者小川安朗的《民族服饰》,以时间为顺序对服饰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剖析,都是服饰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所不同的是时间跨度和选材地点。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考古学突飞猛进的基础上,1964年沈从文先生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史》⁴的撰写工作。历时十余年,期间作者进行了艰苦的考证工作,并首次将考古发现与文史资料和绘画雕塑传世作品进行对比和归纳,全书史料详实,考证严密,可谓是服饰史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巨著。为后人继续进行中国服饰文化的探索创造了条件。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地区也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服饰馆藏和材料集结成册,出版了诸如《中华服饰图录》、《中华袍服织绣选粹》、《清代服饰展览图录》⁵等一系列图书。这些图书大都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实物为基础,以图片的形式为主,图文并茂,用比较直观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中华服饰文化的魅力,给人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这种资料性的画册可以说是服饰研究史上比较经典而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形式。据说最早出版的服饰书刊就是这种

¹ 费著撰:《蜀锦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

² 兰奇·佩尼:《世界服装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³ 原田二郎著,丹野郁等译:《西方服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⁴ 沈从文、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3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⁵ 王宇清:《中华服饰图录》,世界地理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中华袍服织绣选粹》1977年版;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清代服饰展览图录》1986年版。

形式，这本名叫《描绘欧洲各国女式服饰的画册》¹的书籍，既不是诞生于以时尚著称的法国巴黎，哪怕是当时颇有浪漫盛名，引领时装潮流的法国也没沾上边。毫不浪漫，以严谨著称于世的德国人占了先机，这本书由德国画家约瑟·阿曼所绘制，并用拉丁文做了说明，为历代图文式服饰学著作做出了表率。而由中央美术学院的黄能馥教授和故宫博物院陈娟娟研究员联合出版的《中国服饰史》²则将中国服饰史研究的下限延伸到了 20 世纪前半叶。在服饰学原理的基础上，以朝代划分为依据，结合最新的考古学成果，系统介绍中华服饰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变化的情况。并且将材料学分析的成果引入进来，弥补了原始社会服饰研究留白的情况，并首次对材料与款式造型和身份塑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华梅著《中国近现代服装史》³则将 1840~1949 年的中国服饰变革作为研究的对象，着重阐述在这段动荡变革时期，中国服饰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研究不管是以某个国家的服饰为对象还是以世界范围内的服饰为对象，往往都是以朝代的更替作为服饰变化的时间划分的重要依据，重视政治力量对服饰变迁的决定作用，而对于下层力量对服饰变迁潜移默化的改革力量着墨则显得吝啬。

服饰美学是人们对服饰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第一个结合点，对服饰美学的关注是由时装引发出来的，人们开始关注着装的美感，进而引发对美学的思考。如果说学术性的著作只适合于学者进行阅读和交流，前期的学术著作只是对于过去时代的服饰进行缅怀与分析的话，那么时装杂志的普及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们对于时装美的认知和理解，杂志根据自身作为传播媒介的特性，将美学的热点集中在时装动态上，并以此为契机大大地提高人们对艺术、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欣赏水平。1785 年《时装》杂志创刊，人们开始了对时装美的关注，并进一步将美学研究引入服饰史研究的领域。米利亚·达文波特的《服饰志》和伊夫林·休的《服装史》⁴等比较有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为研究世界服饰美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巴克·安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托马斯的《希腊人服装》、诺里斯·赫伯特：《19 世纪服装和时装》⁵等著作，都对服饰中的美和审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而服饰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

¹ 华梅：《服饰社会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版。

²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³ 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版。

⁴ Davenport • Millia, The Book of Costume, Crown Publishers, 1948; Evelyn • Hugh, History of Costum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lays, Inc., 1968.

⁵ Buck, Anne, Victorian Costume, Costume & Fashion Press. 1984; Hope, Thomas. Costumes of the Greeks. 1962.; Norris, • Herbert., Nineteenth Century Costume and Fashion.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8.

在 19 世纪后半叶英国威廉·莫里斯倡议的“艺术与工艺运动”兴起之后，连黑格尔也不得不在他那有名的《美学》¹中专为《服装》写了一节《关于服装的原则》。在我国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人开始进行服饰美学的研究。华梅的《服装美学》²中对服装材料、服装设计、服装制作、服装穿着等所体现出的美学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并从服装质料的美学价值、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服装穿着的美学理念、服装创作的美学风格、服装艺术的美学意境、服装研究的美学意义六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服饰美学。与其他服饰美学书籍的不同的是本书不仅从服饰文化学的高度谈美学，其中大篇幅的涉及到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诸多方面，使得读者得以在大文化背景下深入了解并研究服装美学。但是服饰美学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服装或饰物本身的美学价值的阐释，或由服饰本身引起的人们对某一种审美风尚的追捧，是站在服饰内部看服饰的美。

服饰文化学则是服饰学的另一个有趣的分支，专家们通过对人类童年的追溯，寻找人类文化，包括服饰起始的源头。然后沿着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归结到近现代，进而推演出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众多专家心血合成的《文化服装讲座》³则是从服装文化着手，阐释文化服装的力作，但此书的主要内容偏重于工艺学。此外奥地利学者赫尔曼·施赖贝尔的《羞耻心的文化史》，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以及我国学者顾建华著《衣食住行话文明·服装》等著作⁴，都是以服饰为视角反映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文化。不仅对服饰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文化史的拓展和深入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19 世纪中叶，有一门学科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心理学。当心理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并被引入服饰学的研究领域，服饰学者们开始学习从服饰之外的世界看服装。格·维·迪尔邦和杰·卡·弗吕格尔分别在 1879 年和 1930 年以同一命名《服装心理学》出版了关于着装心理分析的著作。晚些

¹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² 华梅：《服装美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版。

³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服装讲座》，展望出版社 1981—1984 年版。

⁴ 施莱贝尔：《羞耻心的文化史》，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玛格丽特·米德著，宋践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论艺术》，三联书店 1973 年版；顾建华：《衣食住行话文明·服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时候出版的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赫洛克的《服饰心理分析》¹则主要针对的是人们赶时髦的着装心态和动机探讨服饰变化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动因,并将流行服饰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是较早对时装心态进行分析的著作。1934 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巴尔发表的《时装的心理分析》,这也是以流行时装为切口,研究服饰心理学的专著。这一时期的作者大多通过大量的心理测验所获得的丰富资料,深入地剖析时代与人类的着装心理,说明“服装是自我表现”这一主题。20 世纪初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用他的“泛性论”观点震撼了心理学界,很多人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生活中的种种心理问题。服饰学也于 20~30 年代将这一学说引入到了服饰心理研究的领域,人们关于艺术、审美的观点触及到了潜意识、性意识、变态心理、压抑心理、情节、深层心理的转移和宣泄等等层面上来,对于服饰形象设计,对着装心理的本质及探索时装动因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或许只有重新回到裸体时代,我们才能真正领略装饰的意味:那只是一场延宕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性游戏。它被一种叫做审美的东西不断刺激着,变化在遮蔽与裸露之间,在这半遮半掩之中,完成对于身体的色情想像”²。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泛性论学说的不同表达方式吧。国内学者对服饰心理学的研究虽然涉猎的较晚,但对服饰心理学研究的专著却很多:刘国联的《服装心理学》一书不仅接受了服饰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且将最新的服装心理治疗的原理与方法也引入其中,使得服装与对主体的心理互动被引入一个崭新的阶段³。随后关于服饰消费的心理学的也被引入了服饰研究的领域,苗莉,王文革的《服装心理学》⁴研究中就引入了新的消费心理需要、动机、个性认知等特点,以及选拔服装设计者的心理测验方法等最新的成果也被引入其中。

随着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和新文化史的诞生,把服饰研究引入符号学、消费主义、空间理论方向的研究也因视角独特而佳作频出。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⁵从群体记忆学的角度强调服装对人类记忆形成的功能和作用。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其《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⁶中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在这本书中罗兰·巴特运用其娴熟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

¹ 伊丽莎白·赫洛克著,孔凡军等译:《服饰心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² 罗玛:《开花额身体:一部服装的罗曼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³ 刘国联:《服装心理学》,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⁴ 苗莉、王文革:《服装心理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

⁵ 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⁶ 罗兰·巴特著,敖军译:《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专门知识将时装体系以流行神话，服饰业，消费者三个层次来架构，但是由于语言的差异和学识水平的限制，在全面把握本书上仍然面临很大的难度。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¹一书打破传统服饰消费心理学的局限，从新消费学的领域解读流行服装的消费对晚明社会的影响。而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²一书中对于中山装的象征意义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建构，是较早的专门针对某类服装进行符号化和象征意义解读的佳作。服装学专家华梅女士的《服饰社会学》³将重点放在服饰的社会性上，并对纹饰图案的艺术性也做出了分析，是服饰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典范。

前辈们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列举。

具体到改良旗袍的研究和探讨，前人亦有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供后人分享。到目前为止，已有多部关于中国旗袍的专著。改良旗袍作为一种实用性和生活的艺术相结合的服装样式，这方面的专著在初期不能不以研究服饰设计、服饰工艺学为中心。郑嵘、张浩的《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于君的《女性与旗袍》、于金兰的《中华旗袍》、李霞芳的《时尚与典雅旗袍》、蒋明的《东方旗袍》⁴等等，是这方面出现较早也较有价值的代表作品。

具体到改良旗袍的源流和变迁的考证，则东华大学包铭新教授主编的《世界服饰博览——中国旗袍》⁵，是国内较早的关于旗袍的专著。作者考察了旗袍的源流和旗袍在近代社会的变迁历史，并将京派与海派的旗袍进行了图片的比对，令人耳目一新。白云的《中国老旗袍——老照片老广告见证旗袍的演变》⁶一书运用大量的图片资料对旗袍的最初样式、发展演变和走向经典的历程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全面阐述了在旗袍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交融的作用。袁杰英、沈菱的《中国旗袍》⁷，也将着墨点放在综合分析旗袍的演变发展历史及其在民国时期不同的发展状况上。前人旗袍专著的共性是对旗袍进行了从产生到发展过程中，

¹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²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 华梅：《服饰社会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版。

⁴ 郑嵘、张浩：《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于君：《女性与旗袍》，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于金兰：《中华旗袍》，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李霞芳：《时尚与典雅旗袍》，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蒋明：《东方旗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 2001 年版。

⁵ 包铭新等：《世界服饰博览——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

⁶ 白云：《中国老旗袍——老照片老广告见证旗袍的演变》，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⁷ 袁杰英、沈菱：《中国旗袍》，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

款式变化和上海社会大环境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由于篇幅的限制,所以基本没有具体深入研究两者间的紧密联系,而基本上关于基础整理方面的工作也是放在整个中国服装链条之上,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少。而其中纵向横向地将改良旗袍与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大背景紧密相连进行研究的几乎寥寥无几,更没有总结性的基础整理。作家刘业雄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盘点上海时尚》¹一书中的第二章《旗袍风韵:永不飘逝的年华》中,详细的讲述了改良旗袍来历及变化,且加入了时尚及另类意义等元素和新颖的观点,较详细的解释了改良旗袍产生的意义,丰富了资料收集的途径,但在后来谈到改良旗袍变化史时并未多方面全面分析其背后社会文化思想全面影响的深层联系。

在论文研究方面:日本文化女子学院的冉旭光以中国旗袍为研究对象,写成为《民族服装的时代感和传统性——调查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²的专题论文。该文以上海北京两地 18——58 岁的在职妇女和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旗袍的流行趋向做了科学系统的论证和量化的分析。《近代上海服饰研究及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³一文分别从近代上海服饰发展过程中的时间断代问题;近代上海服饰研究的切入点和关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近代上海服饰研究档案资料等三方面进行论述。作者将近代上海服饰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842 年上海开埠前后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为第一阶段;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为第二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则为最后一个阶段。这种分段方法打破了传统的以朝代或者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分段办法,以服装自身的发展演变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女装发展的特点,以 20 年代以后为时间背景做出考察。作者对有关档案资料收集、整理较为全面,为本文提供了史料收集的基本线索。此外卞向阳教授的《论旗袍的流行起源》、包铭新教授的《20 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郭慧娟的《民初京城旗袍流变小考》等文章都对改良旗袍的源流,最早流行的时间,制式特点等进行了系统和严密的考证。唐勇的《从女性意识角度看旗袍的兴衰》⁴以旗袍的产生,兴盛,衰退过程折射出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开拓了对改良旗袍研究的新的视野,在当下随着许多西方理论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发展,许多学者开始了对改良旗袍进行美学、

¹ 刘业雄:《春花秋月何时了:盘点上海时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² 冉光旭:《民族服装的时代感和传统性——调查分析不同地区、年龄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潘坤柔主编:《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轻工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³ 石磊:《近代上海服饰研究及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档案与史学》2001 年第 1 期。

⁴ 唐勇:《从女性意识角度看旗袍的兴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心理学、文化学、材料学等方面崭新的解读；郭静的《从旗袍的发展看中国女性对服饰的审美变化》、卞向阳、周炳振的《民国旗袍实物的面料研究》、陈婷的《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追述民国年间旗袍发展》、万芳的《民国时期上海女装西化现象研究》、刘建萍《面料热塑性对旗袍塑型方法影响的研究》、薛志雄《不同时期旗袍的设计文化意涵》都是其中杰出和优秀的代表。最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陈蕴茜的《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中山装的流行》¹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中山装对规训身体重要政治功能，对于论文的写作有着极高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罗苏文的《论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²将近代上海女装的变迁与公共空间的扩大和消费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刘志琴的《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想史》³将非观念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些新视角的出现，使我坚定了走独特视角观察改良旗袍，进行论文写作的信心。而关于近代上海时尚与品位，及其与上海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不少的力作。而女性学作为史学研究的新视角，也是硕果累累。台湾方面以现代视角探索女性意识，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李健鸿的《身体与消费文化》、吴佩琪的《解读少女杂志广告中的美貌迷思》、吴家翔的《解读美体瘦身广告的身体形塑意涵》、吴健绫的《重爱 / 宠爱身体——身体书创作与教学的行动历程》、林育如的《“贩卖玩美”：女性身体意象于影像艺术表现之创作》、周怡君的《化妆实践中女性认同的构成》、邱丽珍的《女性杂志美容美体论述的结构》⁴等等。台湾学者用独特的理论来解读近现代社会的妇女问题和女性现象，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一系列关于旗袍与社会尤其是与上海社会的关系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果：如卞向阳，陆立钧，徐惠华的《民国时期上海报刊中的服饰时尚信息》、

¹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9月。

² 罗苏文：《论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游鑑明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

³ 刘志琴：《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⁴ 李健鸿：《身体与消费文化》，东吴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吴佩琪：《解读少女杂志广告中的美貌迷思》，国立中山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吴家翔：《解读美体瘦身广告的身体形塑意涵》，世新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吴健绫：《重爱 / 宠爱身体——身体书创作与教学的行动历程》，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林育如：《「贩卖玩美」：女性身体意象于影像艺术表现之创作》，高雄师范大学视觉设计学系硕士论文2006年；周怡君：《化妆实践中女性认同的构成》，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邱丽珍：《女性杂志美容美体论述的结构》，国立师范大学家政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梁惠娥,张竞琼的《从〈良友〉看民国时期上海服饰的时尚特征》、张竞琼的《上海近现代服饰时尚传播中的画家》、卞向阳的《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等等。在对近代上海丰富的报刊资料进行了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力图将服饰时尚与上海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论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上海社科院 2007 级硕士生张琰的论文《〈良友〉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尚想象》¹将《良友》杂志推动的近代都市文化的时尚想象为研究对象,并将中产市民的社会文化想象与上海市民生活中的现代化的互动作用作为研究的主体,从阅读公共空间的建构来展示近代上海的时尚。对于本论文的写作有着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较早运用社会学的原理来分析女性着装心态的为罗苏文女士,她在《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²一书中认为女性妆饰的变迁是后人解读女性心理变化历程的重要依据。故而将大量相关史料贯穿于文,借以再现当时女性的妆饰。苏女士常年从事上海史的研究工作,对近代上海女性研究尤为出色。她以都市女性社会角色及家庭角色的变化作为本书的切入点,对近代上海女性的着装变化及心理变化作出地详尽的分析。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而在她的另一本力作《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³中将都市公共娱乐空间的拓展和“女界”的显现作为诱发近代上海女装演变两个重要起因,其史料翔实,论证充分,对于开拓论文写作的视角起到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其他如张竞琼先生的《“西”服东渐,20 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⁴一书虽未明确指出研究区域性,但就文中所提供的图片和其中大量文献资料来看,大都来源于上海地区。并且作者选择将“媒介”作为切入点,并将“媒介”分为传播者与传播媒体两个层面。众所周知,以人群为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个体性”,而以媒体为对象则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性。作者巧妙地将两个方面进行了结合,更完整的概括出民国时期女装的全貌。遗憾的是,文中罗列的大量史实和文献资料虽详实可信,却多为全景式鸟瞰,并未对各类服装的具体变化加以深入说明。对有的服装形式亦即分析了原因,却对结果一笔带过。而对于近代上海新生事物对上海时尚空间的塑造以及与上海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塑造上,近年来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炉,视角独特,材料新颖,对论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¹ 张琰:《〈良友〉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尚想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 年。

²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³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⁴ 张竞琼:《“西”服东渐,20 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儒年的《欲望的想像：1920—1930 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¹，以申报广告为研究对象，强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上海社会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的塑造和美得理想的影响。另外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²，关于上海近代化中的种种新事物的文化学，消费学的解读还有很多著作，因为才疏学浅，未能一一涉猎，甚为遗憾，但是他们艰难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也给我的学术研究很大的启迪和鞭策。

三 基本内容及框架

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梳理改良旗袍发展演变的历程，阐述改良旗袍能够在近代上海社会中复兴并不断变迁的历史事实。本章分为三个小节进行阐述，第一节是对清朝服装体制的回顾，满族妇女的旗袍在清初并不为汉族女子所接受，但是到了清末，经过长期的统治与漫长的社会变迁，旗袍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代表上层社会的高贵与典雅的服饰，这种符号化的服饰语言的形成是近代改良旗袍复兴中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改良旗袍的制式特点在那个时候已经呈现出不可抗拒之势。然而近代上海通商口岸的开放，租界的出现，到底能不能把上海女装的发展引向歧途呢？这是本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在那个混乱的让人看不清方向的时装年代，旗袍的优势如何显现将在本章的第三节中予以回答。第三节将主要讲述改良旗袍出现在上海的时间和它的主要优势，同时这种创造了着装与身体之间新的空间的服装模式到底如何展示近代上海女性的心态，是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从三个不同方面对上海社会中妇女身份的矛盾展开论述，第一节着重介绍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上海妇女的职业特点和各种不同职业对女性着装的要求；第二节从当时职业妇女的收入和消费入手着重介绍当时上海妇女的职业收入和消费需求；第三节则从当时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入手揭示当时妇女独立经济地位背后的无奈和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困境。正如我们经常能在报端和回忆录中见到的那样，近代上海社会中姘居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有别于传统的婚姻和生活方式，对上海女性的心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由 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上海社会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引发的妇女职业生活

¹ 王儒年：《欲望的想像：1920-1930 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²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和身份的矛盾的心态通过旗袍这种服装形式得以展示。当国家，社会和家庭都无法带给女性安全感的时候，改良旗袍通过这种紧扣的领子，收紧的线条，带给当时上海妇女独特的心理慰藉和身心规训功能是怎样的，这是本章探讨和论述的重点。改良旗袍，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反映。它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带给我们关于20世纪20—40年代上海社会时尚的遐想，这是本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改良旗袍不仅是当时上海妇女的名片，更是上海风情流行的媒体。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折射当时上海社会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中西融合与碰撞以及民国上海文化本身的暧昧性和先进性。上海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为改良旗袍在上海复兴的根本原因，第一节将着重围绕这些因素展开论述。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对于服装的政策以及下层民众与社会各界对政策的态度与回应是本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通过改良旗袍这种独特的服装来展现当时上海地域社会的互动。民国年间以改良旗袍为代表的上海服饰能够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与上海文化的外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与左右，改良旗袍的发展与演变也呈现出了独特的上海特色。这是第三节的主要内容。

四 研究思路及理论方法

（一）研究内容

改良旗袍并非笔者的首创，关于改良旗袍的定义东华大学的包铭新先生认为“到了三十年代末，又出现了一种‘改良旗袍’。所谓‘改良’，就是将旧有不合理的结构改掉，使袍身更为适体和实用，打破了旗袍无省的格局。同时第一次出现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都变得更合体了……”¹作为服装学的专家，包教授的定义主要是从工艺的角度入手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所谓改良旗袍是指采用欧美剪裁和服装制作技术，突出女性曲线的新型旗袍。但是从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如果把改良旗袍用工艺的角度作为定名的标准，难免会使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时代陷入混乱。而戴云女士在其《上海小姐》中声称改良旗袍为当时上海一家女子西装店“鸿翔时装公司”的杰作²。不知道作者的依据何在，因此不便采信。因此在本文中改良旗袍的称谓只是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传统的旗人妇女所着的旗袍。实际上就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于上海的这种“衣裳连

¹ 包铭新：《世界服饰博览 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² 戴云云：《上海小姐》，上海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属的一件制服装”¹同时又符合卞向阳先生定位的“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²特征的服装。

（二）研究方法

在写作中笔者决心严格从史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性别学，文化学，心理学的相关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优秀理论，综合运用报刊、档案和民国时期的相关论著。力求达到对改良旗袍的来源和变化趋势清晰梳理，并对改良旗袍与上海妇女以及上海社会的关系进行有效的阐述。在写作中坚持做到自主创新，拒绝抄袭。

（三）创新与不足

本文将符号学的原理运用到改良旗袍的研究中，用符号学中的象征符号原理来映证当时上海社会文化的本性以及上海妇女的矛盾处境和矛盾心态。但是在材料搜集方面，范围颇显狭窄。并且在符号学的把握和认知方面略显吃力。

¹ 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装饰》2003年第11期。

² 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装饰》2003年第11期。

第一章 改良旗袍的源与流

第一节 礼仪比流行更重要

旗袍二字应该分两个部分来理解,“旗”字来源于满族社会中特有的一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到清末时,凡是被编入八旗,拥有旗籍的人称为“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的形式接受清政府的管辖。而“袍”则是中国传统女装。最早出现在夏商周时代,主要是用以御寒的生活便装。它的特点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长衣服,但有夹层,夹层内装有御寒的绵絮”¹。而在夏商周时期女性的礼服也是采用“上衣与下裳不分的袍式,表示妇女贵感情专一”²。包铭新先生认为旗袍的发源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³,并且一直被很多人引用。但是据《诗经·深衣》篇记载,深衣应该是夏商周时期有官职的男性祭祀时的着装,庶人则用其作为吉服。并据黄宗羲的《深衣考》记载,这件衣服是上衣下裳分开裁制的。并且“深衣之制,至宋儒而始复之,至朱氏而始正之……此即今世所常服之衣也。”⁴。也就是说直到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深衣并未见得为女性所穿着。另根据周瘦鹃的记载,1925年“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小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秋风刚刚起,已有人穿夹旗袍,为美观起见,不妨从夹穿起,而为棉,为衬绒,为驼绒,为毛皮”⁵。同时李寓一的记载,“外套之形式有一口钟、旗袍、大衣三种。先专为冬季御寒之用。近则秋季亦用之。相习既久,遂流为妆饰。惟其中一口钟多为妓女所着。上等妇女则穿旗袍与大衣。大衣上无多妆饰。旗袍之纽扣较多于男子。底摆扣合非若男袍之飘开者。其近底摆与袍口处。时髦者亦加滚花边一道,边色不一,视衣料之色彩而异。与昔日所用之蓝格相同。但较美观”⁶。而另一位民国年间研究服装的权柏华先生则认为一口钟与旗袍属于同一制式,只是称呼不同罢了。“民国成立前几年,(妇女)皆效男子外着皮擎大衣;近数年来,又改用合衫,有名一口钟——及旗

¹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²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³ 包铭新等:《世界服饰博览 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⁴ 黄宗羲:《深衣考》,《蜀锦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页。

⁵ 周瘦鹃:《我不反对旗袍》,《紫罗兰旗袍特刊》1925年第一卷第5号。

⁶ 李寓一:《二十五年来各人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281页。

袍，内裘细茸皮毛，外则用极艳丽之绸缎，此等服装概为御寒起见。”¹由此可见，旗袍这一服装样式之所以用“袍”来命名，主要是因为在它最初被采用的时候主要是用于冬季穿着，其中是夹了棉的，并且它是上下一体式裁制，为女性所着，所以就用了传统的“袍”的名字来命名它。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中也把旗袍定义为：中国传统女袍。由满族女装演变而来。因满族曾被称为“旗人”而得名。旗袍的特点是立领，右大襟，紧腰身，下摆开衩，采用传统的工艺装饰²。而在《辞海》中旗袍的定义是这样的：旗袍原是清满洲旗人妇女所穿的一种服装，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也普遍采用。经过不断改进，一般式样为直领，右开大襟，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衩，并有长、短袖之分³。可见旗袍与满族女装的渊源关系十分明显而与“深衣”之间似乎并无明显资料显示二者之间的关联。

服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有民族活动的习性的影子。满族人生活在苦寒的东北地区，狩猎骑射为生。由于气候的原因，满族男女均穿长袍，这件以原女真族袍为基础的着装，右大襟、下摆开衩（两侧开或四面开）、圆领、箭袖、直腰身。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东北地区严寒的气候和骑射活动的需要。而其中女袍比较瘦长，多不加箭袖。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其服装上还是残留了很多骑射狩猎时代的遗风。马蹄袖，花翎，马甲等名称和元素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满族旗袍和它所代表的政权一样在清初受到了汉族文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但是随着政权力量的加强，满人传统服装在不断的变化也慢慢的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尤其是女袍，因为生活的安定和地位的提高，在领口、袖口、襟缘、摆缘部分一般都加上了彩色的滚边。清末，满族上层妇女的旗袍出现了立领，袍身刺绣，镶滚复杂，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甚至“十八镶滚”。而作为外套的女子朝袍，不同的等级在颜色图案等方面的差异很大。贵族妇女一直在追求服装的华丽和生动之气，夸张的款式，精致的细节处理，铺张的用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如下图所示）满族传统袍式女装在裁剪、布料等方面的讲究，也确实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品位，为了这样的品味，人们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那个年代的女子在穿着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望尘莫及的。褂，裙，袍，

¹ 权柏华：《二十五年来各人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289页。

²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202.121.55.10:918/web/index.htm>。

³ 舒新城等：《辞海》，上海辞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2页。

马甲，领巾，不仅要穿戴整齐并且穿着的顺序也不可以出错。为了保障旗袍的独立性和民族性，清代初期严禁八旗女子仿效汉族的着装。在嘉庆十一年（1806）和二十二年（1817）两次下谕对八旗女子模仿汉族妇女衣着，擅自改变衣袖的宽度予以严厉斥责¹。当时定制，满汉不通婚的，满族统治者征服了汉族，也歧视了汉族，所以汉族妇女的服饰，一定要与满族妇女的服饰有别方能体现出旗袍的贵族身份。汉人妇女，除了丈夫在朝为官者可以披风红裙，朝珠补服外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与旗袍无缘。宫廷的旗袍处处宣泄着只有上层社会才会有的悠闲而富足的生活，属于特权阶层的优雅和礼仪。回顾之前几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我们会发



图片 1 满族妇女的冬装。图片来源：陈涌主编《旧中国掠影 1868-1945 旧中国影像档案》，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8 页。



图片 2 满族妇女的春秋着装。图片来源：陈涌主编《旧中国掠影 1868-1945 旧中国影像档案》，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9 页。

现虽然可能之前的某个时段里，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服装的消费热情已经十分高涨，对于服装改良的贡献也十分巨大。比如巫仁恕在其《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中为我们展开的明代社会服饰消费和服饰流行的崭新图卷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只有宫廷或是上层社会才有能力将这种消费变成艺术。服饰的纹样和色彩是那个时代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欣赏意义。正如 S. A. M. Adshead 所说的那样，在那个年代“礼

¹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1 页。

² 巫仁恕：《品味奢华 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15—164 页。

仪比流行更重要”¹。旗袍尤其是女装旗袍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而成为那个时代代表贵族与高雅的符号。因此清末随着满清统治的式微和政权力量的削弱，在上海没有功名的汉人模仿满族服饰的现象比比皆是，味灯室主人的《红风兜》一诗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绛云朵朵飞街头，十人而九红风兜。风兜虽红镶似锦，捐票官阶非极品，已非小民。职方如狗都督走，朝廷名器无乃轻。况复红为妇人女子服，非官而红反嫌辱，威风足。赢得乞丐呼老爷，乡愚见之亦瑟缩”²。而近代上海竹枝词中也有不少关于上海民间女子模仿上层着旗袍的描写，“簇新时派学旗装，髻挽双双香水香，拖地花袍宫样好，宽襟大袖锦边镶”³。而李寓一在《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装饰的变迁》一文中对光绪中叶的不同地区的妇女着装的记载则似乎更为意味深长。

其时燕京尚大袖宽边，吴都尚窄袖狭边。袖之大者有尺余，其他腰身各处亦随之而俱宽大。宽边之式，以云头图案为最盛行，遍行于直鲁豫陕……各省，其他有茉莉花边，海棠花边，菊花边，荷花边，回文边，云头边各种。窄袖狭边中，其袖多四寸袖、三寸袖。其边有单滚与双滚数种，多不用花边而用素色。统名为韭菜边，至今犹有用之者。此式盛行于江浙两地，皖省以上则仍多用宽边。但其与北地宽边不同。北地以红底绿色或金黄色调为上。皖赣两湖等地则以蓝绿紫色为尚……⁴

从上边作者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曾经的政治中心和满族贵族聚居的京津地区，妇女着装多模仿古代汉族妇女的宽体大袖的飘逸修长着装风格，而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地区却在效仿满族旗袍的窄袖狭边，飒爽英武。回顾清初因满族妇女随便改变袖子的宽度，竟然受到嘉庆皇帝的下谕斥责，事过境迁，服装的变迁已是制度所无法阻挡的了。在北京亦是如此，肖伯青先生亦回忆说“（1924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又派鹿钟麟进入皇宫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当天迁到后海醇亲王府，从这一天起，在北大附近的大街上，在全北京附近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头的妇女了。北京街头不见梳大板头装束的妇女，不是从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时开始的，而是从一九

¹ S.A.M.Adshead:《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pp. 100.

² 味灯室主人：《沪北新乐府·红风兜》，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³ 申左瘦梅生：《沪北竹枝词》，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⁴ 李寓一：《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装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281页。

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开始的，在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到这时根本绝迹了。说来也奇怪。北京街头梳大板头的不见了，穿木头底鞋的没有了，而旗人妇女穿的旗袍却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来了”¹。

第二节 混乱的流行时代

鸦片战争把整个不情愿的中国连托带拽的拉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整个中华帝国的威严被狠狠的踩在脚下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但是很快人们就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把所有的压抑了很久的不平衡都发泄到了满族统治者的身上。连带那件曾经很多人梦寐以求也带给许多人荣耀的清朝着装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嘲讽。包天笑在他的《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一书中列举的某位朋友把满族服装连同它所代表的民族进行的戏谑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有一位好作无稽之谈的朋友，他是研究《西游记》的，一似近日许多学者的研究《红楼梦》，他说：唐僧取经以后，各徒弟都成了佛，到了元朝，中原沸乱，玉帝要派齐天大圣孙行者，到下界去治理一番，孙悟空已看破这个五浊恶世，不肯去，倒是猪八戒其欲逐逐，那便派他去了。那就是明朝的朱太祖，猪八戒姓朱，朱元璋也姓朱，但是姓朱的搞不好，又得要换人了。唐僧门下徒弟，谁也不愿意去，忽然唐三藏到西方取经所骑得这匹白马，勇往直前的说：愿意到下界走一遭。那便是爱新觉罗氏占据了国，所以他们衣服的形色，都带了一点马的形态。试看一条辫子，从头顶拖到臀后，这不是象征马尾吗？一串朝珠，套在颈项，很像马铃，胸前背后，都有补服，这颇似马背所围得鞍衣；人有腰带，马亦有肚带，最彰明较著的，一双袖袍，竟直称之为马蹄袖。²

曾经象征满族统治权威的满族旗袍中的马蹄袖、朝珠等元素受到了革命话语权的嘲讽和奚落。女装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说以前女性们在着装面前最大的敌人是政策，政策规定了什么阶层的人必须着什么材质，什么颜色的服装。但是从今往后女装的最大敌人变成了时尚。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在特定的颜色及图案上沾沾自喜。尤其是辛亥革命的胜利终于结束了那个名存实亡的政权。跟随政权一起走

¹ 肖伯青：《旗袍六十年》，《旧京人物与风情》，燕山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5 页。

²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大华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5 页。

向灭亡的是关于服装等级的规定。时装终于冲破制度的门槛来到中国人的面前。但是包括当时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内，几乎全部的中国妇女都没有找到既能适合自己身份又能代表中国特点的服装式样。勉强在上海流行的时装在色彩和搭配上也显得和当时的时局一样混乱。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征服，上海人经历了“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羨，后继则效”¹的过程之后，西方的时装如同他们的技术一样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也有了很大的市场。“至于衣服，则来自舶来。一箱甫起，经人知道，随争相购制，未及三日，俨然衣之出矣”²。据李寓一记载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妇女衣裙之修饰有三大变更：一种色彩方面，一种形式方面，一种图案方面”³。据作者的观察，在色彩方面，清朝时期妇女的衣服颜色以红绿两色为时尚，辛亥革命后，妇女多倾向与选择鸢、紫、灰青等雅素的颜色，裙子方面亦是，清朝的裙制只有黑红两色，“今则以衣裙同色为美，似有欧风”⁴。不仅如此镶边甚至履帽的颜色也开始讲究与衣服本色的统一与协调。而形式上，也有将右襟改为左襟，将圆球形纽扣改为螺钿式的，宽身大袖也一改而为小袖狭身，领子由矮变高之后不久即改低，甚至出现了无领或效法西式的方领的服装。而权柏华也完整的记载下民国初年女装的变化模式，与李寓一的记载很相似。

（妇女）衣式于民元及三四年间，极尚瘦小，腰身臂膀以毫无褶皱为美。

近年来则渐改肥大，不过式样与前清肥大不同，清时肥大下襟尚长；现在则尚短。所肥处仅在袖口与下摆。裙裤皆逐渐尚短，近日短者几至不能覆膝……我妇女之趋时者夏日亦多改用方领或长领。且有仅着无袖汗衫，以便袒露胸臂；甚至于短衫及腹，微风吹动，胸腹便都外现。⁵

上海女性因为新奇而开放的着装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上海妇女衣服，无年不变。光绪乙未、丙申间竞尚淡素，是年秋赛时忽改为大红大蓝，复用金线织绣，益觉五光十色……于是海上诸名花衣饰为之一变”⁶，并且“上海妇女之装束，常为各省内地妇女之典范，而争相效者。故上海所流行之装饰品，及服装式样未

¹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 页。

² 姜水居上：《上海风俗大观》，上海新华书局 1922 年版，第 30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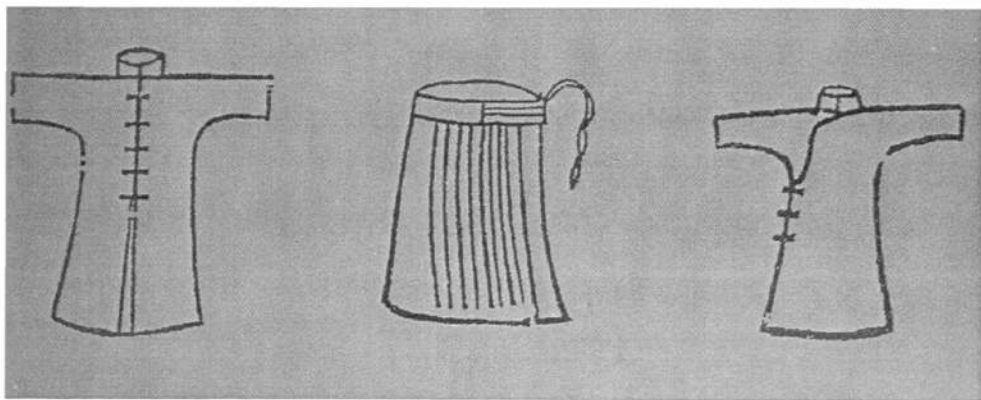
³ 李寓一：《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装饰的变迁》，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80 页。

⁴ 李寓一：《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装饰的变迁》，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80 页。

⁵ 权柏华：《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装饰的变迁》，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89 页。

⁶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 页。

久即以流行于各省内地矣”¹。对此权柏华也称“我国至甲午庚子以后，人民心理上大多媚外，无不在效法西人，西妇装饰，多喜细腰大裙，袜长过膝，袒胸露臂，卷发蓬松”²。当时上海的妇女率先兴起了兴起了一股短衣的潮流。但是，从种种奇装异服，“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³，“男则宽衣大袖学优伶，女则靓妆倩服效妓家。”⁴的奇怪现象看来，显然大部分的上海人并没有掌握时装与身体的搭配技巧，仅仅停留在求新、求怪的层面。“我国的女子大都是不懂昼夜的区分的吧，白昼在百货商店购物的时候，很自得地穿有夜礼服的奇景，非在中国是不能赏光的。至于在夜宴或舞场里，被一辈穿着夜礼服的绅士们所恭维着的一部女子，她们的身上却穿有厚厚的 Sports Dress 啊！”⁵。这种穿着上的不伦不类引发了《申报》关于国民着装规范的讨论。1911年11月9日《服式刍议》正式将这一社会问题提出，并从国家利权、社会损害、个人经济卫生三个方面出发，建议恢复满清之服。这个建议显然和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格格不入，未被采纳是必然的。但这却促使了民国第一个《服制草案》的出台。草案中规定女子服装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种。不管是礼服还是常服都采用套装形式。礼服上衣为对襟，领高一寸五分，用暗扣，五颗纽扣，长与膝齐，袖子口广六寸，与手脉齐，后下开端。常服上衣除了用右襟之外，其余与礼服相同。而裙子则礼服与常服相同，“前后不开，上端左右开”⁶。在7月临时参议院又把裙的颜色限定为红色。（如下图所示 礼服上衣（左）裙式（中）便服上衣（右））这套服装基本还是保留了



图片 3 《服制草案》的女子礼服和常服。图片来源：《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6月29号。

¹ 新依女士述，马儿先生记：《上海妇女之心装束谈》，《申报》1924年12月18日。

² 权柏华：《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装饰的变迁》，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289页。

³ 劣僧：《改良》，《申报》1912年3月20日。

⁴ 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⁵ 张丽兰：《流行界的悲喜剧》，《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页。

⁶ 《新服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第8版。



图片 4 着传统汉装的妇女照片。图片来源：白云：《中国老旗袍——老照片老广告见证旗袍的演变》，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清朝统治时期汉族妇女的衣装样式。在清朝统治没有覆亡之前，女装就有满汉两个体系。同时因为女子不读书、不考试、也不被授职，所以根据“男变女不变”的原则，汉族女装的传统样式被保留了下来。两个体系并行不悖但又相互影响，汉族女装虽然仍然保留了上衣下裳的结构，但是上衣明显的加长了。边角也有了开衩（如左图所示）。《服制草案》中的常装基本就是这件衣裳的翻版。服制是颁布了，但是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工业社会

和都市的发展都为时装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时装带给人们的新奇感还在升温，并且伴随着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

化运动，上海女性对美的渴望，也随之被唤醒了。在当时的服装上这种符号化的语言表现的非常明显。让妇女按照规定的草案着装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妇女装饰别论》将当时上海妇女的着装分为闺门、阔阔、写意、学生、欧化、写意六派¹，可见当时上海时装的多元化局面。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学生派，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笼统的观察起来，现代中国妇女界的装饰，有很明显的两种派别。

（一）学生派，（一）放任派”²。女人们独特着装风气的形成固然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然而男权社会的注视和欲望也是形成着装风尚很重要的方面。任何一个时代往往最受男子瞩目的女性群体的着装会受到最热烈的追捧。妓女，由于职业的关系，是一直受到社会关注的女性群体。都市的生活里，明星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物，在朝着都市化方向迅速发展的上海，被报章文人不断品评的书寓女子当仁不让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因为是“公众人物”的关系，世俗的规则也会因为大众娱乐的需要而对那些领一时风骚的书寓女子略为宽松些。娼与优从晚清开始成为上海的社会明星，上海人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穿着打扮。据时人记载清末

¹ 《妇女装饰别论》，《申报》1924 年 1 月 1 日。

² 露子：《论妇女装饰》，《申报》1924 年 1 月 1 日。

的官僚多喜欢购买娼优为侧室，“妇女妆饰的改革多创始于娼妓；官宦家的侧室多出勾栏，其妆饰当然与娼妓一律；富贵人家的妇女再相率效仿。于是新式的妆饰便可传染于上层人家的闺阁了”¹。民国时期亦是，1922年第13期《红杂志》上有一段记载：“不领之衣，露肌之裤，只要妓院中发明出来，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着传染病，比什么还快……”²，当时上海社会流行一种绿绸的裤子，它的传播力很大，凡是妓女，大半总是如此，仿佛这绿色便是妓女的一种标志。花界装饰的变化，原也是一件极寻常的事。不过几天之后就有人在路上瞧见几个良家的妇女，也穿着这上淡下绿的装束，挺胸凸肚，招摇过市，但是民国初年随着上海开放女学之风日盛，女学生也成为社会和男权注视的焦点。十里洋场追求时髦成为当时上海人的普遍心态。清纯女学生的形象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在当时，“时髦”一词远不足以形容女学生这一新潮人物出现在上海人眼里所显现的光彩和诱惑力的，“女学生”是一个戴着荣耀光环进而隐含着一些革命意味的名称。因而女学生的着装一度成为社会时尚的引领者。甚至妓女一度都戴上平光眼镜，穿着素衣长襟，扮成女学生的模样，因此上海社会形成了妓女仿效女学生，女学生效妓女的独特局面。着装上虽然承袭上衣下裙的传统模式，但是上衣逐渐缩短与腰齐，裙子也逐渐上缩，甚至出现了女士着裤不着裙的现象。至光宣年间上海的妓女们的服饰，“则更奇诡万状，衣之长及腰而已，身若束薪，袖短露肘……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³。而江南地区的开化妇女则“但得衣竹布衫，花布裤，变蹀躞道途，自以为备极华美矣”⁴。“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女学生着装影响很大。女学生上身多着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裙，下穿黑色长裙（如下图前排左一的女学生所示），衣衫比较朴素，较少用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这种装束时人送它一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在这一时期，上海女性中率先兴起一阵“文明新装”热，即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着，上海各界女性视之为时尚纷纷仿效。下边的照片是1920年务本女中部分女学生的合影图片中第一排最左边两位女性的着装就是二十年代最典型的“文明新装”。也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着装样板。同时，图片中我们亦可见改良旗袍的靓影。前排右一、右二的女学生的着装20世纪20年代初期改

¹ 权柏华：《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年版，第289页。

² 《妓女的衣着》，《红杂志》1922年第13期。

³ 《沪妓之服饰》，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66页。

⁴ 《开化妇女之服饰》，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66页。

良旗袍的基本模式。



图片 5 20 年代女学生着装。图片来源：薛理勇：《消逝的上海风景》，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9 页。

第三节 身体与服装的新空间



改良旗袍

到了 20 年代，上海经过欧化的洗礼已有 80 个年头了，人们盲目崇拜西方、羡慕西方的热情也慢慢冷淡了下来。是时候开创一种低调而优雅的着装了。改良旗袍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现在上海妇女的视线中。“20 年代，旗袍的刺绣和镶滚工艺由繁变简，造型上逐渐收紧腰身，突出人体曲线美。1929 年，民国政府规定蓝色六纽旗袍为妇女礼服。30~40 年代，旗袍的长度、领、袖发生较大的变化，成为盛行的女装，统称改良旗袍”¹。（见左图）

关于改良旗袍诞生的年代，学界也存在小小的争议。

图片 6 改良旗袍。图片来源：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前或者二十年代初和二十年代中晚期两种观点。持二十年代早期的观点的人有张爱玲、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202.121.55.10:918/web/index.htm>

¹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202.121.55.10:918/web/index.htm>。

郑逸梅、高讯、高春明、吕美颐、曹聚仁等人。持二十年代之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曹聚仁，作者在其回忆性著作《上海春秋》中称“旗袍的产生，大约在 1914 年到 1915 年间，风会中心，就落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上”¹。张爱玲将改良旗袍的穿着年代定位于 1921 年。“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²。其他坚持二十年代初观点的还有吕美颐、高讯、高明春等人。吕美颐称，“二十年代初，旗袍开始流行”³；高讯、高明春也在《中国历代服饰》中坚持“二十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⁴。而坚持二十年代中后期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周锡保的观点笔者个人认为比较可取，其认为“（旗袍）在民初汉族妇女着者还不多；到二十年代中期始，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就渐为一种普遍的服饰”⁵。坚持中晚期观点的还有黄能馥，陈娟娟，袁杰英，以及卞向阳等等，因观点几乎大致相同，所以不一一引述。从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改良旗袍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确有小部分人穿着，且以妓院的妓女为多。从周瘦鹃在《紫罗兰》旗袍特刊中刊发的其旧友朱鸳雏的遗作《旗袍》中“老林黛玉异时流，前度装从箱底搜，一时学样满青楼，出风头，一半儿时髦一半儿旧”⁶的记述中可以推断出朱先生认为 19 世纪末的上海名妓林黛玉是改良旗袍风尚的首倡者。而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又有妓女孔兰隐做旗装的记载云“妓女孔兰隐，瞟一目，雀斑满目。莲船盈尺，群下物无可以木质伪代，遂该做旗装，复更姓陈”⁷。以上材料可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旗袍在上海妓女群体中已有人开始穿着，但从作者的相关描述中可以推断，她们所着的旗袍并无被改良过，并且范围也相对狭小。到 20 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在上海社会大范围的普及起来。据时人记载，到 1925 年“上海妇女妇女无论老的，少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⁸。同时改良旗袍的变迁步伐一点也不输上海社会的日新月异。同时由于女学生的示范作用，改良旗袍作为自由和民主意识的先行标志，在上海范围内率先流行起来。屠诗聘先生在其《上海市大观》一书中对改良旗袍从 1925 年至 1940 年的变迁作了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并对改良旗袍的下摆的变化进行了图片化的记录。

¹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0 页。

² 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哈尔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³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 年第 6 期。

⁴ 高讯、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6 页。

⁵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4 页。

⁶ 朱鸳雏：《旗袍》，《紫罗兰（旗袍特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五号。

⁷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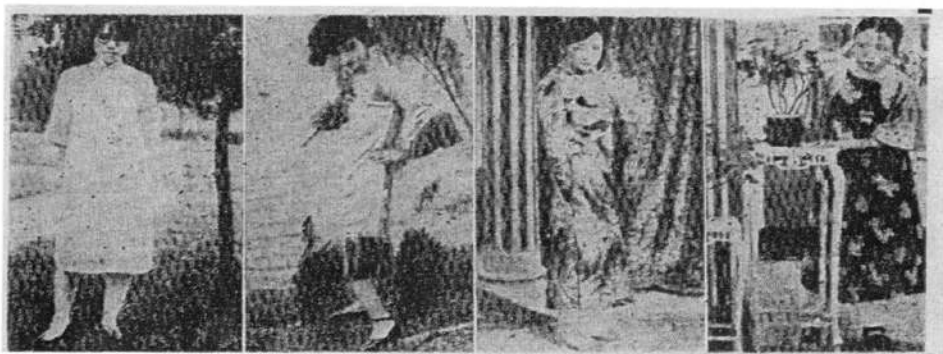
⁸ 周瘦鹃：《我不反对穿旗袍》，《紫罗兰（旗袍特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五号。

中国旧式女子所穿的短襖长裙，北伐前一年便起了革命，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短襖依旧，长马甲替代了原来的裙子。

长马甲到十五年把短襖和马甲合并，就成为风行至今的旗袍了。当时守旧的中国女子，还不敢尝试，因为老年人不很赞成这种男人的装束。

十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女子的旗袍，跟了政治上的改革而发生大变。当时女子虽想提高旗袍的高度，但是先用胡蝶摺的衣边和袖边来掩饰她们的真意。

十七年时，革命成功，全国统一，于是旗袍进入了新阶段。高度适中，极便行走，袖口还保持旧式短襖时阔大的风度，领口也有特殊的设计。



图片 7（从右至左）1925~1928 年上海妇女着改良旗袍的照片。图片来源：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第 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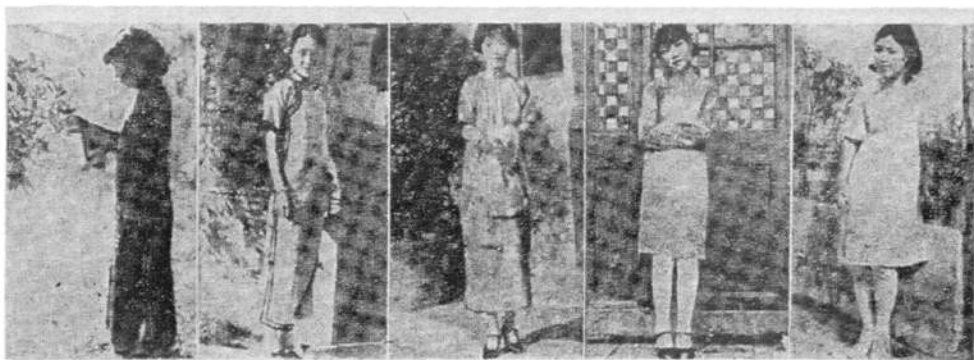
到十八年，旗袍上升，几近膝盖，袖口也随之缩小，当时西洋女子正盛行短裙，中国女子的服装，这是也受了牠的影响。

短旗袍到十九年，因为适合女学生的要求，便又提高了一寸。可是袖子却完全仿照西式，这样可以跑跳自如，象征了当时正被解放后的新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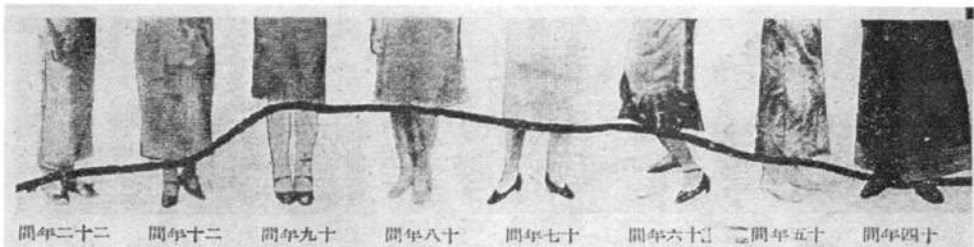
旗袍高度，到二十年又向下垂，袖高也恢复了适中的阶段，皮鞋发式都有进步，当年名媛许淑珍女士，她所穿的服装，正可充作代表

当时颇负时誉的上海交际花薛锦园女士，可以代表盛行于二十一年的旗袍花边运动，整个旗袍的四周，这一年都加上了花边。

旗袍到二十二年，不但左襟开叉，连袖口也开起半寸长的大叉来，花边还继续盛行，电影明星顾梅君女士，当时穿过这样一件时髦的旗袍。



图片 8 (从右至左) 1929~1933 年上海妇女着改良旗袍的照片。图片来源: 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 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 第 21 页。



图片 9 1925 年~1933 年间改良旗袍下摆的变化。图片来源: 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 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 第 20 页。

旗袍到了二十三年又加长, 而又也开得更高了, 因为开衩的关系, 里面又盛行了衬马甲, 当时的旗袍还有一个重大变迁就是腰身做得极窄, 更显出全身的曲线。

开叉太高了, 到二十四年又起反动, 陈玉梅和陈琦霞两姊妹都改穿了低叉旗袍, 但是长度又发展到了顶点, 简直连鞋子都看不见。

二十四年旗袍扫地, 到了二十五年, 因为对于行路太不方便, 大势所趋, 又与袖长一起缩短, 但是开的叉却又提高了一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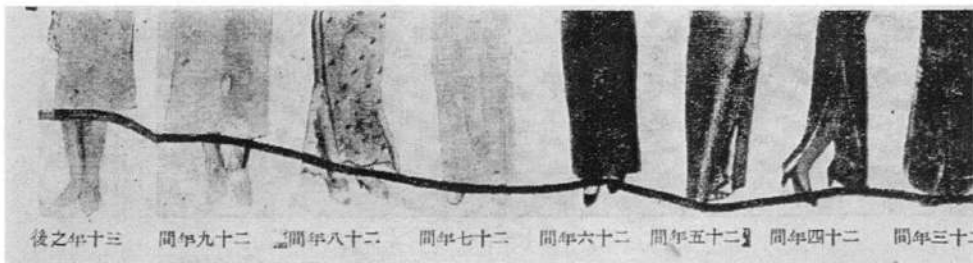
物极必反, 旗袍长度到了二十六年又向上回缩, 袖长回缩的速度, 更是惊人, 普通在肩下二三寸, 并且又盛行套穿, 不再在右襟开缝了。

旗袍高度既上升, 袖子到二十七年便被全部取消, 这可以说是回到了十四年时旗袍马甲的旧境, 所不同的是光光的玉臂, 正象征了近代女子的健康美。¹

¹ 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 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第 20 页, 21 页。



图片 10 1934~1938 年上海妇女着改良旗袍的照片。图片来源：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第 21 页。



图片 11 1934 年~1940 年间改良旗袍下摆的变化。图片来源：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第 21 页。

服装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产物。是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被誉为“非文本的社会思想史”，¹用衣冠服装区别尊卑善恶，是古人把抽象的礼义外化的一种方式。它是中华服饰文明相当重要的一个特征。改良旗袍是在满族旗袍的基础上形成的，满族旗袍代表的高贵典雅在这件衣服上得以再生，同时改良旗袍代表了近代中国革命化和服饰平民化的风潮，改良旗袍不仅强调平民实用的风格，体现服饰平等化的观念；同时又永远站在时尚的浪尖上，引领上海女装国际化和时尚的潮流。风行之始的改良旗袍是中式表观下的西化穿用，它在妓女式的放纵与贵族的矜持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衔接点，其既有中国服装传统的外观承袭，但又是西风吹拂下的传统变异。时尚美好出乎想象的强大力量，渴望和向往包括服装流行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社会风气，加上民众重视衣饰的习俗和传统服装制作业的基础，以及北伐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终于成就了改良旗袍的在上海以及中国的全面流行。

¹ 刘志琴：《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9 页。

第二章 新“装”宜面下珠楼

第一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职业状况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妇女如果让她们在一双 10 厘米的小脚和健康的体魄之间做一个抉择，大部分的妇女会毫不犹豫的扑向前者吧，这种自愿选择的背后固然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有关，然而男权社会的注视和欲望恐怕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必然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现实存在的困局，在《女性人类学》一书中禹燕用了倒金字塔结构进行了说明，所谓人类现实存在的金字塔指的是性欲、生殖等人类自然本能为基础的自然存在，位于金字塔的最底端，以职业、职位、阶级等为代表的社会存在处在中层，而理想、信念、思想等精神存在高踞顶端。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社会压抑，使得“女性存在的结构发生了惊人的变异，作为底座的自然存在上升为顶端，作为顶端的精神存在则下降为底座，从而形成自然存在压抑社会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压抑精神存在的局面”¹。漫长的传统社会以完整的社会化过程把中国传统女性塑造成社会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把女性角色固定为“女儿——妻子——母亲”的三重复合，并以这个角色限定着女性的生活范围。即使仅仅是自然存在，女性的身体也是不自由的，她们的脚被缠成三寸大小，她们的胸部被束成一马平川，她们身体可以被随意的买卖……而近代上海妇女的职业化的历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自然存在和社会、精神存在的困境，而她们的着装也随着职业化的脚步越来越现代化了，衣服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一种身体语言，讲述的正是“心理—生理—社会—政治”的故事。改良旗袍就是上海妇女的职业故事和职业心理的有效载体。

即使是在传统社会里，江南地区的妇女职业化的程度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高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职业的收入在国家和家庭经济生活中也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承担朝廷百万之赋，“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²。康熙中期，（乌泥泾农妇）“每日可织布一匹”³，按照当时一匹标布值银二钱，扣除工本，每天净余银一钱一分，“这就意味着：一个妇女劳动力以半个月时间织就十五匹布；

¹ 禹燕：《女性人类学：雅典娜一号》，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 页。

²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卷三十五第 1167 页。。

³ 樊树志：《上海谭 乌泥泾——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 页。

其收益相当于一亩稻田一熟的产量和收益”¹。从当时农村短工每天五分的工食银看来，妇女的收入比其高出一倍有余。妇女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担者。另外江南水路纵横，船娘也是很多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时人的竹枝词中称她们“桂棹呼依夜渡洋，习气染成时事派，炎敲熏透异乡身”²。这种职业一直持续到近代，据说收入还不错，以南湖的船娘为例，“好的时候，便是热天，来回一趟总要一元”，一天下来“总要有三四元的收入”³。妇女的职业化道路和收入的增加为她们的自然存在营造了极大的空间，妇女的身体获得解放，衣饰方面她们喜欢模仿男性的穿着，试图营造男女平等的氛围。包天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称满清时期的“江浙两省的乡村妇女，全数是不缠足的，所以它们和男人一样赤脚下田，视为常事。到了夏天，男人裸上身，女人到底不好裸体的，但年老的妇女，往往只穿一马甲。下身穿裤穿裙”⁴。这种大胆的臂膊全露的服装，即使当它在20世纪30年代末再次出现在当时号称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时，引起的震动仍然不少。而《清稗类钞》中亦载：江浙人之服饰，不仅大异于北，即在南方，亦为特殊，苏州风俗浇薄。康熙时之服饰，奇邪已甚，时有做吴下谣者，可想见之。谣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巾，女儿倒要包网巾，……”⁵。当时妇女们独特的服装和装扮可以说是妇女经济地位的重要象征。即使到了近代，这种风气仍然在上海妇女身上上演，《清稗类钞》中记载光宣年间上海的妓女“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⁶。竹枝词中亦有云“半臂轻裁蝉翼纱，襟儿一字（一字坎肩向惟男子服之，今则流行女界中）尽盘花，如何密作同心扣，扣住侬心不忆家”⁷。

但是江南妇女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没有持续多久，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输入与日俱增，各种洋货源源而来，充斥在中国市场上“洋布、洋纱、洋花边、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⁸。曾经号称衣被天下的江南棉布业市场的萧条，使得许多江南乡村妇女收入锐减不得不去就近的上海谋求就业的机会，而成为最早的近代产业女工。“人民职业出路惟何？曰惟上海”⁹。

¹ 樊树志：《上海滩 乌泥泾——绌布二物，衣被天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² 袁祖志：《海上竹枝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³ 葺余：《南湖的船娘》，《申报》1932年11月4日。

⁴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大华出版社1974年版，第135页。

⁵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8页。

⁶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72页。

⁷ 包天笑：《上海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⁸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5页。

⁹ 方洪恺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第五卷工业概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而当时外国资本家和中国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开办了很多工厂，为广大农村妇女进入上海就业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伴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上海出现了很多新型的服务业和娱乐业，迫切需要大量服务人员和从业人员。女性开始进入更为广泛的职业领域。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职业女性的城市，也是从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根据 1920 年的一项统计，在当时约 75 万左右的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包括学生、教师、医生、看护妇、编译者、宣教者、音乐家、画家、商人、船户、渔人、农妇、工人、伶人）约有 30 万之众¹，占了整个女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左右。

李长莉认为最早走向上海社会的职业妇女，并非都是产业工人，即使在数量方面，妓女、女堂倌、佣工、女艺人等等也远超前，她们也是最早的职业妇女之一²。跟其他女性职业相比，娼妓是一个略显古老的行业，也是上海近代职业女性群体中占人数比例较大的职业，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她们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也愈来愈高了。随着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大批秦淮河沿岸的妓院移至上海，战乱和饥荒也使得大量流民女性进入上海，同时由于租界对于妓馆的纵容态度，使得近代上海妓院和娼妓的数量急剧增加，到 1869 年时据称上海有“堂名”的正式妓馆就有数千家，妓女数千人，再加上烟花间那些没有名号的妓女，总数不下万人³，而到 1920 年，根据法国学者安克强的考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妓女总数达到 15000 人到 20000 人之间⁴。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因为对法租界区域以外的妓女数量的统计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对妓女数量的结果不同的结果相差很大 1926 年据称仅法租界就有 4000 指 5000 名妓女。⁵而 1937 年中国代表在亚洲各国中央政府会议上披露的妓女数量有 2000 人⁶，但是与此同时上海生活中易人则声称，据最近上海泰晤士报：“以调查所得，公共租界内共有妇女三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四人中，操淫业者约为二万五千人”⁷。这个数据也与上海几个妇女组织在一次报告中的公共租界的妓女数量⁸相吻合。

众所周知，妓女是社会受到男性群体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群体，她们出于职

¹ 曙梅：《上海妇女的生活》，《民国日报》1920 年 6 月 24 日。

²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7 页。

³ 《中外新闻》，《上海新报》1869 年 10 月 23 日。

⁴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0 页。

⁵ 醉里颜唐生：《上海之妓》，《新上海》1930 年第 12 期。

⁶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0 页。

⁷ 易人：《夜市街头——漫谈浙江路》，《上海生活》1937 年第 5 期。

⁸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0 页。

业的需要，往往浓妆艳抹，装饰上也是“岁易新式，靓妆倩服，悉随时尚”¹，“盖欲以标新领异，取悦于狎客耳”²。她们的职业也使得她们往往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反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主张，所以在服装上的选择更加自由和放松。对于她们来说，极力表现符合自己生存状况的形象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这种修饰彰显和强化男性对于她们的性征的欲望，她们对于世俗的眼光不以为然，成为女装改革的先驱。近代以来她们的着装也越来越具有时代气息，她们把一些小铃铛缝在裤脚上，当她们走近时便做叮铃之声，引人注目，有一段时间还流行过一种内部藏有彩色小灯泡的绢花，将它缝在衣服上或是别在头发上，入夜时分，便闪烁不已。她们时而带满头的珠翠做贵妇之姿，时而清新爽洁扮成文明的女学生，时人记其“邂逅之间，都半似含羞，半露淫佚，……所以有此含露，亦有略仿学生妆者，反觉婢学夫人，不大自然也”³。下图是1913年时年14岁的董竹君（时名杨兰春）进入妓馆卖唱时去时芳照相馆拍第一张照片，穿着当时最时髦的黑纱透花的衣裤，高耸的蚌壳式的领子，窄窄的裤脚，大开气的下摆，时兴的刘海剪刀式，如果不说破没人看得出她与女学生有什么区别。而这种妓女效仿女学生的清纯装束也迷惑了1928年刚从日本来中国不久的芥川龙之介，他在《中国游记》



图片 32 1913 年董竹君的时装照。图片来源：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 页。

中花费了三个篇章记载当时的

“南国美人”以及她们的着装：

爱春“看起来十分伶俐，长着一张端庄的圆脸，有点儿像日本的女学生。穿着带有白色织物的浅紫色上衣和青瓷色裤子。头发像有的日本少女一样，从根部用蓝色的束带扎着长长地垂在后面。额头的刘海也和日本少女相差无几”⁴。另外那两位叫时鸿和天竺

的年轻妓女除了着装颜色和爱春有所区别之外款式上几乎没什么

¹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6166 页。

²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6166 页。

³ 屈半农：《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93 页。

⁴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变化，时年五十八岁的名妓林黛玉亦是带着银色花边的兰花黑缎面上衣和同样颜色的裤子，而另一位年纪稍长的洛娥和“具有大家闺秀般气质的”花宝玉从作者对她们服装的描述来看，两位可能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旗袍，只不过前者穿的是黑色的，而后者是浅紫¹。唯一能看出她们与女学生的不同在于她们的身上几乎都带着价值不菲的首饰，耳环，手镯，胸针，而林黛玉手上的戒指上镶嵌的钻石竟有有鸟蛋般大小²。实在不能不引起别人的侧目。

女工是大部分移民妇女进入上海的主要就业途径，被称为“湖丝阿姐”的缫丝女工曾受到当时还在堂子里卖唱的幼年的董竹君的羡慕³，但是这些在作者眼里看来自由、快乐的妇女是否真的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呢？《上海乡土志》中云“本邑妇女向称朴素，纺织之外，亦助农作。自通商以后，土布滞销，乡妇不能得利，往往有因此改业者。近来丝厂广开，各招女工以缫丝。此外精于铁车者，可制各种衣服及鞋袜；精于针黹者，可制各种顾绣；精于手工者，可制各种绒线之物。苟擅一长，即能藉以生活”⁴。根据 1898 年 10 月《女学报》的统计上海有 50 多家缫丝、纺织厂，有女工约 6 至 7 万人⁵。董竹君看到的是工厂直接雇佣的上海地区的女工，还有很多绍兴帮中的女工是包工制。而她们中多数人是像夏衍先生调查的那样，因为家乡遭灾，被那些同乡用大洋二十元的包身费从江北或者其他地方诓骗而来⁶，主要集中在纺织、烟草、成衣、火柴、食品和印刷等行业，其它行业罕见有大量使用女工的情况。随着现代工业在上海的蓬勃发展，女工的人数急剧扩充。据 1930 年国民政府工商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女工 374, 117 人，上海一地就有 188, 188 人；而当时上海男工人数为 154, 955 人⁷。以后，随着产业格局调整，女工比例略有下降，但仍占工人总数的 43%以上⁸。1946 年，上海工人人数大幅减少，但女工总数仍保持较高水平，达 85, 570 人，占工人总数的 57%左右⁹。上海市 1946 年各业从业人数和女工人数表格如下：

表格 1：上海市 1946 年各业从业人数和男、女、童工人数，女工比重图。

职别	总人数	男工数量	女工数量	童工数量	女工百分数
----	-----	------	------	------	-------

¹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42 页。

²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 页。

³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 页。

⁴ 李维清著，吴健熙标点：《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3 页。

⁵ 刘白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3 页。

⁶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 页。

⁷ 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1934 年》，申报年鉴社 1934 年版，第 86 页。

⁸ 刘明速：《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 页。

⁹ 《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市社会局出版 1964 年版，第 16 页。

合计	149652	58618	85570	5464	57.18%
造船	582	544		38	
机器制造	5818	4055	426	1337	7.32%
五金制造	1112	694	156	264	13.85%
印铁制罐	684	392	219	73	10.67%
制针	1118	600	297	221	26.57%
面粉	921	918	1	2	0.11%
榨油	758	756	2		0.26%
调味品	194	158	34	2	17.53%
罐头食品	484	282	187	15	38.64%
卷烟	17463	3100	14002	361	80.18%
橡胶	4309	1927	2344	38	54.40%
火柴	2471	1046	1301	124	52.65%
皂烛	192	168	24		12.5%
制药	1674	767	894	13	53.41%
酸碱	95	95			
搪瓷	485	459	12	14	2.47%
赛璐珞	63	54	4	5	6.35%
制革	751	597	2	152	0.27%
玻璃	1920	1391	23	506	1.20%
翻砂	902	615	3	284	0.33%
棉纺织	56231	13968	41837	426	74.40%
毛纺织	5325	1799	3445	81	64.70%
丝纺织	4546	2130	2328	88	51.21%
骆驼绒	73	37	35	4	47.95%
染织	20160	7730	12106	324	60.05%
针织	5423	1527	3709	187	68.39%
制帽	490	305	145	40	29.59%
内衣	964	470	423	71	43.88%

毛巾被毯	721	247	437	37	60.61%
造纸	487	379	98	10	20.12%
印刷	1444	1155	72	217	4.99%
铅笔	48	19	25	4	52.08%
造漆	120	109	8	3	7.34%
制盒	138	103	5	30	3.62%
制伞	216	136	32	48	14.81%
电镀	329	207	3	119	0.91%
电工器材	1594	1029	338	227	21.20%
化工器材	1081	833	248		22.94%
热水瓶	580	410	80	90	13.79
公用事业	7685	7406	270	9	3.51%

资料来源：《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市社会局出版 1964 年版，第 16—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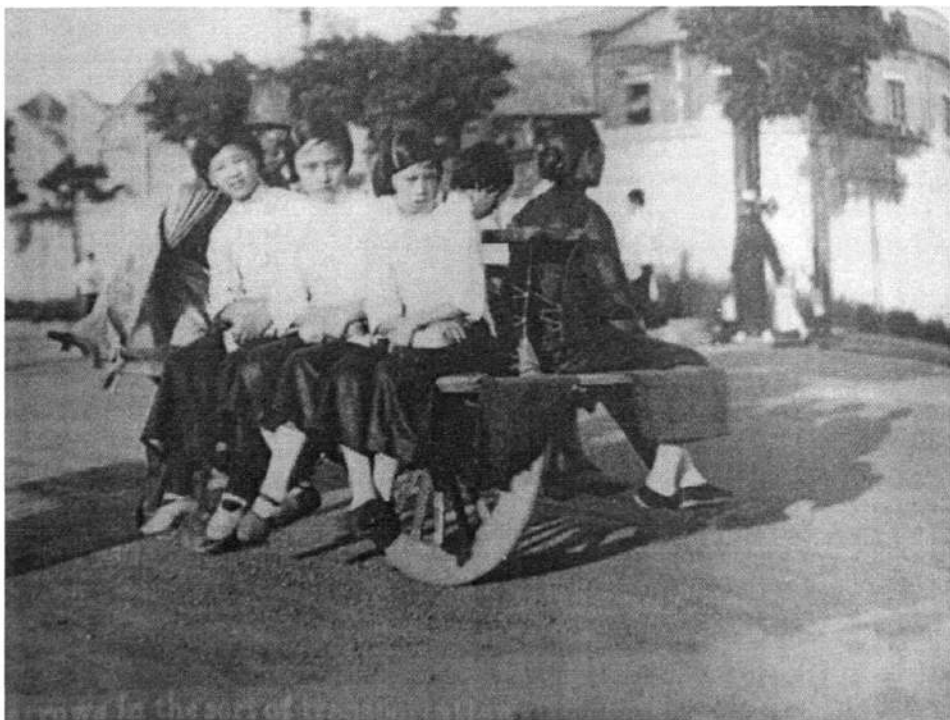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工充斥在卷烟、棉、毛、丝纺织，染织、针织等传统女性从事的行业中，其中卷烟业的女工比重最大，高达 80% 以上。女工因为低廉的价格而受到上述工厂的青睐，夏衍先生通过亲身的调查，揭露近代上海包身女工的悲惨命运和低廉的劳动成本，“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常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¹。并且她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一二八”战争之后，包身工的成分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东洋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数在二万四千人以上！²当然你也可以从着装中轻易地判断出工人不同的身份，外雇的工人，董竹君称她们“穿着天蓝色的布衫，提着竹篮饭菜”³。而夏衍先生的调查也大致相同，她们同很多年轻的姑娘一样，爱时髦爱漂亮，她们是与包身女工命运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河流”，她们当中“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

¹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 页。

²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 页。

³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 页。

头发”¹。正如当时的歌谣里唱的那样“栀子花，朵朵开，大场朝南到上海，上海朝东到外滩，缫丝阿姐好打扮，刘海发，短口衫，粉红裤子肉色袜，蝴蝶鞋子一双蓝”²。下图是当时的湖丝阿姐们坐车上（下）工的照片，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剪着短发，上衣下裤，白色或黑色的长袜，左前侧背对镜头的是一位年纪稍长的妇人，穿着改良旗袍，挽着S头，应该是一位那摩温（是英文“Noborone”的音译，即“领班”的意思）而包身工与这座城市的时尚和摩登是绝缘的，直到



图片 13 湖丝阿姐上（下）工的照片。图片来源：薛理勇：《消逝的上海风景》，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1930 年代后期，“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³。她们的着装和行为是绝无可能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时尚的，她们也没有模仿流行的能力，即使在上班的路上与外面来的工人相遇，“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是她们的不亲近的原因。过分的看高自己和不必要的看轻别人，

¹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 页。

² 吴红娟：《职场丽人》，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0 页。

³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 页。

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的存在着的”¹。

“沪江女子百无忧，午后妆成始下楼。罗鞋绣袜皆可买，还教仆妇代梳头”²。这首竹枝词生动地描绘上海富家女子过着由众多女佣服侍起居的悠闲生活的情景，上海的繁荣，使得中外四方商贾云集此间，为服务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除了传统的妓女、女佣外，女侍者，招待、舞女/、女演员、艺人等新型职业出现在女性的选择范围之内。当时的上海华洋士商，凡中人以上之家，无不雇佣女佣照料家务。“上海……合城内外，洋场南北，岁有百金，家三四月口人者，无不雇佣佣妇，大抵皆自乡间来”³。而乡间贫穷女子别无长技，又无知识技能，来到上海谋生计，最易于从事的职业非女佣莫属，料理衣食、浣衣浆洗、伺候起居、端茶送水等生活杂务，是她们以往在乡间从事惯了的，她们靠着这种传统技能在城市做女佣，上海人称为娘姨，就可以换得糊口之资，自然是最为便当的谋生之路。由于女佣来源多多，佣资低廉，有的一家至用数个。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甚至出现了专门替人梳头的梳头佣，竹枝词中说她们“梳头佣，手段工，替人梳头真玲珑。又快又光又时路，梳好西家又梳东，中国妇女真懒惰，说起梳头暗叹苦，自家的头梳不光，枉生一双好手儿”⁴，《上海风土杂记》中称，这些梳头的女子大都来自于苏州，“姑苏妇女最擅梳髻。有盘龙、香蕉、胡蝶、苹果、玉桃诸名称。发光可鉴，手工绝佳，真是古人说的蜻蜓飞上玉搔头。今则风行剪发。而保留青丝者犹有其人。恒有一部分姑苏妇人专代人梳髻为生”⁵。而当时的女理发师也有竹枝词说她们“为人剃面亦生涯。终日奔波各大家。只要机灵工献媚，有时特党出娇娃”⁶。当时上海风俗已婚的娘姨，东家一般按照姓氏称其为×妈，或按其籍贯称为绍兴娘姨，宜兴娘姨等等，若是未婚的姑娘则称为大姐。娘姨们不仅忙碌在市民人家，在妓馆里也聚集了不少从事陪同出局，协助接客的娘姨和大姐们，她们中的很多人虽不识字，但是职业的需要却使得她们的头脑十分精明，待人接物十分圆滑，“会鉴毛辨色，八面玲珑，左右逢迎，少一点心机都不行”⁷，竹枝词中称她们“时髦大姐戴金钗，跟局随与过六街，两足如霜温似玉，兜云罗

¹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 页。

² 《上海竹枝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4~425 页。

³ 《书朱陈氏愿归原夫事》，《申报》1883 年 8 月 7 日。

⁴ 颠公：《三百六十行营业谣》选自胡祖德著《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2 页。

⁵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上海风土杂记》，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932 年版，第 51 页。

⁶ 顾安主人：《沪江商业景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4~425 页。

⁷ 程乃珊：《上海 LADY》，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 页。

袜着拖鞋”¹。她们有时候也要帮助妓女接客，六勿山房主人在其《申江杂咏百首·娘姨》中也称她们：灵心俏步活双瞳，觅觅寻寻西复东。获得檀郎如至宝，但看笑递水烟筒。²（如下图所示）这是上海妓女出局到杏花楼西菜馆时的情景，一位娘姨搀扶，并拿烟袋手巾，小大姐携琵琶走在前头。董竹君当时身处复杂的情势中也是一位姓孟的负责给她梳洗的娘姨给她出谋划策，鼓励她认清形势，逃离虎口³。而根据包天笑先生的回忆，当年那些在妓馆里比较出名的大姐也被称



图片 14 清末妓女应局图。图片来源：侯杰、王昆江编著：《醒俗画报精选：清末民初社会风情》，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为“名叶”，后来与作者相识的服侍金湘娥的阿金姐，也是作者的同乡，就是当时北里的“名叶”，年仅十八九岁，与作者有过一次共同乘坐烟篷船的经历，待人接物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全无乡间女子的扭捏之态，使得作者在古稀之年对这个“又温柔，又豪爽”的女孩子仍然念念不忘，称之为他的初恋⁴。

而这些原本朴素的农家女子，她们进入繁华的都市，沾染了都市的时髦气息，一扫原本质朴单纯的乡土气息。“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聚变矣。妆风雅，爱打扮，……”⁵，有着一定经济来源的娘姨们，由于耳濡目染也渐渐的摆脱了乡

¹ 申左瘦梅生：《沪北竹枝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1 页。

² 六勿山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娘姨》。选自葛元熙编著：《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 页。

³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 页。

⁴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83~187 页。

⁵ 《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 年 9 月 27 日。

土气息，讲究穿戴，时人做竹枝词称她们，“苏州大姐眼如波，山上姨娘各处多，觅得佣资工打扮，为贪野合着绫罗”¹，而三十年代的一个幽默对话或许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乡下娘姨们追求时尚的步伐。

“你家里新近从乡下里来的娘姨，渐渐地惯常上海的生活了吗？”

“唔——差不多了，她这两天连小马甲都不穿了。”²

妓馆里的娘姨和大姐虽然褒贬不一，但是用近代商业推销的眼光来看，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包装手段，以男性顾客为对象的妓馆，女性的吸引力无疑是明显的，这种理念在近代上海迅速蔓延起来，女性出现在服务行业的各个领域，堂倌，侍者，空中小姐，理发师，售货员，电话接线员，电台播音员，售票员，伴舞女郎，甚至影视界的各色女明星等等。

女堂倌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早的称谓，根据李长莉的考证，最早起用女子从事服务顾客的是与妓业并立的烟馆业，由于最早用年轻女性从事服务，烟馆一度生意十分繁忙，甚至吸引了那些小商贩、店伙、佣工、轿夫等下等人来光顾³。陈伯熙在《上海轶事大观》中亦载，“同治末年，沪上南北两市洋烟盛行，烟肆林立。另有一种烟间，雇用苏州淫荡女工充任堂倌，以广招徕，名曰，‘娘姨烟间’，烟客贪价值之廉，费银一、二角即可任情调笑，真个销魂，于是无论老少趋之若鹜，血性未定之青年因而受害者，不知几许”⁴。这些成功的范例无疑是最好的商业教科书，使得各行各业都开始用女性作为招徕顾客额重要手段，很多地方以女招待作为招徕顾客的噱头，1933年《申报》上镛记大世界的广告词中声称：“门票每位小洋两角，各场全体女子招待”⁵。尤其是到了近代，伴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女子走出家门走上社会，接受职业的考验，并且利用自身的耐心，细心的优势在服务性行业中创造出自身的价值，其中最为上海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康克令小姐，康克令是当时的一种美国生产的金笔（ConKlin）的名称，在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一楼设有专柜，聘请的销售小姐，不仅年轻，漂亮而且谈吐高雅，略懂英文，徐铸成1936年到上海时还特地花了四块大洋买了一支金笔，半个世纪后老人家还对这位小姐评价很高，称她“明眸皓齿，不负众望”，康克

¹ 顾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² 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³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414页。

⁴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⁵ 《镛记大世界广告》，《申报》1933年9月28日。

令小姐创造了一个销售界的神话，包括章太炎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名人频频光顾，永安公司金笔的销量在全国一直独占鳌头，不能不说是这些声音轻柔，温文尔雅的康克令小姐们的功劳。英国人霍塞在他的回忆录《上海近代百年小史》中这样称赞这些有着极好的导购形象和高素质的女店员。

离开黄浦滩一哩之遥，在南京路最热闹的一段上，你可以看到上海的三大百货公司：新新、先施和永安，都是世界上稀有的可供人游览的大公司。你在里面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美女了。她也许是一位买办的女儿，身上穿着材料非常之名贵悦目，裁剪非常之称身的旗袍……她的身材非常之苗条，态度非常之贵族化。

她们的经典装束大都是这样的，头发前面是平直的，后半部分烫成许多小圈圈，一色深蓝的合体旗袍，¹加上一枚胸针。她们也成为当时上海滩美丽，时髦女性的代名词，康克令小姐的职业化微笑，引领了南京路上时尚的脚步，许多人纷纷效仿她们的装束。大部分的侍者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并且受过相关职业的培训和教育，餐馆、咖啡馆的女招待就是其中一例，她们大部分都穿着合体的制服，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以沙利文咖啡馆的女侍者为例，“她们常年穿着绿白相间的裙式制服，天热时是布料，秋凉后则换成呢料，全都彬彬有礼，训练有素”。而同样在新亚酒店供职的几位妙龄女子，也是根据供职岗位的不同，着装各不相同，其中问事处的问事员有三人，着的是淡红色的西式制服，电梯间的司机员四人，穿淡绿色的西式制服，中菜间的女侍者六人着淡绿色的制服外有白围。其他在电话间的接线生六人和衣帽间的侍者一人，因为并不出现在顾客视线中所以没有规定的制服²。空中小姐也是如此，根据其中唯一一名还健在的叫陈智慧的空姐的回忆，她们的制服是一身奶黄色的哔叽制服，西式上衣，下身同颜色的裙子，脚下一双黄色的高跟鞋，肩上挂一个黑色的皮包，头发清一色烫成髻髻的，用发夹别在耳后，好似一大花苞³。但是这些女性往往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据民航资源网的统计，到中国航空运力最高水平的1948年，中国仅仅有空姐20多人而已⁴。也已经创下历史的最高点。下图是陈智慧女士1948年在上海龙华机场结业典礼上的照片，13名飞行小姐，着一样的套装，英姿飒爽，妩媚而又不失端庄，西

¹ 霍塞：《上海近代百年小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² 贤影：《职业女子访问所得：新亚酒店女职员的思想与生活》，《申报》1936年9月9日。

³ 吴红婧：《职场丽人》，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⁴ 《国航7代空乘的历史回顾：两航起义时期陈智慧》中国民航资源网，网址 <http://www.carnoc.com/txtm/article/878.html>



图片 15 1948 年上海空姐结业照片，图片来源：飞呀网，网址
http://news.feiyoo.com/News_11669.html

式套装进入中国的服饰体系，简洁大方的外观影响了中国女性的审美观。这种直线型的外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良旗袍的外观审美设计。更有甚者在公共汽车车上的售票员也有女性充任，“车内看见那个卖票的居然是女子，穿着蓝布旗袍，背着钱袋……有人说：“自从用了女

卖票后，公共汽车的营业的确大盛，有的本可以坐电车的，也改乘公共汽车了”

在所有的这些职业中，最能够引领时尚潮流的非女影星，明星，舞女莫属，竹枝词称她们“信人切莫叫时髦，一到时髦架子高。唱罢一声对弗住，回身谁复念吾曹”²。中国最早有女明星出现是在 20 年代之后，她们借助屏幕实现了女性自我价值发挥的一个神话，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成为家喻户晓，光芒四射的巨星似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第一代女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当时舆论封为“四大名旦”的四位女性，她们是王汉伦、张织云、杨耐梅、韩云珍。她们一新女性的姿态和面貌出现在银幕和报章上，吸引了上海市民的关注。曾经有小报记者冒着十二月的寒风，苦苦守候在王汉伦的窗下达三小时之久，目的只是写一篇关于她唱的《马赛曲》的报导。而杨耐梅自创的一种“袒臂露胸，长不逾膝，下无裙裳”的“耐梅装”居然震动了长沙市公安局的周安汉局长，发出禁令，并派出岗警严厉惩处究办，引发了女学生的不满和抗议。³章英也在她的《妇女服饰的派别》一文中称，“现在的服饰可称电影服饰，因为现下流行的服饰大多是一般电影女演员造成的，她们在扮演的时候，已经不能常着一色的衣服，那必须时常换新，衣服的样色，必须开未尝有，必须调和颜色的美观求观众的赞美，那好学时髦的妇女，不知不觉的随着她们变动了”⁴。女明星们用事实证明女性也可

¹ 影客：《女卖票》，《生活》1930 年 3 月 30 日第 5 卷第 16 期。

²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7 页。

³ 《长沙禁止妇女奇装之纷扰》，《申报》1929 年 7 月 13 日。

⁴ 章英：《妇女服饰的派别》，《申报》1925 年 12 月 21 日。

以获得空前的成功，与她们有着同样社会成就和地位的是被称为“名媛”的其它社会女性，她们当中不乏不依赖男人，取得事业成功的女性，其中包括被称为中国的娜拉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子银行第一位董事长欧谭惠然，总经理兼行长严叔和，以及 1932 年担任银行副经理的张幼仪，著名的女报人陈擷芬，这当然更少不了著名作家张爱玲等人，她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近代上海女性更大的争取职业地位的信心。当然其中也包括很多家世显赫，才华横溢，在社交场上出尽风头被称为“交际花”的女子，也包括在政坛上留下轨迹的女子。改良旗袍成了这部分女性的主要的道具，是她们融入男权社会的重要符号。改良旗袍的普及与她们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她们留下的传世照片中，几乎全是改良旗袍的影子。如下图所示：下图中人物分别为，上排从左至右，交际家苏佩秋女士；云裳时装公司创办人之一唐瑛女士；宋美龄女士。下排左：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女士；右：著名影星张织云女士（中）



图片 16 民国名媛，明星图片汇集。图片来源：《北洋画报》1927 年第 104、145、132、111

期。

普通电影明星的着装，包天笑在《上海春秋》中称她们着装讲究“诡奇”，

富于创造性，“穿出去的衣服，总教人注目”¹。在跳舞时，穿的是“一件藕合色巴黎缎绣着白花的舞衣，腰身是紧而且短，那衣服是没有衩的，紧束在腰里，越显得腰肢的细软，袖子的半节，用带子镂空编着，带子里面，掩映露出上臂如雪一般的玉肌……下面系着一样颜色的裙子，所特别的就是在裙子之外，又加了一条很长的飘带；足上是穿了一双泥金革履”²。而当需要某种爱国宣传的时候，用明星做示范似乎总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0年代末，上海“蓬莱市场”落成。场主匡仲谋委托我邀请电影界人士在开幕时剪彩，藉造声势，以资号召。我与电影界朋友韩兰根谈起，他建议我到时不妨邀请女明星穿土布旗袍以示提倡爱用国货，抵制洋货。这一建议得到很多人赞同，蓬莱市场内一布店经理还表示愿免费赠送布匹，给到场的电影女明星每人一件旗袍布料，一裁缝店老板免费缝制旗袍。于是改剪彩为发起劝用国货的土布运动。蓬莱市场落成典礼也被称为国货典礼。我在中华电影学校与蝴蝶为同学，便邀了蝴蝶、夏佩珍、陈玉梅等都穿土布旗袍。在博览书局门口站立着摄影留念，这一举动引人注目，后来江浙两省，群起效尤，掀起一场穿土布的热潮。³

进入近代以后，上海社会里受过教育的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当中很多人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在培养师资方面规定：“增设师范学校”；“师范学校附设讲习科”；“各省有已在女子中学毕业，任教员，……应于该省区师范学校，筹设第二部，得于短期内成就师资”。与此同时。教育部基于女子中学教员缺乏的现实，预备发展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等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女性教师群体的扩大。1921年《申报》记载，“凡中等以上女校毕业生，各地争先延聘，大有求过于供之势”⁴。据对上海各学校的调查，1930年在上海的小学教师中（包括幼稚园和小学），女教师占31.7%；中等学校（包括中学和职业学校）女教师占中学教师总数的18.2%。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12所大学共有女教师46名，只占全体大学教师总数的5.33%⁵。女性教师群体的人数也在上海近代化的过程中日益壮大起来。

动荡不安的局势绝大多数的妇女意识到在战争中奔跑需要的不是典雅而是

¹ 包天笑：《上海春秋》，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² 包天笑：《上海春秋》，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0页。

³ 汤笔花：《电影明星群穿土布旗袍》。华道一主编：《海上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⁴ 《女学生的职业》，《申报》1921年6月27日。

⁵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31页。

便捷，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深入，妇女开始走上职业岗位，她们醉心于职业带给她们的成就感和社会地位，开始刻意逃避服饰中的平民感。同时由于新的交通工具如自行车，敞篷汽车的出现，使得宫廷式和复杂的女装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以同一颜色、风格和布料为特点的简化服装已蔚然成风，人们不再需要那种使身体扭曲变形的紧身衣，开始拒绝那些强调女性特征的设计，而是需要更多的腿部自由。于是女人开始向男人的衣橱进军。直筒型的外观骤成时尚。风靡二十年代的夏奈尔小黑裙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同时近代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最繁华的地方。也为很多女性提供了就业的岗位。职业使得她们获得了经济上的部分或全部独立，也使得她们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经济的独立使得上海的女性获得了服装购买机会的同时，也获得了购买理想形象的可能性。但是，职业和新生活的需要，使得妇女的着装不仅仅停留在“新奇”、“时髦”的阶段。同时上海的妇女虽然获得了职业的地位，但是从上面的职业人数的分布来看，上海妇女的职业并没有给广大女性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以身体和自身优势为起点的工作占了就业人数的大部分，没有使她们摆脱身体被商品化的命运，她们的职业仍然没有跳出发挥女性自然本能的便利性和被欣赏，被消费的牢笼，她们仍然是男性色情想象的目标。杨公怀在1939年的《上海职业界的女职员》一文道尽了女职员不为人知的无奈与痛苦。

在上海女职员的总数，估计起来至少也有十万左右，。除了女银行员，女书记员，女打字员外，大多数是女店员，她们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着。而在这男性中心社会里，她们还是到处被利用、被轻视、被人侮蔑的“花瓶”。而实际上这群职业妇女的生活史十分凄苦的。

女职员的第一苦闷，便是寻求职业的困难。因为在失业浪潮澎湃的现社会，男子们尚且失业者众多，找事做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女子呢？而办公室里几个女职员的确能够把空气调剂的生动一些。百货公司和商店里有了女职员，因女子的性情比较和顺，容易使顾客满意，所以尽管求业困难，还是有一部分妇女总算勉强得一职业。而在招考女职员的时候，一般雇主录用的标准，学识修养倒在其次，“卖相”却不能不相当可以。因为社会是这么一个社会，女职员们为保持职位计，便不得不注意“外表”。于是我们看待的女职员，几乎全是卷发时装，皮鞋跟高得三寸多。脸儿搽得白白的，还涂着

血红的胭脂，弄的每月的收入。连买衣料化妆品还不够。这是社会的责任，我们当不能单去苛责女职员们。

女职员的第二个苦闷，是应付周遭的男子们。她们除了守住自己的岗位。克尽厥职外，有时还会无端地遭受旁人的侮辱。有的上司利用了自己的权势，对下级的女职员们任意的表现着不尊敬的轻薄态度，甚至浪谑调笑，弄的女职员们啼笑皆非。假使严词峻拒，饭碗要成问题；假使虚与委蛇，有与名誉有关。那些女店员们更困苦了，每天上午九时开始营业，直到下午八时打烊，整天除了吃饭外便没有休息时间。偶一贪闲，假使顾客光临，不是要遭上级主任的“排头”呢？还有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顾客们，和女职员们动手动脚，这种侮辱，是每个女职员经常受的。……¹

改良旗袍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职业女性的身份象征，也是上海妇女的名片，她们创造了都市的繁华，塑造了上海的招牌形象。是上海风情流行的媒体。改良旗袍似乎适应每一个上海女子的体型，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简洁而又优雅的改良旗袍成为了上海妇女的标准着装。但是改良旗袍宣泄着的同时也有上海女子的无奈。毓白的观点似乎更能说明她们的无奈，“近代的女人随着生活程度增高的情况下，益形表现着，被视为玩物和娱乐的器具，短衣变为旗袍，短袍一翻又变为长袍，因为这是适于舞蹈，闲步做男人的伴随的，这些进步正是相反的，是进步的障碍……女子在这个社会里脱不掉商品的资格，所以她们的服装应以博取美观为条件。”²改良旗袍的独特设计正是上海妇女独特职业心路的映射。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收入和消费

职业不仅带给上海妇女身份的认同感和满足感，更带动上海女性购买能力的提升，虽然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但是相对于繁荣的市场为各个阶层的妇女创造了适合自己消费水平的时尚。

经济收入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是经济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上海近代的职业妇女收入水平各异，但至少通过数字化的统计，可以看到上海妇女的社会资源占有情况，以及由经济地位而引发的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¹ 杨公怀：《上海职业界的女职员》，《上海生活》1939年第4期。

² 毓白：《谈谈提倡短衣的问题》，《申报》1932年1月4日。

女工的收入水平呈现很大的不稳定性，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不同行业的女工薪资水平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同一行业中，不同工种的工人，薪资水平的差异也很大，根据调查到 1946 年各业每小时工资率以电话业为高，为 1144 元强，排第二位的为造船业的 963 元弱，再次为机器业 953 元弱，最低的是为调味品业仅为 279 元弱，不到最高工资的 1/4。其他在 800 元至 900 元之间的有印刷、自来水、煤气、罐头食品及电力 5 个行业，在 700 元至 800 元之间的有电车、面粉、制皂、制革、玻璃、酸碱 6 个行业。在 600 元至 700 元之间的有卷烟、毛纺织、热水瓶、制麻、五金制造及棉纺等 6 个行业。在 500 元至 600 元之间的有制药、内衣、针织、毛巾被毯、搪瓷、制帽、棉织、丝纺织、造纸等 9 个行业，此外尚有印铁制罐、橡胶、火柴等 12 个行业，均在 500 元以下¹，以女性相对集中的纺织、缫丝等行业，收入处于中等左右，火柴业虽每小时的收入低微，但是一般身份自由的佣工大多会要求采用计件工资，虽然同等条件下男工的工资高于女工，据 1932 年的《劳动年鉴》统计，上海女工的平均日工资为 0.36 元，仅为男工的 67.7%，²但是统计也同时表明除了 1946 年这一年，其余时间里计件工资率是明显高于计时工资率的³，以夏衍先生调查的包身工为例，包身工最初的起始阶段叫“试验工”或者“养成工”，工钱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⁴而一段时间之后，当她们技术慢慢熟练之后，她们的工钱就会涨到三角二分一天，一般第三年的薪资就会升到三角八分一天⁵，按照他们的命运，一个月三十天要做满，按照三十天平均值计算月工资为 11.4 元。当然包身工的工资水平仅仅是提供一个参考，按照她们的水平可以看到 1930 年代上海女工收入的大概水平，她们本身是没有消费的权力的。而跟她们同样在工厂里做工的自由工人则不同，她们的消费比较自由，相对来说，消费水平也比较高，竹枝词中称那些提着小菜篮去上班的湖丝大姐居然还有带着金戒指的情况。“左手带着金戒子，右手提着小饭篮……”⁶。而《上海春秋》中包天笑塑造的白娘娘和大新俩人也是如此，1922 年她们在上海的袜厂上班，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早上八点上工，吃午

¹ 《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市社会局 1964 年版，第 21 页。

² 罗琼：《恐慌深化时期的中国产业妇女》，《妇女生活》1937 年第 4 卷。

³ 《上海工厂劳工统计》，上海市社会局 1964 年版，第 21 页。

⁴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 页。

⁵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7 页。

⁶ 吴红婧：《职场丽人》，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0 页。

饭休息一点钟，五点钟放工，添两点钟夜工，每月二十几块的工钱，而年轻的大新“身上的衣服从布的做到洋货的，连金戒指也有了。她除了贴她阿嫂三块钱以外，其余都是自己用。她也不肯存留现钱，一则她嫂嫂倘若知道她有几个现钱，便要想法子来问他借：……二则，年轻的女子都喜欢装饰的，她赚几个钱都花在装饰品上。所以虽不能说到穿绸着绢，什么哗叽啊、华丝葛啊那种衣服已经有几件了”¹。

与包身工一样没有消费权利的是娼妓，她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卖身或者像包身工那样以一定的时间抵押给妓馆的，董竹君属于后者，在妓馆中，她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包括她们身上的衣物，妓馆付给她们包身的费用，对她们进行相关职业的培训后，她们的每笔收入都无权过问，《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载“有东合兴里某校书，因欲制造新衣，鸨母不允，校书爰出所有旧衣付诸质库，卒制新衣一袭”²。当然她们当中也有部分是属于身份相对自由的妓女，妓馆给她们提供场所，获得收入与妓馆按比例分开。她们当中很多人的衣服首饰也是租借而来的，竹枝词说她们“野姬衣服尽鲜妍，单夹皮棉色色全，一到房间都脱却，租来也要许多钱”³。

娘姨的月收入虽然从数量上看着不如女工那样高，也不固定，但是相对于女工，她们的外快收入是比较高的，梳头的女佣，上等人家的多自己雇佣一个专职的妇女，中等以下的都是包月，规定每天梳头的次数“大约每月包月银一元五角至三元，梳头佣一月可赚十余元。”⁴而同时她们的食宿大都由东家解决，所以她们的支出受物价影响的程度较轻，一般说来，娘姨如果是在经济条件相对比较不错的大户人家住家的话虽然工资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据程乃珊女士回顾自己家的娘姨蓉贞二十二岁在作者的祖母那里做保姆，在八十六岁辞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大把如筷子般插在一只老光明牌奶粉瓶里的大金条，六位数的现钞和大批足金首饰，在她的乡下，还有她盖起的两栋气派的楼房⁵，并且她们长期处于富裕的环境中，对于高消费有自己的理解，当时上海有句俗语：宁要大家婢，不要小家女。这与这些大家的娘姨们见多识广，懂礼仪和长期对高消费的耳濡目染有关。而同比在中等人家的娘姨，据叶期的说法，在1930年物价飞涨的时刻，除了食宿之

¹ 包天笑：《上海春秋》，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²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³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摘自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⁴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上海风土杂记》，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版，第51页。

⁵ 程乃珊：《上海LADY》，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232页。

外仅能得到四五元钱的薪资¹。而年轻的小大姐则工作相对轻些，薪资每月“自六元至十元”²。可能是年景较差的原因，如果是繁荣的时期，娘姨们的市场很好，她们的要求也会随之增多。

比如：从前的娘姨们，总要问：

——有下房么？（按：下房是佣人们住的地方）

——每月的外快收入多么？

——有小孩子么？

要是在夏天，还得问：“有洗澡的地方么？”在冬天呢，也许会问：“衣服要自己洗吗？”

这些，这些，稍一不合意，娘娘们会撒娇地说：“不去！”

就是满意了，往往为了工钱的争执，娘娘们宁可“不做”，却不肯“让步”！正如她们骄傲的说：“难道我别处不好做？难道我没有他家人家”？

即使做了，主人人们的性格暴躁一点，稍有一两句“重话”，娘姨们就会包裹一收拾，走了！³

而那些在外国人家里做过的女仆，对外国人的饮食生活了然于心，往往一句“外国人就是这样的”，使得她们俨然成为了消费的权威。

在所有职业中收入最高的非影星莫属，当时上海的明星胡蝶，月收入达到两千元，而在1924年以一部《玉梨魂》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红星杨耐梅是上海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女性。著名的明星阮玲玉在1933年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时，每月居然补贴对方一百元钱，当然她们都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明星，相对于一般的刚刚踏足影视圈的女明星，收入就未必见得很丰厚，《上海春秋》中包天笑描写了一个名叫张珊珊的女演员，每月收入不过百元，并且这笔钱还包括了她们的治装费，剧中人的服装要她们自己出钱置办。所以每月收入高低不定。但是很多小明星，往往收入还不够治装费用，与她们境况相同的还有舞女，舞女是上海1920年代以后新崛起的行业，舞女们根据舞场和自身条件的不同，收入的差异也很大，黑猫舞厅是当时最早的舞厅，当中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陪舞女郎，杜爱梅、陈雪梨、陈卓华，麦文卿是其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当时的舞票是一元钱跳三次，当红的台柱子杜爱梅，人长的漂亮，舞也跳得很好，后来嫁给了上海的纸张大王

¹ 叶期：《娘姨们的烦忧》，《上海生活》1930年第7期。

²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上海风土杂记》，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版，第54页。

³ 叶期：《娘姨们的烦忧》，《上海生活》1930年第7期。

徐大统，据称当时她每月可以赚 3000 元¹，收入不低于当时的电影明星。而大部分的舞女因为舞票的收入要跟舞厅对拆，按照舞厅的规矩，舞女和舞厅在收入分配上是四六开的。舞厅拿四成，舞女拿六成，。舞女越走红，拿的比例就越多，有的三七开，甚至二八开。有的舞厅，舞女是有固定的底薪的根据申报上一张招收伴舞女职员的广告，可以看出她们有每月五十至八十元的月薪²。

漂泊王在 1934 年的《时代漫画》中对舞女的各项开销作出了估算，其中称她们每月的总收入为二百五十五元整³。上海的艺术名家，像叶浅予、张乐平都曾经用舞厅和舞女来作为他们的漫画题材。他们最常用的形象是跳舞的一男一女或一男两女：男的或老或年轻，穿中式长袍或着西装，但女人却无一例外地穿“旗袍”。这幅肖像无意中暴露了性别歧视：女人永远是各个阶层男人的固定欲望对象，她的旗袍展示着她身体的轮廓。换言之，这一对舞者的题材都取自舞厅，表现了舞女和她们的各色顾客。这些在随附于漫画的文章中也被印证了，作者描写那些舞女，发表评论，感叹女人肉体作为商品的魅力。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写低等舞厅，因为相比赫赫有名的舞厅俱乐部，它的数量更大。

酒店的女职员，以三十年代新亚酒店的女职员为例，她们和大型商场里的“康克令小姐”一样，受过一定的教育，“能说极流利的沪粤语言，普通的国语文英文……薪水皆在每月四十元至五十元之间”⁴。而据曾经在大上海广播电台工作的播音员鸥守机的回忆，在 1937 年她的月收入为七十元军用票，而根据当时的币值换算，一元军用票可以换汪伪政权法定的储备票五元，⁵所以是一笔相对很可观的收入。是当时知识女性里面算是收入还很不错的工作，而同为知识女性的女教师们，收入却显得有点寒酸，30 年代一个关于私立小学女教师的座谈会上谈到她们的待遇也是良莠不齐，好一点的周工作量在 800 分钟至 1000 分钟之间，月薪从 40 元到 50 元不等。一般的学校，周工作量为 700 至 1000 分钟，月薪 10 元，15 元，18 元不等，而差的学校，工作量有的是 600 分钟，有的 1000 分钟，有的甚至到 2000 分钟以上，月薪却有的仅为 3 元最高的为 25 元⁶。

近代上海的职业妇女群体的扩大，不仅仅在于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她们

¹ 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37 页。

² 申报广告，《申报》1937 年 3 月 13 日。

³ 漂泊王：《无穷的希望》，《时代漫画》1934 年 9 月。

⁴ 贤影：《职业女子访问所得：新亚酒店女职员的思想与生活》，《申报》1936 年 9 月 9 日。

⁵ 鸥守机：《上海闺秀：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⁶ 茜：《挣扎在职业线上的小学女教师座谈会记录》，《妇女生活》1935 年第一卷。

对上海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拓展消费文化和缔造海派时尚两个方面。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得她们有了更大的消费热情，《上海乡土志》中称上海地区的女工“惟获利虽易，而勤俭之风埒古，若可叹也。”¹正如徐国桢在《上海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上海所以这样的繁华，女性也大有关系。试看各大公司中出入的顾客，女性比较男性来的多，虽然女性所买的东西，未必完全是她们本身所消费，然而照一般而言，女性的关于繁华方面性质的消费力，无论如何比男性的比例要高。再看许多出售女性消耗品的商店，装潢也必定特别考究。此外更如虽非以女性顾客为主而藉女性以号召的营业机关，如跳舞场等，也无不极尽繁华。以现在时代的眼光而论，造就上海繁华中心的重要份子，自然仍是以男性的不吝挥霍为主，女性不过是处于附属的地位罢了，可是女性虽附处于第二地位，无形中在社会上自然可以兴起一种神妙作用，之一种作用影响之所及，可以使男性格外慷慨地挥霍，因为男性的肯格外慷慨挥霍，社会繁华就多了一层保障。”²近代上海的各种场所为了吸引女性顾客可谓不遗余力，各种以妇女为消费主体的商店，理发店，如雨后天春笋般落户上海，各种报章刊物也纷纷加入对新型妇女消费的引导，绮华公司就是一家专门售卖妇女用品的商店，1926年该公司在申报上的广告声称“我是上海专售妇女用品最先降世者，以卖衣边饰品著名的，但对于妇女其他应用物品也无不尽力搜罗，顾今夏就派了谭榕盦君到欧洲各国出产地去，除采办最顶新式的衣边饰品外，又办了很多别种的新奇物品。如跳舞用的金银闪光夺目的巴黎衣料。——御寒用的各种毛织品——毛内衣——手套——围巾——毛袜——女帽——雀毛大衣领——及各种趋时真皮手袋等。现均运到了……”³。这些欧美的所谓新式衣履，在上海还是大有市场的，虽然徐国桢先生对此嗤之以鼻，称她们“现在上海的所谓时装，大都吃外国女人的屁，”⁴对于上海新女子这种中洋毒最深，差不多已到无可救药之地，无论吃的穿的使用的，都非洋货不要，相率中华女子以祖国脂膏双手捧献于洋大人腰包之内的行为深恶痛绝。但是无法避免报章上连绵不断的对欧美妇女的着装介绍和推崇。

西国妇女礼服，茶会看戏赴宴各有其式。惟西人男女衣服，均有外褂（即外罩大衣，西人称长大袄）我国女装女衣，与西女外褂绝似，所不同者，西

¹ 李维清著，吴健熙标点：《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² 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59页。

³ 《绮华公司重要宣言》，《申报》1926年12月16日。

⁴ 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62页。

女外褂，当胸开正襟，袖长勿过手腕，袖阔勿逾四寸，盖有皮或丝之手套故，衫则有领，领之后身，较前略高，边镶以缎，中绣以花，其形为窄袖，宽胸，细腰，撒脚是也。

美国富家妇女，衣服每喜更新，即寻常女子，服饰亦年月百变，同一茶会跳舞，女子数百人，衣服鲜有同样者，盖其衣服摩仿法京巴黎而不变，每衣服一袭，自帽及肩披以致上衣下裳，各有特别新制，彼稍有同样式者，女佣粗服耳……近时夏间，西女有用我国雪青及白纺绸为上衣下裳者，但非绣花式样，又有灰丝绸制成女衣，间以疏花组织，以元色灰丝绒线，绣花于衣上者，在上海没件售华银五十两左右，在美国可售美金八九十元……

西国妇女以黑色为丧服，深红为流血，深黄为病色，三色皆遭忌讳。以白为吉服，美妇及年少者衣之……¹

文中举出的西式新装，用的材料全部产自我国，样式也并不新奇，刺绣也不精美，更谈不上复杂，但是它昂贵的价格，主要在于它占了个“洋”字吧，不仅国外的服装样式会引领上海的服饰潮流，就算是颜色的选择，上海妇女也时时以西方的流行色为坐标，1925至1926年间西方的服饰流行色为深蓝色，据称发其断者是罗马尼亚皇后，她在美国访问期间她的随从和她自己都着深蓝色的衣服，更奇怪的是她的胭脂也与服装一色，这种奇怪的深蓝色的胭脂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它的效果，但是就这样还是引发了欧美妇女的争相效仿，大街上全是蓝化的妇女²。其实在这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为上海的女性们指明流行的趋势和方向了，漱梅在《服装漫谈》的开头就提到巴黎最近盛行“一种绿，黑，稷，蓝相间之织品，亦殊别致”³。同时各种公司为了扩大销售，也紧紧跟随时尚的脚步，并在广告中用尽各种诱惑性的语言，比如著名的纺织品公司老九纶在推出他们的新型一枝花布料时，专门请人在《申报》上做了一则一篇极具鼓动性的报导，题目就很有诱惑性，有三层第一层为：美丽衣服的发源地，第二层为：各国的巴黎…中国的上海，第三层才提到：老九纶新出一支花布料。文中这样表述：

……谈到我们中国，当然上海是最时髦衣裳的发源地了，我们时常回到家乡，或者旅行到内地时，看见内地妇女穿的衣裳，总带些上海的气息，有人谓之海派，不过许多学的很像，有许多竟不像，有许多在上海人眼光中看

¹ 癡狂生：《西妇之刺绣与衣服》，《申报》1926年5月21日。

² 陈鹤侣：《将来欧美服装之推测》，《申报》1926年12月16日。

³ 漱梅：《服装漫谈》，《申报》1925年12月20日。

来，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内地很为流行，可见内地人的衣裳跟着上海走，这也是一定不易的道理，至于讲到上海，也有时髦的发源区域，上海地方很大，并不是个个人时髦，也有时髦的制造者，并有许多时髦的制造地方，所谓时髦的制造者，就是一般艺术家，他们想出许多法子，画出许多花样，于是一般人就风起云涌的叫裁缝做，谈到的时髦制造的地方，就是大马路，我们且不谈平时，专讲礼拜六，礼拜六午后，大马路简直就是一条美丽的街，红红绿绿的美貌女子，如穿花蝴蝶一般，苗条的身材，配上新奇式样的衣服，一队队的走过去，老实说这些人是美丽的模特儿，中国 fashion 的制造者也

昨日我走过南京路老九纶绸缎局去访问吕葆元君，吕君经营绸缎事业有很长久的历史了，我们见了面，寒暄了一会，我便开口问，今年冬天女衣料怎样，他说现在穿旗袍穿大衣的姑娘太太们到处皆是，穿短襖长裙的格外少了，我们这儿现在最时兴的要算旗袍一枝花的整料，我当时很奇怪，便问他什么是一枝花，他答道，现在随便什么绸缎，花样无论怎样美丽，但是一经裁剪，所有花和叶便零碎不全了，今年新发明的这一枝花就是一件旗袍的料，上面织成一支整花，非常光艳悦目，这一种是我们最新的衣料，并且要织什么花，只要绘成图案，都可以定织，至于讲到颜色，任何颜色都有……¹

这种在当时售价几十元一块的旗袍布料，虽然是以一篇报道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的，但是其中的用词充斥着广告形式的用语，但是仅仅到 1932 年她就已经出现在中华百货商店大减价的名列之中，新式团圆葛面料的特价两元每件，而新花丝绒的旗袍料也仅售四元半²。而到 1933 年的时候，大幅花朵图案的旗袍料已经完全被时尚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圆圈型的图案，据各大公司绸缎部说，这是民国二十二年秋式，为名媛们都已采用的了”³。而 1933 年为国货年，之后上海很多商家抓住国货大做文章，就连鼎鼎大名的上海鸿翔公司在为他们的大婚服做广告的时候在声称“上海名媛结婚已无人不穿矣”之后也不忘提及他们的衣料“全用国产之绸缎纱绉”⁴。而某些报章居然公开声称：你知道 1929 年的美吗？被时代感染了的或被洗礼过的 Morden boy 的眼里，好像 19 世纪的，虚伪的，被胭脂搽得血红的，被雪花膏涂得白白的，被香水浸得喷喷香的脸是感不到什么

¹ N.C.:《美丽衣服的发源地》，《申报》1926 年 12 月 16 日。

² 《中华百货商店大减价》，《申报》1932 年 11 月 14 日（申报本埠增刊）。

³ 心宽：《秋式衣料图案》，《申报》1933 年 9 月 9 日

⁴ 《鸿翔大婚服》，《申报》1940 年 9 月 30 日服装特刊。

刺激了。换一句话说，Bourgeoisie 式的美是已成过去的了，我们所渴求着的是自然地，富于野性味的、赤裸裸的、有剧烈的刺激性的美，所以她们的黑脸和蓬蓬如野女般的头发反而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¹。广大妇女就是在这些消费理念的影响下支配自己的收入，衣着一项往往在她们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33 年，有一位叫冰瑛的女士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家庭衣着支出，根据她的描述，列出如下表格

表格 3：上海普通家庭月购衣料表。

日期		品名	用途	尺寸		金额			备考
月	日			尺	寸	元	角	分	
9	9	纠缠绉	冰旗袍	9	0	3	6	0	
9	9	天然绉	淦袍子	13	0	7	5	0	
9	14	蝴蝶呢	芬女	6	5	2	0	8	
9	14	安琪格	芬女	6	5	1	3	0	
9	14	白细布	冰淦衫?	48	0	7	2	0	
9	20	大同呢	冰旗袍	9	0	1	6	0	
9	20	九一八哗叽	荣儿			8	5	0	现成小西装
9	24	衬衫两件	荣儿			1	8	0	
		合计				33	5	8	

资料来源，冰瑛：《我家之秋季服装费》，《申报》1933 年 9 月 30 日。

表中的冰指的是作者自己，淦指的是作者的丈夫，芬是作者女儿的名字，而荣则是作者的儿子，作者只购买衣料，全部自己加工制作（荣的小西装除外），九月份一个月的购料花费仍然为 33.58 元，而据本文作者称，她自身不出去工作，而丈夫淦的工资为每月 160 元。服饰一项的支出占据了家庭总收入的近 20%。这只是普通人家的家庭服装消费状况。另据漂泊王对舞女的生活得收入和支出的估算，列出一个舞女的收支表格。

¹ 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 页。

表格 4：舞女的收入支出表

收入	支出项目	数目（单位：元）
每日工作五小时（每小时伴舞十次） 分的舞资洋八元半。 按月总计收入二百五十五元正。	房租	25
	伙食	30
	应酬	20
	衣服	54

资料来源：漂泊王：《无穷的希望》，《时代漫画》1934 年 9 月。

从中可以看出仅五十四元的衣装支出就占了总收入的 21%以上，况且舞女收入的二百五十五元也只是个虚数，这 54 元到底如何支出的呢，《时代漫画》1934 年 2 月对其中摩登春装给出了交代。列出表格如下。

表格 5：上海摩登女子的春装支出。

品名	单位	价格（单位：元）
深黄色纹皮皮鞋	一双	6.50
象牙色蚕丝袜	一双	1.20
奶罩	一只	2.25
卫生裤	一件	0.80
吊袜带	一幅	3.00
纠缠绉夹袍	一件	8.20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00
白鸡牌手套	一幅	2.80
面友	一瓶	0.75
胭脂	一盒	0.50
可的牌粉	一匣	1.45
唇膏	一匣	0.50
皮包	一只	2.50
电烫发		5.00
铅笔	一支	0.20
蜜	一瓶	0.40
总计		52.05

资料来源：《摩登条件》，《时代漫画》1934年2月。

前文提到的鸥守机女士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自己有了收入之后的开始注重穿着和打扮，“我的生活也就开始改变，懂得打扮，买新衣，到理发店做头发，购买些我需要的东西，月月添用”¹。

上海妇女是中国最早步入职业化道路的女性群体，职业给了她们前所未有的体会，鸥守机女士描述了她在第一次走进大上海广播台工作时自己的内心感受时称“当我跟着周女士进入办公室，大家一见我，个个站起来，都向我拍手欢迎，礼貌很好。这样的场面，对于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来讲，简直是一场梦，到了人间活到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我这个无名小卒，我这个可怜虫，也能有人拍手欢迎我，也能工作……”²，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会随着她们收入的提升而增加，她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凭借职业取得了社会的互动。职业的收入也提生了她们对于消费的感知能力，她们可以通过购买获得自己和社会认可的形象，任何一种式样要成为时尚，必须为大众的美学理念所认可、消费相对便利并包容于一定的社会氛围。近代时装体系的出现使得服装作为软性储值货币功能的丧失，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经常会提到的“金银细软”作为货币和物质的代名词，金银很好理解，细软想必就是指的这些具有储值货币功能的衣饰之类，时装体系的出现，使得服装随着消费市场的活跃变化越来越快，时人称“从前两三年一变，现在两三个月就变了”³，往往一过流行期，衣服的价格必然大跌，“典当里的出货最便宜，有时候定价竟然连裁缝工都不够”⁴。这必然要求服装的可再塑性和可搭配性功能的不断增强。改良旗袍的产生和发展可谓应时，应需。它迎合了不同消费水平妇女对于美的追求，因为其简单的造型，多样化的制作材料而受到上海社会不同消费水平妇女的青睐。

第三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家庭和婚姻生活

职业使得上海女性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把她们抛入了社会的漩涡之中，给了她们一个存在上的悖论，她们是一群自由的女人，同样她们也是一群失去了保护的女人，她们穿上了属于男人的盔甲，在男人的世界里拼搏奋斗，而她们的家庭和生活却让她们处处碰壁。自古中国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¹ 鸥守机：《上海闺秀：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² 鸥守机：《上海闺秀：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³ 王人：《真善美的女性衣服》，《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⁴ 秉钧：《买的门径》，《上海生活》1938年第2期。

未婚男女鲜有见面的机会，近代妇女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她们的婚姻和生活也打破了以往的宁静局面。《上海春秋》是包天笑成书于1926的长篇小说，在开篇的第一部分，作者就浓墨重彩的渲染了一件看似不光彩在那个时代却很普遍的事情，陆裁缝家的女儿秀宝与陈公馆的六少爷在外面“做了小房子”，所谓做小房子就是现在通常所称的“同居”的比较隐晦的称呼，当时有很多不同的对于这种男女非婚同居行为的称呼，“借台基”就是其中比较早的一种，所谓台基，《上海轶事大观》中称：“台基为介绍良家女子幽会之所，创之者为白沙批把，事在二十年前，集其大成而名独著者则为薛大块头。薛名文华，无锡产，系薛福成之后裔。初肄业于务本女学校，以行止不端迟校，师事白沙批把，得其秘诀，以挂名女生之故，结识新党中之男女甚多，复自命精于刺绣、绘画，名益以噪，实则绘画悉出诗妓李苹香及所欢倪墨耕之手，刺绣亦倩能者为之。体至肥硕而精于过人，常设幽会之所多至十余处，陈设均甚华丽，益以古物点缀其间，风雅之士多趋之，下至翻戏、拆白之流亦无不识，取财之法多而精，顾卒无积蓄，以用巨而贴面首多也。奸淫异于恒人，尝谓：‘能淫至于人者，吾死无憾’。曾进绣枕于某总统，得厚赠，又剿女界能谋生计可以自立之说，设照相店于五马路，名曰‘驻额阁’，以侦察架者而罗致之，故今稍负时望者之闺阁多与有关系。光、宣之际，窃其术以营利者犹鲜，自后台基几满坑谷，遂有大、中、小之别。大者订终身或以月计，终身之价率以千金论，计月以百金为单位；中者价略减，而以度数论者为多；小者则专论度夜资，为值止五元矣。迄旅馆发达，皆备被褥，偶然野合者视为便利，久者则别营外室，谚曰‘借小房子’”¹，这种在现在看来仍然为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行为，颠覆了长期传统社会中妇女对于贞操观念的坚守，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风俗和观念，时人撰文称：“上海风俗之坏，不坏于妓馆林立，而独坏于烟间、台基之属。盖妓馆至少需洋蚨一头，始能订交。若衣衫褴褛，即不得其门而入。故惟惨绿翩翩挥金如土者，方能荡心惑志。至花烟间一开，而肩挑负贩者之腰缠罄矣。吸烟一盒，不过百文。捉胸捺肚，无所不可。若舍番佛一尊，即能鸳鸯颠倒。尝见东洋车夫，捉襟见肘，两足如飞，尽一日之力，得青蚨二、三百片，除房饭数十文之外，俱消耗于此乡。愚民初至沪地，偶尔问津，亦无不囊？立尽，其害岂有涯哉！台基者，倚门淫姬择幽僻处所。赁小楼一二楹，，设备略备。狎游子弟意有所属而苦难如愿者，

¹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啖以重金，托其撮合。虽绣闼娇娃，璇闺淑质，一经煽惑，往往失足其中，至有
为父母所责，或不礼于其夫而悬梁服毒者。所望良有司秦镜高悬，一扫兔狐之穴，
则伏案书生所旦夕祷祀者也”¹。

借台基的境况各不相同，有的是男女双方自相结识，去台基店中约会，“桑
间濮上，约图片刻欢愉”²。竹枝词中称“男贪女爱找姘头，窄小房间赁一楼，
夜夜夜钟鸣十二，阳台赴会不知羞”³。也有的是某些老妇人，专门为某些男性
提供借台基的服务，当他们中意某位女子，就有这些人替他们出面相约，竹枝词
中说这些人是“淫媒谋利设台基，勾引良家好女儿。赴约托言摇小会，跟随也不
带娘姨”⁴。还有一种借台基的类型中女性类似暗娼，由台基店主协助寻找适合
的男性，借以获得额外的收入。竹枝词中亦有对她们的描述“骚头大姐几分春，
不卸铅华亦可人，只要代租小房子，管教夜夜得相亲”⁵。一般来说，第一类的
男女多属于有情的一类，上层的男女居多。最后一类的女性多属于以获取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私会，但是借台基以一种畸形的形式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女性对于男女
之间自由交往的向往。这种男女关系是很不稳定的，女性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
缺乏必要的舆论和法律的支持，往往导致不良的后果。进入近代以来这种借台基
的风头愈演愈烈，如果说借台基只能满足男女双方幽会的需要，那么近代男女的
“姘居”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非婚男女共同生活的需要。《上海婚俗》一
书中亦对其的区别作出如下描述，“说起台基和姘居两者还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台基往往是为了满足男女之间的“一夜情”，聊解双方的相思之苦，也就是“露
水夫妻”；姘居的男女则要一起生活，尽管这种姘居生活得时间也有久暂之分，
但毕竟彼此有照应”⁶，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双方并未结婚，但以性关系的方式
共同居住在一起，姘居者往往租赁一处房子作为同居之所，所以也称“借小房子”，
除了姘居以外，“借小房子”也成为很多人正常婚姻之外寻欢作乐的去所，有的
时候旅馆也成为人们偷情或者有钱女性包养小白脸的场所，时人亦有愤愤难平者
撰文指出，“以我的心理上，一般中小客栈，不如改名为私孩制造厂为妥当”⁷。
以表达对于这种现象愈来愈普及的不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动荡的局势并没有

¹ 黄式权著，郑祖安标点：《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² 《论防淫》，《申报》1978年12月16日。

³ 申左瘦梅生：《沪北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⁴ 申左瘦梅生：《沪北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⁵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⁶ 邓伟志、胡申生：《上海婚俗》，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⁷ 殷李涛：《挖空心思录》，《申报》1926年3月7日

给上海人的婚姻提供任何的法律依据，但是近代媒体的传播性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当时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名人政客大都以在报章上刊登个人的结婚、同居、离婚、分居的公告作为婚姻或男女关系的法定依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婚姻关系的判定也都是以报纸的公告作为依据¹。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才对婚姻关系的建立和解除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并规定从1931年5月5日起正式施行²。1929年至1936年上海华界人口的结婚率仅为2.6%到4.9%³。李长莉认为晚清时期姘居的女方多为下层妇女，姘居之风盛行在中下层单身男女中，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这种非法的同居关系几乎盛行在当时几乎各个阶层中，女性也不仅仅是下层妇女，阮玲玉与张达民好唐季珊之间的恩怨纷争就是当时上层社会里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之前提到的《上海春秋》中的秀宝和陈少爷的情况亦是如此，陈少爷是一个公馆里的六少，秀宝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小家碧玉，家道殷实，也读过书，依然会选择这条道路。与借台基的情况不大相同，女性的姘居对象也不全是有钱人。在这场关系中，许多女性把感情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在《申城旧狱 上海滩十大名案》中记载了一件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情奔案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证。此案于1928年10月9日在苏州高等法院开审，吸引了很多人旁听，“不少听众不辞路远迢迢，风尘仆仆，有的从上海赶来，有的从南京赶来，有的从无锡赶来，有的甚至还隔省从杭州赶来。由于人多，庭内拥挤不下，竟使得好几百人围在门外，交头接耳地打听着庭里的审讯情况，可谓盛况空前。”⁴黄慧如原为大户人家的闺秀，祖籍浙江湖州人。父亲黄静之，生前曾在北京当过好几年的电话局长，挣有一笔家产，颇称富有。后来父亲亡故。大哥黄澄沧弃儒经商，先到上海。此后不久，母亲黄朱氏经和祖母商量，认为北京远离家乡，生活开支又高，于是决定索性全家一起搬来上海。先是住在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后来又搬到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某号一处二上二下的二幢头石库门房子居住。而本案的被告陆根荣只是黄家的一个下人，他与黄小姐两厢有情并致使黄小姐怀孕，受到黄小姐家庭的阻挠，继而带黄小姐私奔至苏州，后被人告发，于1928年6月24日被捕，当时侦探队检点结果，属于黄慧如的饰物有：马并金锅1只、洋金戒子1只、福字小金针1只、金帽花1只、金表1只、外

¹ Susan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91—93.

² 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³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⁴ 辛子牛：《申城旧狱 上海滩十大名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国金表连练条 1 只、银果盘 1 只、珍珠圈 1 副、珍珠 4 串、珠老危 1 只、珠宋莉千 1 只、大珍珠 3 粒、大小珍珠 20 粒、珍珠钮扣 4 粒、粗细珠钮头 2 粒、一根葱弱翠锅 2 只、弱翠宝石 1 包、小裴军工包、弱翠朝管 1 只、弱翠担头 3 粒、红绿宝石 9 粒、白王千 1 只、白玉牌 1 块、莲蓬 10 只、小照盒 1 只、文洋 1 枚、物品交易所银析 1 枚、女衣裙 9 件、手提皮箱 1 只。属于陆根荣的物品仅有：金戒子 1 只、手表 1 只、呢帽 1 顶、单衣 15 件、手提皮箱 1 只。而在陆根荣仅有的行李中，那只金戒子也还是出于黄慧如的馈赠。双方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可见一般。姘居现象也不仅仅风行在年轻的男女之间，1929 年《申报》上一篇《茶楼主妇罚洋十元》的报导就是一个中年妇女因与不同男性姘居而引发的争端。“南市薛家浜永祥楼茶肆主妇周赵氏，姘识药阿三，后因该氏忽变常态，另与住在该店亭子间楼内之房客鲁琪荣结不解缘，废历中秋晚被阿三撞遇冲突，带入一区一分所，鲁否认其事，鲁否认其事，当以男女均属无耻申斥而退在案。¹”由此可以看出姘居关系虽不受法律约束，但是一般首位与女性保持同居关系男性仍然拥有类似于丈夫的权利。这点在仅仅不到两月后的《申报》的另一篇名为《钱珠凤风情艳史》的文章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无锡青城市庙头村钱家宅乡民钱三官之女钱珠凤，现年二十一岁，于十三岁时父母相继逝世，珠凤终鲜兄弟，孤苦伶仃，家有薄田三亩，由族人公议，由叔氏之幼子与仁为三官之嗣子，嗣继香烟，珠凤由叔抚养，至十七岁时，由村人介绍至无锡北门外大盛丝厂为抄茧间女工，与同村妇人钱蔡氏同寓附近十四号工房，珠凤姿色颇佳，不啻小家碧玉，致咨该处登徒子之垂涎，朝夕上工放工时，一群流氓肆行勾诱，珠凤年轻智识薄弱，未满半年，即被拆白党孟顺生（绰号小孟尝，现年二十三岁，年轻貌美）勾引成奸，而孟顺生初在无锡新世界为查房，月入尚丰，租屋藏娇，珠凤即弃女工生活，实行同居，卿卿我我，爱情颇笃，不三月，顺生生意停歇，日用开销渐趋窘迫，珠凤复入丝厂做工，每月所得十余元之工资不敷二人之开支，阅时数月，所有衣饰等物，质卖殆尽，而珠凤恋奸情热，即与顺生商通，暗与某丝厂账房薛某往来，每月由薛某贴给珠凤开销洋四五十元，顺生明知故纵，坐享其利。薛某明去暗来如是者数月，去岁阴历除夕前，顺生因赌博负洋银百余元，逼令珠凤向薛某索取，薛只负于五十元，顺生不满其态，即纠党待薛某在珠凤

¹ 《茶楼主妇罚洋十元》，《申报》1929 年 9 月 24 日。

房内时，将薛轧住，强欲拆稍洋三百元，薛某无法，央人向顺生情商，由薛某出银两百元，顺生得矣……¹

事情至此还远没有结束，顺生后来欲再度敲诈薛某，被薛某窥知，与珠凤断绝了关系，珠凤被卖至沪上某妓院，后因患病被鸨母逐出。从上面几件事情的记载上，透露了关于姘居关系的几个方面的信息，姘居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往往只有口头上的契约关系，某些自身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差的女子，选择与某位男性发生姘居行为，大多是出于懵懂而又平等的爱情，

前面提到的秀宝和六少爷他们在赁小房子之前，曾经有一份口头契约，由女方提出，经由男方同意的，以保障双方的利益，其中共有三条，第一，女方要求男方购买一对金刚钻圈，两只金刚钻戒指；第二，赁一处两上两下的房子，几房外国红木家具，第三，要求每月给予三百块钱的生活费，并且女方可以随时终止同居关系。其二，在这种口头契约的同居关系中，出现了最早的西方式的保护经济地位相对较弱者的法律精神，女方如果处于经济上较强的一方也会在经济上对男性进行补助，阮玲玉与张达民结束了同居关系后每月给予他一百元的经济赔偿，这是在传统社会中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在正常的婚姻中，男女双方离婚。女性对男性进行补偿的亦属罕见。在这种非正常的婚姻中女性供养、补偿男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现象，男女平等的精神居然在这种法律之外的非婚形式中得以实现。第三，钱珠凤的例子也再一次印证了她的首次姘居对象——孟顺生享有的类似丈夫的权利。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并共处一室，共同生活，实际山并没有任何当事人双方或者第三者的利益受到侵害，也并无女性身体或者其他归属于同居男性的必然性，但是钱珠凤和周赵氏的案子中，顺生和阿三都有机会向她们后来的姘居对象进行经济上的敲诈或者道德上的讨伐，这也不可不说是一件怪事。

在姘居行为中，虽然双方结合的前提是自愿，因为缺少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以及家庭关系中责任与义务的约束，所以双方关系比较脆弱，难以长久维系，但是当双方关系走向尽头，要分离双方的关系（时称拆姘）时却不像结合时那般简单，有借助官方力量强制拆开的，一首《嘲公堂上拆姘头》的歌谣就道尽了其中的荒唐与无奈。

上海世界乌糟糟，男女面孔都不要，姘头轧仔多多少。媒介不通信，父

¹ 《钱珠凤风情艳史》，《申报》1929年12月17日。

母不许可，眼里看重就成交。后来一头两头事体不合意，公堂上去把状告。老爷升堂坐，原被两造一起到，问问口供实在真蹊跷，都是贱骨头，出身根底都不晓。譬如拦路采朵露水花，朝后日子弗去料，叫舍姘头只图暂时好，本来弗思同到老。今请老爷断开来，免得今后多奸。老爷听之有点暗好笑，格种男女真正不入调。问声男子为舍当初要拿膀子吊？问声女子为舍跟仔郎做出现世报。当初太粗糙，情情愿愿对白话，今朝要我断开交。骂一声忘八蛋，全弗是好路道。理应一同做监牢，警戒你后回性格改改好。原告磕头求，被告求饶赦，请你老爷弗心焦，格种案子一年到头有几化。老爷无设法，叹一声气将头摇几摇，着各具结将案销，喊声贱胚滚蛋罢¹。

有些拆姘行为最后则不得不伴随着女性的血与泪，就在与钱珠凤事件同一天的《申报》上又登载了另一件妇女因轻信姘居男友，被拐为娼的少妇张陈氏的报导。²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而另一位舞女陈海伦在要求对方履行口头约定时亦是困难重重。

舞女陈海伦因吴县望族徐冠南之子徐琦仲中途中止同居契约照原契约所载徐应担负陈海伦赡养费三万元，徐琦仲不但不履行契约，反避而不见，故陈常赴浙江路徐家要求，均不得要领詎于本月二十四日，陈又偕伊老母及外祖母赴徐家要求费用时，陈母突被徐家司阁印捕殴伤，陈当无法抵抗，只得偕老母赴李医生处验有伤单，以便进行诉讼，昨据陈语记者，已经延请颜鲁卿律师具状第一特区法院，对徐氏父子以主使伤害罪提起诉讼。³

有些姘居行为在拆姘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5年申报报导的一个案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例子，一位女性姘居者因为移情别恋，要求拆姘，姘夫殷竹庆不允，双方发生争执，殷竹庆就刺伤她，并躲匿至旅馆，最终自杀身亡⁴。

当时上海的“弃夫”之风是“姘居”现象所带来的副产品。“弃夫”是指那些离乡进城的妇女在与人姘居以后，嫌弃自己的丈夫而弃之，甚至乡下的丈夫进城寻妻，妻不认丈夫的现象。“弃夫”多是因为这些乡下女进城之后，或为妓，或为佣，基本上能挣钱自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观，其眼界也不同往昔，加之以

¹ 胡祖德著，陈正书、方尔同标点：《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194页。

² 《诱拐妇女为娼》，《申报》1929年12月17日。

³ 《舞女陈海伦刑诉徐冠南父子》，《申报》1933年9月20日。

⁴ 《行凶后畏罪自杀》，《申报》1935年1月10日。

姘夫同自己的“糟糠”之夫相比，更是视前夫如敝屣；另外有些村妇进城后，被姘夫包养，爱打扮，习风雅，贪图安逸，好逸恶劳，自然会抛弃本夫。对此，以《夫被妻欺》为例“夫纲之不振，莫坏于租界地方之泼妇。……昨大马路会审公南门前有苏州之乡民，因妻在上海帮工，即女堂信之一流也，久不回籍，夫来寻觅，见诸途，而拉令下船同去。奈伊妻已满身罗统，未免别有交情，风月惯常，睹此牧牛奴，莫不生憎？遂不肯与之回乡。争扭间乡人反为伊妻推倒，适马车来，不及避让，足为碾伤，虽无重伤，已不堪步履。回首伊妻早如黄鹤之飞去矣”¹。严格说来，上述的姘居行为应该称为通奸，所谓通奸，顾名思义，男女双方或一方有配偶的情况下，没有夫妇关系而发生性行为。²相对于姘居行为，这种行为对于对方的法定配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且舆论对于此种情形也是深恶痛绝，一旦被发现，冲突是再所难免的。《申报》1929年登载一篇《野鸳鸯服毒》的报导介绍了一对通奸的男女，男，柯礼福，江苏泰兴人，女，王氏，江苏常州人，两人同为杨树浦某织布厂工人，两人在外面租赁小房子，卿卿我我，俨如夫妻，后来遇有流氓向他们施行敲诈，他们被逼迁移，无奈又被流氓侦知，随后两人被逼无奈，吞服阿芙蓉膏企图自杀，以逃避蹂躏³。

即使在正常的婚姻里，女性，尤其是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因为不擅长家务而受到舆论的讨伐，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大学生新娘

大学毕业的新娘M夫人，在组织了小家庭的第一天，很殷勤地排了碗筷对她的丈夫说：

“吾爱，你今天夜饭，要吃中午时烧的冷饭，还是刚才烧成的焦饭？”

4

而一则谚语也对女学生家庭主妇进行了舆论鞭挞。

亲家来，亲家来，亲家姊妹上边坐，现成茶儿喝一杯。亲家亲家莫气恼，你们女儿大来不得了。直出直进不认识人，罚咒不把婆婆叫。他是文明女学生，我是顽固老贱人。女学生高似天。老贱人，低似田。他看我是一位老阿婆，又算我是一只老猪啰。他在堂上呜呜弄风琴，我在堂下替他洗衣襟。他

¹ 《夫被妻欺》，《申报》1873年4月4日

²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61页。

³ 《野鸳鸯服毒》，《申报》1929年11月29日。

⁴ 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在堂上唱着《春之花》，我在灶下烧着木材花。木材花，煮牛肉。牛肉煮的熟，他在房内吃牛肉，婆婆只在灶下哭。兄如狼，做媳妇。柔如羊，做婆婆，做是老婆此刻没奈何。愿替你家女儿换称呼，我做媳妇他做婆。¹

连徐国桢也参与口诛笔伐新女子的行列：“这种自命新女子，在家庭之间，提倡一夫一妻不认公婆的小家庭制度，在社会之间，赴宴集会八面交际；一天到晚，很少空闲，然而究竟做了些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至于家常杂物，当然是不屑操劳，认为新式女子分外之事了。做了一个人，无论其男性女性，总要做一些事情，现在上海的许多所谓新女子，对于家常杂务，既不屑为，而家常杂务以外，更无所为，这样，未免自视太高，岂有新女子必须要坐食挥霍的道理吗？旧女子虽然不必恭维，然而这种新女子必须打倒”²。而《玲珑》上刊登的《摩登妻子应具备的条件》，我们窥见新时代条件下摩登妻子的要求还真是条件不低，要求共有六条：第一是缝纫，第二是烹饪，第三是学问，第四是育儿，第五是储蓄（类似于现在所称之理财），第六是御仆³。现代女子在一个进步的躯壳下要有这一棵传统的心，仍然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的命运。

近代上海的婚姻也是很很不稳定的，离婚作为一个时髦的名词进入上海人的生活中，结婚率不高，离婚率不低是近代上海特有的现象，孙本文先生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提供了基本能反映 1929—1932 年间上海市离婚原因的数据，根据他给出的数据，列出如下表格。

表格 6：上海市离婚各原因占百分比统计表。

原因	1929	1930	1931	1932
意见不合	77.67	73.39	86.39	86.53
对方遗弃	2.64	1.87	1.25	3.13
外遇	0	0	3.12	0.96
对方不道德	9.46	14.53	0.49	1.93
虐待与侮辱	2.48	2.11	1.25	2.17
卷逃	0	0	0.63	1.69
经济压迫	1.35	0.82	0.47	0.96
买卖婚姻	2.02	1.29	0.31	0.24

¹ 胡祖德著，陈正书、方尔同标点：《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0 页。

² 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 1929 年版，第 75 页。

³ 琼：《摩登妻子应具备的条件》，《玲珑》1933 年第 123 期。

重婚	0	0	0	0.24
对方疾病	0.46	0.59	0.31	1.45
其他	0	4.81	3.60	0.48
不明	3.88	0.59	2.19	0.24

资料来源：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 1942 年版，第 133 页。

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在 12 种离婚原因中，男女双方“意见不合”之原因占据了绝对的比重。从 1929 年到 1932 年的 4 年间，该比重一直高达 73% 以上，1931—1932 两年均高于 86% 以上。其次，就平均 4 年来看，“对方不道德”（根据原资料分析，此处可能不是专指今天我们认为的感情上的“第三者”这类问题）是占第二位的原因。从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居首位的“意见不合”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相比其他原因，只有它的界限无法确定，主体性意识在离婚原因占了如此大比重，反映了上海社会婚姻关系中的模糊不清性。而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由谁主动提出的问题的统计中，上海社会中，男性主动提出的占了 15.63%，女方主动提出的占 14.14% 双方提出的占 70.18%¹。

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男性文化主宰着女性的社会活动方式，女性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参与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社会行为方式等等都要受制于男性。男性文化也制约着女性的精神活动方式，如思维方式，价值评定方式，感情表达方式等等，因而女性的精神只是男性精神的变种。然而近代上海的繁华为广大妇女提供了一个进如社会的机会，职业将她们与社会仅仅的联系在一起，她们彻底摆脱了闺房的束缚，打扮妥当，自信满满的迈步下珠楼，她们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她们呈现出了中国女性从未有过的自由活泼的态势，她们追求与世界时尚同步，不断在穿着上追赶西方的步伐，她们用自己的青春装点了上海的时尚。但是，上海社会发展的不健全性并没有充分给大部分女性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反而把她们推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家庭中她们的处境都很尴尬。她们的学识并没有足够的用武之地，无可奈何的再次沦为被欣赏和被消费的角色。正如时人所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女子，自从被三从四德的铁链束缚以来，说不上自由，谈不到意志。虽然近来似乎政治上、教育上、经济上、都得到了平等，但那些只是幸运儿才能偶然获得的，大部分，不应该说是全部，还是做着奴隶，当着商品，因其是奴隶，所以不得不听主子的使唤，以图承欢，因其是商品，

¹ 张伟：《近代中国不同城市离婚原因略论》，《人口学刊》2001 年第 1 期。

不得不装潢点缀，以求销售”¹。禹燕在分析近代中国女性存在的困局中称：中国女性就整体而言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她们从来都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用男性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因此她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女性解放运动本来为女性提供了认识自己的极好机会，但是“社会革命”的恶性膨胀却又使她失去了良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浪潮淹没了女性，到处弥漫的社会革命腾腾热气模糊了女性的视线，她不知道自己的自然本能怎样遭到了非人的压抑，她不了解自己的自然活动如何被限定，她没有认识自身社会存在的特殊性，她不了解社会如何把她变为次于“第一性”——男性的“第二性”²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仅仅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社会革命这一性质的突出化和极端化，使得女性淡化了对男性批判同时也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社会革命吸引了女性所有的注意力，女性在社会革命中完全进入角色，她们的眼睛关注的只是庞大的社会，看到的只是社会舞台上的人物和事件，而没有注意到隐藏在幕后的社会戏剧的实际导演者——男性，没有认识到男性是社会制度非合理性的真正肇事者。社会革命给女性套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使女性的精神视觉产生了对男性的色盲。而使男性批判趋于淡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使男性成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主体，成为了女性解放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领导人，因此作为革命参与者的女性是不会批判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的，她不仅不会批判男性，而且在她内心还还对男性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社会革命是一个过滤器，它清除了男性的污垢，留下了男性的洁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男性在中国女性的心目中始终是神圣的，崇高的，中国女性似乎很少用质疑的眼光去注视男性，她盲目相信男性的一切。男性批判的淡化导致了女性解放价值尺度的偏离，女性把男性作为自己的楷模，以男性的尺度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解放，而这正是“男人能办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办到”能为广大女性所接受，并被奉为“女性解放宣言”的心理基础。这是上海女性在职业生活中无法逃脱的宿命，当她们在职业中遇到挫折时，她们苦闷的仅仅是自己的性别，她们内心里希望的是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样，她们努力把自己的形象向男性靠拢，改良旗袍的盛行正是这种盲目崇拜心理的折射，长袍是传统社会中有知识，有能力的男性的着装，在近代时装舞台上在中山装、西装的冲击下，他仍然保持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深度

¹ 玄：《艳装与妇女》，《申报》1934年8月20日

² 禹燕：《女性人类学：雅典娜一号》，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的东方内涵使得它拥有坚定的中老年拥护者。与西装的刻意和坚挺不同，长袍马褂在穿着的舒适性上显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这身服装略显保守的风格，似乎也暗示了它的主人具有温厚可靠的个性。尤其是商场或政坛上，身着长袍马褂面带笑容的中年人，似乎比身着西装，头发油亮，讲起话来不给人喘息之机的小伙子更可信一些，更容易得到对方的信任。上海妇女在职业化得路程中跌跌撞撞，备受歧视，她们的能力没人重视，很多的职业要求女性除了外貌漂亮以外，对女员工的年龄、婚姻状况都作出了严格的限定，在工作中女员工升迁的机会可以说是没有的，不仅如此，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没有赢得男性同事们的尊重，部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主要表现在他们随意给女员工起绰号上，“男同事，常喜背后私语，并造出种种绰号。如体壮者即呼为‘航空母舰’，脚长者‘高射炮’，身高者呼‘电线木杆’。走路时八字脚者绰号为‘无线电车’，肥者为‘弥勒佛’”¹。她们在工作中没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在家庭中，她们的安全感也丧失殆尽，她们将自己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付诸了种种非婚的行为中而无法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动荡乱世中的似乎没有任何可以给她们借以保护环境，妇女这种自我的心理冲突，会导致她们把服饰变作一种“自卫技能”，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以克服内心的挫败感、自卑感等；又或者为应付百变时新的服装，极需排除心理障碍、斗争等。改良旗袍正是妇女心理的一个重要折射，它收紧的上半身给妇女提供一种贴身的保护和安慰，而它开放的下半身设计，是妇女对当时社会给予她们的“花瓶”地位的无奈回应吧。对于当时上海女性的矛盾身份 1928 年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已有认识，他称“男子方面有时视女性若恶魔，有时视若天使，女子方面有时自视如玩具，有时又自视如帝王，但这恐怕都不是真相吧？……”²。同样看到妇女的现实窘境并提出质疑的还有鲁迅先生，他在 192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中就提出了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疑问，他认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诚如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于此同时“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

¹ 《女职员之绰号》，《玲珑》1933 年第 123 期。

² 周作人：《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8 页。

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¹。而当时对上海问题颇为关注的徐国桢也对当时上海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记载和反思，在1930年出版的《上海生活》一书中分析了上海社会的男女关系，在本书的第八章男女问题中，作者如是记载：

在旧社会之中，完全是男性的势力女性差不多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已。近年以来，女界同胞，深切的感受到此种痛苦，一般受过新智识洗礼的妇女们，莫不抬起头来，奋勇走到社会上从事解放运动。

上海得风气之先，受过新智识的女子，自也来的多一些，所以上海的妇女运动较其他不甚开通之处，自然要热烈些。不但是热烈，就是以所得成效而论也不弱于其他各地。

妇女们住在上海较之内地，要自由的多：旧社会中“轻易不下楼”的小姐们在上海已是很少了。

要说上海社会中男女双方已完全平等，这句话似乎尚不能完全成立；不过，就一般的现象而言，妇女们的地位，确已提高了不少，也是不可掩的事实了。

在教育方面，男女已实行同学；在职业方面，女子也已占得了一部分势力；在婚姻方面，根据自由原则结合摈除买卖式的夫妇，也已很多。

在各种公共场所，如戏院中，游艺场中，男女都可随意就座，并无男坐何处，女坐何处的严厉限制；更如，有什么群众运动，也有妇女们参加，有什么公共问题的讨论，妇女们也可以自由提出关于她们切身利益或其他方面的意见，社会上同样的加以注意，并不因为是妇女而就有所偏乎。

在马路上，很多挽手并行的男女伴侣；在交际场中，男的可以交女友，女的可交男友社会上对于她们，除了十八世纪式的古董还要以为大逆不道外，普通人都不以为奇了。

三四年前，上海各京戏馆，只有在法租界范围以内是男女合演其余各家，都办不到，现在，不论公共租界、华界各京戏馆，各游艺场，都是男女合演

¹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妇女杂志》（上海）1924年8月1日第十卷第八号。

了。

上海有职业的女子：以做工的为最多；其次在商店里当柜员，或各大公司办事；在教育界服务的占最少数。

各大小学校中的兼职男女老师，已不至今日始，不过在全上海之中，学校的数量，究属在比较上要算最少，所以女子服务于教育界的历史虽然已久，而在人数上比较起来，仍旧还不及服务于工商两界者之多。

各大工厂的收容女工，也是早有比例，近几年来只见其增，不见其少，就一般有职业的妇女而推求其最多数，舍此莫属。这种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子，都是平民阶级中人，资产阶级中人，可说一点没有。因为，女工们的生活，是很劳苦的，有些做“日班”的，每天东方发白，就急急的要进工厂上工；有些做“夜班”的，人家都已睡得烂熟的时候，她们正在努力地工作着。——男工们也是如此——不过，她们的身体固然是劳苦，她们的经济却是因而能够独立了；吃的饭，穿的衣，都是自己的汗力换来，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比着那些只懂得消费不肯做事的富家小姐，不知好上几十倍她们虽然是大都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然而我们对于她们，却不可不表示着相当的尊敬。

个商店，各公司的任用女职员，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以前时候，用女子充当店员或办事员的，很是少见，后来各家试用女子办事的商店和公司，成绩都甚佳，在能力上并无不能胜任之处，于是用女职员的人家，逐渐多起来了，这一层在女子职业运动的前途是很乐观的，

照上面种种看来，女性在上海的地位，可知却是已非昔比，男女之间的隔离，也不像从前一般划得一清二楚了。

男女间的隔离既不甚严密，于是双方见面的机会就多；不但见面的机会多，就是交谈的机会也多。因此，上海的妇女们见了一个男子，已很少无缘无故的要躲躲缩缩面红耳赤的怪现状。除非是有些伏处在极顽固家庭以下，未曾受过相当教育，那是又当别论。可是，究属占其少数。

男女双方，由友谊而进于恋爱，是一种极其正常的恋爱程序，上海社会中既可男女相友，那末，一般未婚而又性情相合的男女伴侣们。当然就有发生恋爱的可能。恋爱自由，是人生应有的权利，只要求其正当，不用放弃的，上海社会中既有恋爱自由的可能，自然不患没有实行之人。现在，上海男女的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已经很多，社会上对于他们，并不怎样的加以丑诋。

不过上海男女的实行恋爱自由者，虽然颇不乏人，但是照现在的情形而看，大概都是些智识阶级中人，其余普通社会中人，仍旧依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礼而行；所以，自由恋爱四字虽已通行于上海，但仍旧不能说是已经普遍，不过比较内地的只知死守着古礼的情形，已有所不同罢了。

同样关注妇女解放后的无奈处境和悖论身份的还有1924年《申报》中一篇名为《受过教育的妇女到哪里去了？》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反问的问题耐人寻味，也是对上海乃至全国社会妇女解放的问责。

“……现在拿许多知识妇女来说，除开受过高中以下的教育的妇女以外，单就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来看，平均在每个大学里的女生人数几乎占全部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的女生人数，若拿去和男生比较当然是萧条的可怜，但是只就这每个学校平均的数目的总数，和各机关里的职业妇女人数去比较，是怎么样的差别，而且，职业妇女的数目是有限的，学校是每年送出一批旧生，招进一批新生，当然知识妇女的人数，不能只就在学的而言，那么受了教育的妇女，除开分了最潦倒的几个在各学校，各机关里服务外，那大批的数目销到哪里去了？从幼童时代到成年，到结婚为止，在结束了四年一或不满四年一大学光阴以后的妇女，她们把曾经是十年窗下的功课用到了什么地方去了？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收获交给了谁了？不成问题的是，这种妇女解放运的结果，把大批受着“愚民”教育的深闺妇女，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完结了几年的男女平等的教育后，从新又把她们送回到老家去，做一个新型式的‘贤妻良母’”²

虽然当时的上海女性未必就存有“美就是权利”³的系统的思想，但是她们还是把她们对于权力的渴望，通过对于旗袍美的追求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作为女性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这样描述旗袍带给当时上海女性的心理安慰与暗示以及妇女对自身矛盾身份和当时混乱时局的紧张和无助，惟有用紧束的衣服保护自己。“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年，袖长及肘，衣

¹ 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67—72页。

² 《受过教育的妇女到哪里去了？》，《申报》1924年3月8号。

³ “美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美国学者鲁宾斯坦在其著作 *Dress Codes, Meanings and messages in American Culture* 中提出来的，其核心在于阐述肉体美，衣着美的积极意义，认为它同财富、才华等一样是一种在社会活动中有着积极而重要意义的资源。

领又高了起来。……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¹。

西方的服饰理论学家认为男女服饰的区别在于统治原理与诱惑原理，男性的身体被社会化以身体语言表达控制、统治、抢掠的态度，而女性服饰则以身体语言学习表达被扰爱的人和物，娇羞，可爱。在诱惑原理控制下的女装主要用以吸引男人²，这也是导致妇女奇装异服的根源。

服装是文化中具有象征性和标识性的个体。服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心理符号，它是群体社会心态和社会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与其象征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使得双方产生一种双向的互动作用，人们得以通过符号的外观的解读和把握来探寻符号背后的含义。而上海社会传统与现代观念激烈碰撞也在这件衣服上折射出来。改良旗袍是含蓄保守的，那高耸而圆润的领子，让中国女人充满了含蓄、娴熟和内敛的美。这样的美，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女人特有的传统美德和矜持心态。改良旗袍又是开放和性感的。这体现在开衩上，尤其是那种高开衩的改良旗袍，让女性的一双腿在若隐若现中闪射出无穷的撩人风韵。这样的美，使得上海女性平添了几分奔放，在稳重里又增加了几许妖冶，在娴静中又洋溢着不少妩媚。成了近代上海人最为时尚和开放的性格在妇女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

¹ 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哈尔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 页。

² Ruth P. Rubinstein: *Dress Codes, Meanings and Message In American Culture*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83.

第三章改良旗袍与 20——40 年代上海社会

第一节 20——40 年代中上海社会对改良旗袍复兴的促进因素

服装承载了一个民族整体的记忆。而某一件具体的服装就如同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总包含有叙事性的因素，每一个功能都有其自身的符号”¹。抑或如康纳顿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一件衣服都变成文本特质的某种具体组合”²。服装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产物，是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中具有象征性和标识性的个体，是主体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标志。同时由于受到主体意识的主导，它又是主体生存状态和自我意识的重要反映。满足主体自我表现和审美的需要。因此服装不仅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³，也是群体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要载体。改良旗袍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折射出在近代上海人身上传统与现代观念激烈碰撞的服饰符号，改良旗袍是一部东方神话；是上海殖民地时代的、东方女性的、摩登性感的服饰神话。改良旗袍将东方传统和西方摩登风格混为一体，其朦胧性感而又矛盾的文化语义，代表了 20 世纪 20—40 年代上海文化和上海社会本质上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是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上海社会的独特符号化语言，必须将改良旗袍放置在上海社会和文化的特殊语境下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旗袍特有的文化语义。从改良旗袍的中西合璧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上海社会在东西方文化取向中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改良旗袍之所以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也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开放，不断斗争的结果。上海的旗袍体现了纷繁的都市生活，它的样式与色彩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根线条中去了。大都市的富有、梧桐树下的外国情调、白领阶层的悠闲、交际花们的手段，都渗透着旗袍的情影。在中国，如何穿戴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政府、商界甚至文人参与其中，使得改良旗袍的改良过程并不平坦。

改良旗袍复兴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决不是没有原因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都是不可忽视的。

着装首先往往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气温对一个地区的着装往往有

¹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5 页。

² 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³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9 年第 9 期。

着决定性的影响。“上海全年平均气温，据 1873 至 1916 年 44 年间之统计约为华氏 59.05 度（即摄氏 15.03）。夏季七八月间最热，……44 年间历月（七月）平均最高气温为华氏 80.35 度（即摄氏 26.86）……冬季一二月间最冷，最低温度为华氏 32 度左右。44 年间历月（一月）平均最低气温为华氏 37.85 度（即摄氏 3.25 度）”¹。

前记四十四年间（1873—1916）各月温度统计列表如下：

月份	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气温 （华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最高 气温	45.7	46. 9	54. 6	65. 7	75. 7	82. 6	89. 6	90. 0	82. 4	73. 4	61.8	51.1
最低 气温	32.0	33. 4	39. 6	49. 1	58. 1	67. 1	74. 5	74. 3	66. 9	56. 3	44.5	35.1
平均 温度	39.8	39. 2	46. 0	56. 1	65. 5	72. 7	80. 3	80. 2	73. 0	63. 3	52.0	42.1

资料来源：韦息子：《上海》大江书铺 1932 年，第 28 页。

根据摄氏与华氏之间的转换关系： $\text{摄氏度} = (\text{华氏度} - 32) * 5/9$ 可以推算出四十四年间上海的月最低气温为 4 摄氏度，最高月平均气温为 26.83 摄氏度。由于上海气候的关系，春夏秋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属于温带的城市。改良旗袍正是适应了这种气候。一年四季穿着都非常合适。改良旗袍以流畅的线条，简洁的构造，典雅的色彩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上海妇女厌恶臃肿的服装，即使在冬天，由于气温的缘故，也是尽量少穿衣服。北方妇女的臃肿着装，色彩单调，做工粗放，是上海人不喜欢的。

改良旗袍能够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在上海社会大行其道，与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晚清上海就已是时装的发源地，庶景鹏称“上海为近数十年来妆饰之发源地。全国奉为妆饰之取准点”²。究其原因庶景鹏认为“上海为中国通商最早商埠。亦远东大城。前二十五年已输四通铁路遍设，

¹ 韦息子：《上海》，大江书铺 1932 年版，第 28 页。
² 庶景鹏：《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96 页。

远至欧美近由内地。男妇老幼，踏迹而来。此户此时已及二百余万。国籍二十余国，省隶二十二省，人类汇萃，才具必盛……即妆饰小道亦由中外士女交际之场，而得进化之发轫，盖华洋咸集一场，衣冠各异，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引人视线。尤推妇女有聪明者出，取华洋各种妆饰之长处，而弃其所短，加以巧思，制成新妆，贡献中华女界，后又随社会之好时时变迁，日新月异，循循不穷，使各大都会喜作时妆之妇女，甫制衣装又称失时，更令其羡慕不置，而全国妇女永以上海妆饰为马首是瞻者，良由此也”¹。改良旗袍的流行也离不开作者分析的因素，首先上海作为一个新崛起的通商城市，并无传统文化的包袱，对外交流的广泛和交通的便利使得西方的服装迅速传播开来，对于本土服装的改良和新型服装样式的开创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近代以来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城市的商业化程度越高，城市人的摩登程度也就会越高，世界上大多数商业城市都表现了这种倾向，如 19 世纪的巴黎妇女，如二十世纪的香港，繁华的商业，造就了摩登的妇女。像近代的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妇女厌恶一成不变的古板服装，厌恶过时的落后的一切文化表现，并且不断的创造条件来改变它。而乐正先生对近代上海人追求时髦社会心态的分析和把握则可以视为改良旗袍复兴第二个方面的因素，“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中西并存的城市，社会开放，人员流动，生活节奏也较内地快，容易产生一种多元化的消费动感，这是其一；上海人打破尊卑等级消费观念，受传统模式束缚较少，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消费式样，这是其二；上海商业发达，商人们以制造时髦款式，应和时髦心理位推销之术，不断鼓动人们加入新的消费潮流，这是其三；上海人心灵手巧，制作精细，一件平常的东西经他们加工改造，就成为一件时新而精美的物品，这是其四。这些因素加上上海人不墨守成规，新欢接触新鲜事物的性格”²真正使得改良旗袍之风在上海滩的流行之风愈刮愈烈。徐国桢先生对当时上海社会的分析则似乎更有借鉴的意义，当时的上海社会环境可以说是改良旗袍得以复兴的土壤吧。“（上海人）身上穿的漂亮的家里未必个个有钱，甚至有些简直是很穷。所以有这种现象，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上海社会的环境，很是繁华，目之所及，几乎无处不是穷奢极欲。第二，一般普通社会中人的眼孔太浅，‘只认衣衫不认人’。第三，内地的社会组织，往往很简单，经济不宽裕的人，即使衣服华丽夜很慢瞒过人家；上海的社会

¹ 庶景鹏：《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第 296 页。

²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2—113 页。

组织，复杂而更范围广大，经济不宽裕的人，穿了漂亮衣服走在马路上，人家很难窥察出他的底细，易于掩饰去自己的贫穷而假扮阔客。第四，有许多人的穿漂亮衣服，是有作用在内，即使自己不要穿漂亮衣服，因自己所处的地位关系非穿不可；如妓女等类。第五，上海社会多青年，青年大概以富于爱美观念及比较性者为多。”¹而徐国桢在另一本反映当时上海生活和社会的著作《上海的研究》中也对女性的新奇着装的原因作出了另一番精彩的分析。“无聊人的提倡与鼓励。上海有许多蹩脚文人，在蹩脚新闻纸的附张上做几篇提倡奢华的屁文，一来骗些稿费，二来自命风流；更有许多蹩脚画师，吃饱了饭没事做，在不值一笑的狗屁报上画几张叫什么‘新装’，大概是自示其有资格做妇女们奴隶；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挟着照相机跑来跑去，拍几张时髦女人的骚照，印在一种叫什么‘画报’上……更有些市侩，见有钱可捞，就开设专制妖怪装束的店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尽诱惑之能事。”而广大的上海妇女本身则趋重欧化“中国人近来大概有些做中国人做的讨厌了，所以处处趋重欧化，恨不得连自己的老子也变了个外国人，这种现象的究属是好是坏，此处不谈；但是上海妇女的所以特别新奇，却乎是受到这问题的一部分影响的。因为上海的外国人特别多，一般人对于外国人，总是特别钦仰，妇女当然也未能免俗，所以就极力摹效夷妇装束，以骄自己的同胞；一般人见了染有洋气的时髦人，也就奔走相告，谄之曰开通，媚之曰新派，于是上海妇女们的装束，愈弄愈光怪陆离了。内地虽然有许多女人们很愿学学外国人，只恨中国尚未完全灭亡，内地的外国人极少，天不从人愿，所以内地女人的洋气，终嫌略逊于上海女人；在事实上只得让上海妇女独步一时了。”而上海妇女本身亦具有勇于尝试的精神和胆魄，“妇女们的心情，比较来的活动，而上海妇女对于装束方面，更其是动之不已，所以花样特别多。可是单靠心情活动，是不济的，必须要勇于尝试，践行。上海妇女对于装饰方面，也能同时具有此项精神。譬如袒胸露背，在中国旧习惯上，很要遭人非议，但是上海妇女决然不顾一切，大胆一试；不但是一试，而且人家纵然反对，也能置之不顾，持之以毅力。所以反对者虽多，而终不为屈。这种精神胆魄，很足钦敬，可惜上海妇女只以此致意于装束方面，在别处就有些不肯了。”²

而改良旗袍的推广普及也不仅仅是“习俗移人”这般简单。至少在以下几个

¹ 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8—29页。

² 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35—37页。

方面适应了上海社会的特点。

一、实用保暖，便利经济。

“皓腕搓酥洁似霜，北风一夜玉肌凉，盈盈十五江南女，竞作胡姬塞上装”¹这是1925年时人的旗袍诗。一如前文所述改良旗袍最初是作为一种更具保暖性能的外套形式出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上海妇女界流行短衣长裙（或长裤）的“文明新装”。（如下图所示）这是作于三十年代的双美龙公司的月份牌广告画。图片中的两位女性右边的那一位上衣下裙，左边的一位是上衣下裤。颜色均淡雅素净，和谐而又充满韵致。但是这身衣服不仅穿着麻烦，用料稍多，并且在如何搭配上下身的颜色上也颇费周章。而改良旗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不仅节约了金钱，更避免了配色的尴尬。改良旗袍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它对制作材料的要求极其宽泛：麻、棉、丝绸、各种西式绉、纱等等各种质地的改良旗袍在传世的实物中均有发现。极大的适应了上海社会各阶层妇女的生活需要。



图片 19 着文明新装的女子月份牌。
图片来源：宋家麟：《老月份牌》，上海画报出版1997年版，第28页。

二、简洁舒适，美观适体

改良旗袍用一块布料裁制而成，不仅省工省料，经济方便，同时因为其简洁大方，而更显得女性的曲线突出，配上一双高跟鞋，愈发显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与西方服饰的紧缩和刻板相比，中国传统的服装与身体之间的空间是很大的，中式服装相对来讲是最人性化的服装，它像是一条变形虫一样。强调舒适性和协调性，改良旗袍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服装的这一优点，适度紧贴，又不乏舒适和便捷。同时它又像一个魔法师，

用最简单的单块布料让上海妇女的身体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有人把改良旗袍比喻成会跳舞的官窑瓷器。如同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一切皆大不同了。这块简单的布料因为使得女性的三围显山露水，含蓄而又性感，高贵而又典雅。

¹ 毕倚虹：《旗袍》，《紫罗兰旗袍特刊》1925年第一卷第五号。

三、可塑性强，搭配容易。改良旗袍如同一个千面女郎，自由而多变。让不同的穿着群体散发出不同的韵味，甚至搭配不同的外套和配饰，即使是同一件旗袍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韵致。适应不同的场合需要。一件阴丹士林的布旗袍当《十字街头》中杨芝英穿在身上，走在上海郊区泥泞的上班路上，让人倍感下层妇女生活得艰辛和苍凉。而影后胡蝶穿上它出现在提倡国货的队伍中，则显得落落大方，清爽优雅，一时成为时尚。弄堂里小家碧玉的花布旗袍，弥漫着纯真的回忆。学校里以蓝、白、黑为主色的旗袍，透射出浓浓的书卷气息。大公司里飘逸着女职员时髦而潇洒的旗袍，体现了黄浦滩头的洋气，百乐门内、霞飞路上是华艳精美的新式改良旗袍，批洒着十里洋场靡绚的灯光和鬓影，投射了大都市的繁华和畸形。不仅如此，改良旗袍因其简单所以往往可以和任何时尚元素搭配而不冲突，蕾丝花边，丝须边，盘扣，均被蕙质的女子用于旗袍上而风靡一时。

第二节 国家和上海社会对改良旗袍的控制

在民国上海旗袍改良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政府的力量主要通过政策或者服装决议对着装进行调整。在改良旗袍变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始终贯穿其中，影响并左右着改良旗袍制式和材料诸方面的变化，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权利无处不在，即使在我们身体的微妙领域”¹。政府的力量通过控制妇女衣着的款式实现着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和约束。

在改良旗袍的变化史中，1929年可谓是关键的一年。1929年4月16号，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将中山装定为男性公务人员制服，并将旗袍列为女子礼服，规定“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六”。²这个服饰规定其实并无新意，只是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对女子服装的一场拨乱反正，想让妇女服膺礼教，甚至想把旗袍的样式限定在1926年的款式上。阔袍长袖，内穿长裤。这一系列的规定也无非是想应对1928年间女子旗袍不断变短和以袜代裤的风潮。“旗袍的长度堂而皇之的缩短到膝盖下面一点，整个小腿都露在外面了。于此同时，衣袖亦在逐渐缩短”³并且兴起了旗袍内不穿裤子的潮流，时人撰文称“这种新改变的旗袍，穿起来可说时髦极了！美丽极了！可是一双肥满而圆润的大腿，暴露在冷冽

¹ 严亚明主编《权利的阐释》，严锋译：《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² 《服制条例》，《国民政府公报》第二十六册，（台北）成文出版社，第3页。

³ 俞松年、牙家义、毛大伦、刘文萱：《生活名物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的天气之中，仅裹着一层薄薄底丝袜，便能抵御寒气的侵袭么？”¹。其实早在1928年关于钦定国服的呼声就越发高涨起来，7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社会调查处，省市两妇女协会和南京市教育局就召开过联席会议，呈请中央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和速定女子国服。本次会议的最后决议有四条：“一、由省市两妇女协会发帖标语及传单，劝告妇女不得奇装异服，自损人格。二、由公安局布告劝导，并令饬各区署对于奇装异服之妇女，应以和平劝告，其违抗不遵劝者，即从严取缔，并交由省市两妇女协会处理之。三、由省市两妇女协会及市政府分向中央呈请规定普通妇女及女学生、妓女等服式。四、对于男子露体短衫短裤一律取缔”²。但是本次会议的决议并无任何的实际意义，对于所谓违规的“奇装异服”仅仅采取劝谕的态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起到限制的作用，并且从身份上来限定女性不同阶层的着装，显然也背离了当时时装流行的趋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服制条例颁布之后，各地公安部门对女性的奇异着装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在长沙因为政策的严酷还一度引发了女界的骚乱。南京市公安局于1929年8月8号“通令各署，饬属查禁，如有奇装异服，裸露身体者，招摇过市者……一律拘案惩处，以正风化”³。上海市政府也于9月24日发布取缔奇装异服的训令，“以期纳人民于轨物，肃中外之观瞻”⁴。一系列的取缔奇装异服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旗袍作为国服的正统地位。但是某些西方的服饰因素也多少在这件衣服上体现了出来，徐国桢在《上海生活》中称1929年上海流行时尚的旗袍款式“曲线的显明，自然已成应有条件之一，穿上了真是紧紧地裹在身上，走在路上，凡是胸部臀部腰部腿部，都可从衣服外面很清楚的一一加以辨别，不必出之意会了。领高而硬，似乎一个竹管套在颈之四周，衣袖很短，不过到臂弯为止，袖口也不甚大，长度只到腿弯，两条玉胫上，套着一双长统丝袜，再加上一双高跟皮鞋，走起路来，“吉个吉个”的益显婀娜。”⁵从作者的描述看来，《服制条例》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规定却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旗袍的穿着群体和普通群众对旗袍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大约在同一时期，教育部公布学生制服规程，规定高级小学及中等以上学校女学生的制服分为长袍式和短衫式两种并且要全

¹ 叶家弗：《女子的服装》，《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11月20日。

² 《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联席会议》，《申报》1928年7月17日。

³ 《京公安局关怀风化》，《申报》1929年6月8日。

⁴ 《取缔奇装异服》，《申报》1929年9月24日。

⁵ 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33—34页。

校一致。其中袍式规定“长达膝与踝之中点，裤长与衣齐”¹。旗袍作为学校制服进入了妇女的视线，此后改良旗袍的流行不在仅仅是时尚的问题，更多的也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妇女着装的引导和规范。虽然改良旗袍并不像中山装那样有着鲜明的表象符号，但是其大胆的西方元素的应用还是映射出广大上海妇女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国服基本色的规定完全是应和 1925 年之后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表现，日本人曾经将那时的中国称之为“青衣的大陆”²。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阴丹士林国货的热衷。而这场关于国服的运动伴随着 1925 年上海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响应。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爱护国货的运动，各界对于国货的巨大热情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服装的态度由“奇装异服”的讨论转而进入对服装面料是否为国货的热议，在这场拥护国货的运动中，商家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充斥报刊的是各种关于国货的讨论和广告。各厂家也纷纷推出以自己的国货品牌——章华、九一八哔叽、美亚绸缎、雨晴牌阴丹士林布、自由布等等。从名称上都也可看出浓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怀。就连一向剪裁西式的鸿翔公司在其大婚服的广告也不忘提及“衣料是完全用国产丝绸纱绉”³。而仰翰的《服装与礼仪》一文则将布衣推到了一个更高的礼仪平台。并对国货布料进行了高度赞誉。“普通人看来。穿衣要十分讲究，要价值高贵，其实穿衣的真正价值是在：一、颜色素净而朴实；二、不褪色；三、坚韧经穿。我觉得国货衣料中合此条件的样样都有，要穿西装，则有章华呢绒，要裁轻盈美妙的衣服则有亚美绸缎，要裁朴素文雅，经穿美观的衣服，则有鸿新布厂的各种布匹。我们青年，尤其是我们在此国难重重之下的青年，大家要养成穿着布衣的美德，鸿新布匹恰合不褪色，朴素经济的三个原则……”。⁴1930 年中国的首场时装表演大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楼举行，这场服装秀历时八天，在《民国日报》刊登的广告词中声称“英国名厂 Wemco 所出之 Tricochene 绸，花样新奇，颜色鲜艳，适合春夏衣料之用……该厂特派专员来公司为新装设计，现制就各款新装多种，均属独出心裁……延请中西名媛登台表演，服饰之美丽，设色之夺目，姿态之曼妙，举止之大方，无不表现入微，令人发生无限美感”⁵。但是就这样一场开创性的事件，

¹ 《教育部最新公布之几种重要规程》，《教育杂志》1929 年 3 月 20 日。

² 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台北）中国旗袍研究会 1975 年版，第 101 页。

³ 《鸿翔公司广告》，《申报》1930 年 9 月 10 日。

⁴ 仰翰：《服装与礼仪》，《申报》1930 年 9 月 30 日。

⁵ 《时装表演大会广告》，《民国日报》1930 年 3 月 26 日。

在上海这个惯于标新立异的社会中并没有引起如往常一般的艳慕和迎合，而是被各界揪住“外国货”的小辫子，一顿痛斥。“大公司的大老板不过为了恐怕闺阁千金们不知道有这一批外国新货可以购买，所以费尽心思才开了这样一个大会罢了。登台的中国名媛，不过为了恐怕姐妹们不知道外国货，所以特地参加在这时装大会里。牺牲了色相，登台在观众面前入微地表演着曼妙的姿态。啊！伟大的牺牲，伟大的壮举，值得赞美，值得佩服”¹。1933年《申报》甚至创立国货周刊，土布运动专号，以宣传国货运动和倡导节俭的生活，很多名人以身作则，撰文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践行国货运动的宗旨。

我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农家子，记得从有知一直到十四岁小学毕业，全身穿的没有一样不是老土布……

我小学毕业的明年居然当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在采办书籍文具等等的时候，不免到上海走动走动，耳濡目染，于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开始到我身上来了，荷兰的白竹布短衫裤，大英（那时候的称谓）的白羽毛纱长衫，迦门（即德国）的鹰球牌线袜，一件件，一样样在我身上发现，一直到进师范读书，毕业后，再当市立学校教员校长，做教育行政人员，于是逐渐进步（？）到穿哗叽长衫，直贡呢马褂，大英皮鞋，意大利呢帽，而到全身舶来品的西装直到五卅惨案为止，算计我贡献于洋大人的，十年中间恐怕要近千元吧，实在的，那时候，脑里边充满了只要“漂亮”就算，并没有什么“国货”“非国货”的观念，这算是我服用洋货时期。

因五卅惨案的一刺激，爱国思想大为发达，我就停止添办洋货西装，逐渐的穿起国货绸缎中装来，实在还脱不了“漂亮”二字的观念，十六年革命军同志到沪后，看见各地一般党同志，和教育界同人们，多穿着洋货的服装，心上已觉得大不以为然。九一八事变突起，我随着我所信仰的人士，奔走呼号，谋救济国难的途径，认为在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只有以身作则，对东北义军做物资上的接济，及精神上的援助，并与家人们立下三条公约：一不进戏馆影戏馆游戏场一赌博跳舞本来无缘

二婚丧喜庆的送赠至多以两千元为限

三服装一律用家货的土布

一方面竭力向亲友间扩大我们的主张。尤其在上海几次很阔绰的喜庆家

¹ 蛸时：《时装表演大会》，《民国日报》1930年3月25日。

宴中，我穿着土布的袍褂，我的夫人穿着土布的旗袍，我的长次二子穿着土布的童装，从容的，活泼的，周旋于一般摩登男女之间，真被我们感动的不少。¹

王映霞在回忆郁达夫的衣着时，亦提到“郁达夫自己不讲究衣着，因而也不许我穿着打扮，我穿的总是阴丹士林布旗袍，即使赴宴也是如此。有一次在杭州，我穿了一件咖啡色的绸旗袍，走出门口时，他看了我的衣服，就说，今天不去了”²。

而大陆商场的宣传广告则只有一句话就能够抓住当时消费者的心——“中国人买国货请到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³。一时间以中华传统服饰为美，为时尚的思想也渐渐兴起，诛心在1929年5月11日的《北洋画报》中撰文《打到西装，国服万岁》，呼吁男性弃穿西装，改穿长袍，认为女装旗袍、文明新装等尚未完全进入西化的时期，值得提倡和推崇。而林语堂先生虽留学国外多年，提起西装仍深恶痛绝“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穿西装，这问题虽小，却可以看出一人的贤愚与雅俗了。倘是一人不是俗人，又能用点天赋的小聪明，兼又不染季常癖，总没有肯穿西服的。我想。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之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至于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尚穿西装，那必定是他仍旧臣服于异性的徽记了。人非昏聩，又非惧内，绝不肯整日价挂那条狗领而自豪。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这是很鲜明彰著的事实。”⁴“国服运动，国货运动在男性着装方面的影响愈发深远，陈蕴茜教授在其新作《崇拜与记忆》中对中山装在中国男性群体中的普及作出过详细的论述。

在女装方面，在1929年之后，一种薄纱的旗袍风行沪上，这种薄纱旗袍的兴起与一项运动在上海女界的普及有着很大的关系，这项运动便是游泳，相对于其他的运动项目，游泳是较晚传入上海的，1929年之前女子游泳运动在上海的发展也很缓慢，但是游泳运动一传入上海，立刻引起了女界的极大兴趣，上海高桥海滨浴场很是热闹，“公共汽车塞的满满地把这些人运到海滨泅水去，男的女的，一对一对的，一双一双的”⁵。时尚杂志也对这一运动大加提倡，“一九三

¹ 姚惠泉：《我的服用土布谈》，《申报》1933年9月28日。

² 王映霞：《郁达夫的衣着》，华道一主编：《海上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³ 《大陆商场广告》，《申报》1933年9月28日。

⁴ 林语堂：《论西装》，老品选编：《名人笔下的衣食住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⁵ 陈嘉震：《大上海的热景》，《良友》1934年第92期。

四的夏。是游泳流行的季节。时代的小姐太太们，无论你们是去海滨，到莫干山，或是留在上海，请不要放弃这游泳的良机。他是健康的好友，也是潮流的趋向”¹。这一运动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旗袍的材质向透明化的方向过渡，旗袍的长度也随之缩短。以薄透轻巧，轻短便利为特征的新型改良旗袍风靡沪上。1930年代的西式女装也是以轻薄暴露为时尚，“从去年秋季，中国的流行界好像是非常沉寂而呆滞；然而如果把眼睛望到海洋的那边，我们就发现许多新的动向了。这种动向，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影响到我国的流行，所以预先在此探讨它，确是个很有意义的事呢。

透明的衣料：

衣料界竟要到临了 Cellophane 的时代呢。在晚衣上，在提袋上，或在皮鞋，帽子上，这透明的家伙被爱用着。从玻璃模样的无数的小片上，曲折地反映的复杂之光线的魅力，确是很出色的呵

Chiffon

晚装，用 Chiffon（纱）制成怎样呢？在花袖之阴暗处，你的宝石好像雾中之路灯船美丽的闪耀着。

Lace

Lace 又回到春之流行界了。透过 Lace 而所现露的你桃色的肤色与内衣之协调，不是像个春之梦则什么呢？”²

当时上海惠罗公司将上面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们公司新近一种晚装舞衣“用精细透明纱约……且加有彩色明钻，四周镶成式样绝佳，艳丽无比，颜色众多，……在舞场着此一袭，与电炬相映，光彩闪烁……”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薄纱似的服装，很快被上海女性由夜场搬到了白天，1933 年时人撰文指出“在上海，一般小姐与少奶奶之流，一到夏天，却非穿着蝉翼似的薄纱，全裸着两腿，使冰雪肌肤，如雾里庐山，隐若可见，才算得第一流‘摩登’”⁴。在旗袍面料趋向薄透化之后，1930 年代以后妇女着旗袍不穿袜子的风潮也随之流行起来，自从上海妇女开始流行旗袍内不穿裤子开始，各地当局一直甚为紧张，

¹张心漪：《健美之路》，富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第 9 页。

² 张丽兰：《晚春流行总决算》，富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第 34 页。

³ 《惠罗公司广告》，《民国日报》（上海）1930 年 3 月 14 日。

⁴ 天马：《从裸体运动想到的话》，《申报》1933 年 7 月 20 日。

还好各种色彩的女袜弥补了这一空缺，30年代以前，时尚杂志不断发出各种袜色的流行信息，“身上穿有华美的衣物，但如果你的丝袜的线条从后方望过去是弯而不整齐的，或是脚跟处补有一个破洞的，老实说，没有比她再可怜的了”¹。

“去年丝袜的流行色是咖啡色，丝绸（Silk Mesh）的袜子是被一部分的女子爱用过得”²。而到1935年之际不穿袜子的风潮已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近来又盛行女子裸腿赤足，伊们的理由是：凉快舒适，还可以省一双袜，似乎又在经济方面打算了。那知有些女子，在腿上擦了又白又香的巴黎香粉，在足趾上涂以鲜艳的玫瑰色蔻丹，这价值又比一双袜贵的多了，显然有要与提倡的目的，渐渐背道而驰，这是谁料得到呢？”³。显然上海市政府是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并率先于1930年发布禁令“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局昨日会衔发帖布告云，为会衔布告事，查人民服饰与社会风化关系至巨，前经内政部拟定服制条例，呈奉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对于奇装异服，并经通令查禁在案，近查市内发现少数妇女，衣裳华丽，不袜而履或短袜露腿……除由本公安局通令各区所，从严查禁外，合行会衔布告通知，仰本市各妇女，一体知悉，毋得故违禁令，故干惩处，切切，此布！”⁴但是上海的女学生似乎并不买账，“索性把袜子去了，不但露腿，而且露出‘香钩’，不但露出雪白粉嫩的大腿，而且在大腿上，画了图案的花纹”⁵。1931年以后不穿袜子的姑娘在上海也日渐多了起来，到1933年天津街头的女子也多不着袜子，“日来天气甚暖，摩登女郎徘徊街头，招摇过市者，大有人在。最摩登者，……只穿极薄丝绸夹旗袍，微风过处，衣衩缝里，可窥见玉腿莹然，已多不穿丝袜者矣”⁶。

裸胸。露臂，裸腿……新女性大胆暴露的着装使得社会的卫道士们越发紧张，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不参与社会性的劳动和活动，“三从四德”是妇女的基本道德准则，同时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禁欲主义风行，对女性的禁锢尤为严格，除了脸部以外，女子的身体肌肤不可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在当时裸露双腿与裸露全身无异，各省市不断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对服装作出规定。

¹ 张丽兰：《流行界的悲喜剧》，富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页。

² 张丽兰：《流行界的悲喜剧》，富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页。

³ 妙神：《女子解放和不穿女袴》，《申报》1934年6月14日。

⁴ 《告诫妇女服装》，《申报》1930年9月21日。

⁵ 暮气：《断袜文腿》，《北洋画报》1930年第511期。

⁶ 《不穿丝袜》，《北洋画报》1933年第614期。

而国民政府也认为“此乱邪昏懦状态之下，社会秩序混乱，邪说横行，人多沉迷陷溺，莫知所从”¹。为此1934年国民政府推广旨在使得国民的“衣食住行”四事符合儒家传统“礼义廉耻”的规范要求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并认为，唯有如此方能“纠正其乱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风”²。此后不仅在上海，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更大范围影响旗袍变迁的运动开展起来，长期以来中国保守的知识界中式会以妇女服饰消费的高涨和服饰变幻的怪异性来衡量妇女解放运动的成败，认为妇女追求时尚是自甘堕落，甘愿做男性玩物的表现，“我们知道中国的女子，自从被三从四德的铁链困缚以来，说不上自由，谈不上意志。虽然近来似乎政治上、教育上、经济上都得到了平等，但那些只是幸运儿才能偶尔获得的，大部分，不，应该说是全部，还是做着奴隶，当着商品：因其是奴隶，所以不得不听主子的使唤，以图承欢，因其是商品，不得不装潢点缀，以求销售。这是奇装异服之由来，也是化妆品能如此倾销的理由……”³曹聚仁也认为上海妇女已经彻底陷入享乐主义的陷阱，抛弃了妇女解放的本意。“所谓妇女运动，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灾祸，都已来临。上海的小市民中，所谓学校皇后，所谓交际明星，所谓摩登女郎，所谓美丽花瓶，彻头彻尾都是一种享乐主义者”⁴。于是在1934年6月10日蒋介石做出了取缔奇装异服的电令，全文如下：

南昌通讯、蒋委员长以近来本市妇女服装，炫奇斗巧，不但妨害卫生，而且有伤风化际此厉行新生活之时，自应及时纠正，特手令省府规定取缔办法，省府奉令后，业已订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令飭省会公安局暨关系各厅会知照，兹探得其办法录下

第一章、总则、一、为取缔妇女有伤风化及不合卫生之奇装异服起见，特订定本办法、二、本办法有尺寸规定规定者，以市尺为准

第二章、衣着、三、衣服分旗袍短衣二种，其长短大小，以左列为准、(一)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二)衣领最高须离颞骨一寸半、(三)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四)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短衣须不见裤腰、(五)凡着短衣者，均须着裙，不着裙者，衣长须过臀部三

¹ 萧继宗：《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2页。

² 萧继宗：《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2页。

³ 玄：《艳装与妇女》，《申报》1934年8月12日。

⁴ 曹聚仁：《一个抗议》，《申报》1933年8月24日。

寸、(ㄨ)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ㄣ)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但从事劳动工作时不在此限、(ㄤ)裙子最短须过膝四寸、四、穿西装者长短大小须参照第三条规定……¹

在这种保守主义之风蔓延的时代，国民政府要求国民发扬四维八德，极力通过纠正女性衣着将两性关系、权力结构回转到传统的模式上来，女性的衣着变成了社会主要的攻击对象，“确实的，近年来妇女的装束之标奇立异，差不多到了难以形容的境地，时而膀膊毕露，倏尔粉腿悉陈，已极时髦摩登之能事。时装企业家暨新装公司倡导号召乎上，无数小姐奶奶由尔趋竞之，一唱一和，蔚然而成这一花花绿绿的大观！既然妇女装束已经风靡一时的摹求于‘尽态极妍’的考究，势必远乎‘衣以护体’的主旨，流于令人肉麻的现象，所谓‘玄奇斗巧’，不但妨害卫生，而且有伤风化者正是”²。据报载，江西省政府奉蒋委员长手令，业已订定取缔奇装异服办法，令飭省令公安局及关系各厅会知照，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颞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开衩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等，先从女公务员，女学生，公务员家属起实行，再推行其他各地各界妇女，妇女衣着不遵守本办法者，由岗警加以干涉，如有反抗，得拘局惩处云云。同样的禁令，在不久前见之于鲁省当局，据传广西更加雷厉风行，女学生不仅崇尚简朴，且以养成当看护服工役为美德。此时的女子旗袍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态势，主要变化体现在领子上，新生活运动不仅要求国民在精神上自律，在生活中亦强调国民能够整齐划一，用服饰形势的一致和规律化来象征国家的团结，反映集体主义的精神，“衣冠整齐乃是一件最要紧的生活，而整齐之中，最简单粗浅为人人所易知易行的，就是扣扣子，我们要提倡新生活就要从扣扣子做起，使全国军民穿衣先能扣好扣子，再由扣扣子这件事，推而至于戴帽子，穿鞋子，系带子，都能整齐划一，那就是真正的军事化，外国人看了我们国民的生活和精神如此，就要敬畏”³。因此一种“竹筒式”的旗袍领子在上海滩风靡一时，“至于现在时兴之领，每次扣上，粉颈立起红痕，实可有上吊未遂之误会”⁴而这种竹筒式的衣领上，最多的时候，扣子到达了六排，这真是用具体行动回应了扣扣子的理论。而通过这个扣子，也确实起到了规训妇女身体的作用“谈必低声，后

¹ 《蒋委员长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申报》1934年6月10日。

² 宸：《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申报》1934年6月14日。

³ 萧继宗：《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2页。

⁴ 徐村：《论女子的衣领》，《论语》1934年第34期。

顾必赖‘向后转’，仰视必赖突肚，俯视必赖弯腰，左右顾必赖瞟眼斜视，以致颈节骨之转动无形麻痹，声带亦遂而变态”¹。不仅如此，短旗袍、薄旗袍也被一并取缔。民间有很多自发组织的团体，对妇女的逾规服装进行破坏，如杭州的摩登破坏团，而北京在1935年间居然也出动军警把守在戏院对“衣薄如蝉翼，裸腿不穿袜之摩登妇女”²一律驱逐出戏院，不准听戏。政府的一系列动作终于使得阴丹士林的布旗袍成为当时妇女服饰整齐划一的女装。也使得的女装的审美从新奇转向了古典。“去年，中国都市社交界中，盲目的模仿西装而制成的晚装，曾成为时装的中心，可是1934年的趣味，无疑的是摒除着模仿式的倾向而渐趋于在我国原有的旗袍美上发展了一部西服之特点者”³。也正是基于此很多服装学的专家认为1934年以后旗袍找到了自己发展该有的方向。于此同时明星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一场服饰上的全民化运动渐渐深入人心，除了前文提到的江西省作出从女公务员，女学生公务员家属起实行推广规定旗袍着装的做法以外，很多地方并没有规定女性公务员以及官员家眷的标准着装，但是从1934年以后，如约定俗称一般，很多女性公职人员都把旗袍作为了标准的着装。在董竹君女士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曾担任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的国民政府的政治红人郑毓秀，称她“穿着旗袍，戴副眼镜，说话声音宏亮”⁴而直到1946年我们从新民晚报的报导中仍然能够看到，主席夫人宋美龄女士着旗袍的靓影出现在头条。“（1946年5月4日）夫人着黑色大衣，红花旗袍，首先登主席专车，胡佛次之，主席最后……”⁵。

第三节 塑造符合社会形象的新女性

改良旗袍从它出现在上海社会的那一天开始，舆论的热点始终没有离开过它。复兴之初，大家对它的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旗袍所代表的民族性上，朱鸳雏《旗袍》诗云“玉颜大脚其仙乎？拖了袍儿掩了襦，婆婆年老眼迷糊，笑姑姑一半儿男人一半儿女；老林黛玉异时流，前度装从箱底搜，一时学样满清楼，一半儿时髦一半儿旧；错疑格格那边来，试话前朝心已灰，郎君若固四郎才，共登室，一半儿清朝一半儿汉；与郎安稳度良宵，立著灯前脱锦袍，不妨穿错在明朝，变娇娇，一半儿堂皇一半儿俏；看人眼热学新鲜，破费男人血汗钱，锦霞锻滚绣丝边，

¹ 徐杓：《论女子的衣领》，《论语》1934年第34期。

² 曾迭：《破坏摩登的重演》，《人言周刊》1935年第23期。

³ 《三四年趣味》，《妇人画报》1934年第17期。

⁴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⁵ 《着戎装披人髦 主席精神焕发 赴粤之行因故作罢》，《新民晚报》1946年5月4日。

定须穿，一半儿人家一半儿妓；果然谏语好心伤，说道男降女不降，若叫辫帅见风光，喜洋洋，一半儿肉麻一半儿憨。”¹从这首白话诗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旗袍这种满族传统服饰风行上海的无奈。当时甚至为了规避它的民族属性，在改良旗袍兴盛的初期只称它为长衫。但是朱先生的好友周瘦鹃先生则更大从美观和便捷的角度出发阐述旗袍的合理性，他认为“妇女的装饰实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袍，便觉得大方而袅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气”²。但是当时人们还是有称旗袍的避讳，孙传芳孙连帅甚至曾将扬言要废止旗袍，1926年曾有人提议称为“中华袍”³。但是这一系列名称和民族归属上的争论都没有阻挡的了旗袍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流行的脚步。或许就像有一句话说的那样，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才知道，旗袍的穿着舒适与否，也只有当时的女性才最有发言权了吧，徐郁文女士在1925年的文章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妇女对于旗袍的印象“我们女界现在所穿的衣服，大约较民国以前所穿的进步多了，当我再八九岁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与今所穿的比起来，便觉得进步不少了，何以呢？从前的衣服，长而且小，袖口不及四寸，领头倒有两寸多高，长虽然未能及膝，但足有两尺多，今则不然了，袖口有八九寸，衣长不到一尺八寸，比较以前的衣服，觉得何等的舒服呢。到了民国十年，我们女界多风行旗袍，旗袍一行，我们女界到冬天可便宜多了，自兹旗袍以后，到了去年，忽又变为长背心了，虽则产背心为我们学界所穿甚少，但是比较旗袍略有美观思想，此非我们女界外面衣服进步的证据么？”⁴并且作者由女界服装的千变万化的进步，进一步引申认为“我们女界的衣服比较男子的衣服进步来得快了，可见我们女界的好奇心比较男子来得多呢”⁵。可见服装变化表象下的深层次的含义。伴随着旗袍样式和用料的多元化，关于旗袍舆论的焦点则集中在了面料上的国货与洋货的问题上。

在最初，国货运动的赞同者大都从资金外流的角度阐发妇女热衷于着洋装对我国经济的危害，引导妇女穿着中式传统服装。“西装衣料，素以呢绒为主，惟完全来自外货，金钱的漏卮，岂非逐渐张大，实为最大憾事。”⁶而在国货年中有作者声称我国海关的漏卮为三万万两，一时间以提倡布衣国货为中心的文章在各

¹ 朱鸳雏：《旗袍》，《紫罗兰》1925年第一卷第5号。

² 周瘦鹃：《我不反对穿旗袍》，《紫罗兰》1925年第一卷第5号。

³ 《袍而不旗》，《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

⁴ 徐郁文：《衣服的进步》，《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⁵ 徐郁文：《衣服的进步》，《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⁶ 李介眉：《制西装之选择》，《申报》1926年12月6日。

大报刊中屡见不鲜。

同时以道德的标尺来约束妇女着装似乎也是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妇女服饰消费的高涨，是女性不思进取，冶容诲淫的表现，吴守拙先生的观点似乎就是很好的印证“近顷以来，世风奢侈，以致新年之中，妇女服装光怪陆离，日益触目，争奇斗艳，炫耀于市，非特靡费金钱，不免贻人非笑，值此时局多艰，民生日蹙之际，何可为此无意识之仿效而趋入奢侈之途，况冶容诲淫，古所明戒，为妇女者欲提高其人格，不为男子之玩物，则服装之宜乎大雅，尤非男子比也。”¹。但是传统道德的陈词滥调并不足以对妇女改变自身装束的行为产生约束，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本来（妇女着薄纱旗袍）这一风气是随社会之日薄？人们之乞求肉的享乐以忘掉现实而日益滋长，绝非卫道者慨叹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以所致。因此他的消减已不是局部的“风化”事态，而成为，与之密切联系的整个社会问题，我们看到以简朴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虽风涌全国，但是一点也没影响到太太小姐们爱漂亮的心，奇装异服之依然甚炽，编为显明的实例。可是现在为政者亦注意到奇装异服之伤风化碍卫生，而有取缔之举，究竟与不规则的摩登破坏团更有绝大的功德，足为此刻摩登妇女的当头棒喝”²。

在上海，年轻的职业女性群体不单是时髦摩登的追求者，也成为公众眼中摩登女性的形象。年轻职业女性的摩登形象也正好展开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公共空间，当时由大众文化刊物所构建的摩登女性的形象是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职业女性连接起来的，两者共同创造了一个供大众阅读和欣赏的公共空间。张爱玲称，三十年代女学生每人手持的《玲珑》杂志是一部传授影星美容秘诀的刊物，而类似于《玲珑》的诸多刊物比如《良友》等，也在传授女性秘诀的同时，透过文章的图片，向上海滩、向公众展现了一幅幅全新的摩登女性形象——她不再守于闺阁，而是在杂志上建立了她的公共空间，让公众阅读。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有别于传统妇女的摩登女性，有着高跟鞋及卷发这种异国情调，上海城市文化的公共空间籍由这些摩登女性形象得到拓展。各种报章不断对摩登女性的形象进行塑造和改良，对各种欧美的流行风尚的介绍层出不穷，并不断指导当时上海女性的着装和身体。对于当时什么是女性美的科学指标，当时的人也有具体的标准，1934

¹ 吴守拙：《矫正妇女服装之我见》，《申报》1926年2月24日。

² 宸：《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申报》1934年6月14日。

年的标准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大有与国际接轨的趋势。

女性指数是女性美的体格的标示，每个具有标准美的体格的女性必须有
的数字。

女性指数的方程式是

$100 \times (\text{胸廓} + \text{臀围} + \text{大腿之周围}) \div \text{颈围} + \text{腰围} + \text{手尖之周围} + \text{足尖之周围} + \text{全身长之} \frac{1}{2} - 113$ 。

即女子胸部（扩张时的），臀部，及大腿，各周围之和的百倍，以颈，腰，手尖，足尖之周围及全身长之 $\frac{1}{2}$ 即一半的和数，其所得之数，即女性指数

具有标准美的美国 Kelleman 女士的记数是胸廓 35.2 吋臀围 37.8 吋大腿之周围 22.2 吋三数之和为 95.2 其百倍为 9520

颈围 12.6 吋腰围 26.2 吋手尖 5.9 吋足尖 7.7 吋其身长 63.75 吋，其为 31.9 吋弱故其和为 84.3

9520 用 84.3 除得 112.9 强

所以她的女性指数为 112.9

据实地的检查，凡看作有标准美的女子的女性指数，都近于 113。

所以从前中国每想起美的女人时而联想到三寸……。

现在我们不能不想到 113 了¹。

《玲珑》上不时有指导女性着装和色彩搭配的文章，《衣服之美观问题》一文称“衣服的美观与否，是对于色彩上的分别。对于物质上，并没有什么重要”作者认为美的色彩有“映白、映红、湖色及淡青莲”深色的只有藏青、青莲、紫红酱等。²这些颜色是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着装中不常出现的颜色，大多是以西方的流行色为基调，因为在一篇介绍法国女子服装颜色的文章中称“白色代表少年，活泼，童贞，清白。蓝色代表真心的，永久的爱情，玫瑰色代表青春，美丽，欢乐。红色代表热情，火般的热烈和情欲”，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备受推崇的黄色则变成了不真洁，不忠信的符号³。下图是叶浅予作的 1933 年的秋装图，抽象的图案，流线的造型，是当时欧美风气在上海的反映。而下面一幅也是《玲珑》上刊

¹ 关燕生：《女性美的科学分析》，如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发行 1935 年版，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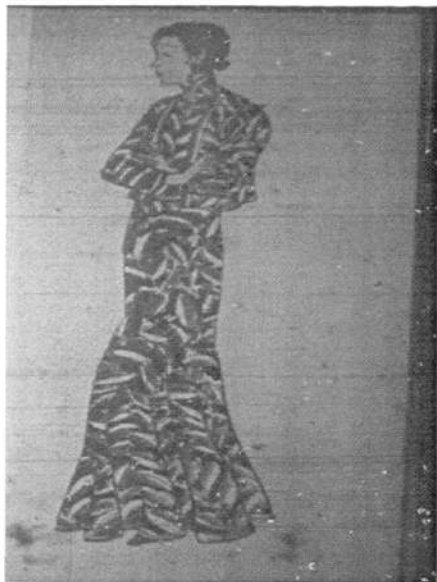
² 《衣服之美观问题》，《玲珑》1932 年 9 月第 67 期。

³ 《法国女子服装颜色》，《玲珑》1933 年 7 月 19 日第 103 期。

登的上海女中王崇慧小姐的照片，一看就是叶先生作品的翻版。但是这一切的设



图片 17 上海女中王崇慧小姐的照片。资料来源：
《玲珑》1933 年 11 月 15 日第 120 期。



图片 18 叶浅予作秋季新装。资料来源：《玲
珑》1932 年 9 月第 62 期

计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有一篇名叫《欧美妇女服装的变化》的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

欧美女子的服装，过去曾盛行过男装的倾向。可是去年底起又突然回到女性化去，这种新的服装，目的是要表现女性的柔美的曲线，最主要的改变，第一点是肩膀和领襟，领襟从低襟改为高襟，提高到咽喉的上部。第二点是肩幅的扩大，使肩部的美线十足表现与外，尤其是优美的袖，表现柔收的曲线，狭小的袖变成不大不小的袖，袖口稍微放大。全身衣裳是“衣裳连合”或加上一条修环束腰背的围带，以保护腹背的温度，又使腹部不膨胀及使背部不弯曲。且可以支持乳部不下坠，第三点，新装的裙很长，与足跟相齐，这一点与穿西装的东方女性，很有关系，因为可以遮蔽东方女性身材上的缺点。¹

随之而来的是上海的妇女也将曲线美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妇女的衣着上，上海竹枝词中有《曲线美》一文称“胸前高耸两峰痕，背后还翘一大臀，窄袖短衣双臂露，登徒哪得不消魂”²。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想象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肉欲的时代，以下是两首当时的现代诗，朦胧的语义表达直接的肉体刺激。

¹ 莲：《欧美妇女服装的变化》，《玲珑》1934 年 2 月 21 日第 131 号。

² 《曲线美》。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 页。

春之姿态美

(一)

春——高尔夫的季节。

明亮的太阳，跃动的青春。女孩子，她的脸色开着鲜花，

打了，雪白的小球飞驰去——

飞，飞，飞到青的地平线那面。

旋转了的肉体，在浅绿的背景里

呈现春之美丽的姿态！

(二)

春——横卧的季节。

无涯的青空，清淡的白云。

女孩子，她肉体包满着微笑，

卧了，长长的，卧在绿色的丝绒上——

一切都融化在童话的幻梦里。

高低的肉体之波浪，在淡红色的感觉中

呈着春之美丽的构图！¹

以服装的象形意义来引导妇女着装可谓近代服装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舆论在这一事件中起到了绝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鲁少飞认为，制作和改良新式女装必须反映了中国女性活泼的精神，是当时关于服装学说和服装舆论的创举“我记得会读过一种美国的报纸，中间有一段谈到对于中国女子的观察，他有一句批评的论调，说中国女子唯一的特性是‘温文尔雅’，我从此以后就起了一种疑问，是否我们中国的女子个个天赋没有活泼的精神么？是否我们中国的女子个个不愿有活泼的精神么？更使我疑问的是是否我们中国国民个个不愿做活泼的民族么？依我的推想，决不致于人同此心吧，因为我想活泼的精神谁也没有不喜欢的，不过我们因为受着传统的权威，把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其束缚罢了。我认为装束也是十二分要注意改良的……装束须要改良，我希望大家起来的提倡，我认定装束只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美观，一是卫生，这两个条件同一的紧要活泼”²。而对于当时风行的旗袍，鲁少飞亦认为有可以改良的地方，主要改良的趋向也是围

¹ 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² 少飞：《女子装束谈（一）》，《申报》1926年2月16日。

绕作者认为的活泼的精神在服装上的展示。鲁少飞的这一论调也受到了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一时间关于旗袍如何改的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署名擷奇女史的作者在《申报》撰文称“女子的装饰最要注意三点，是‘自然’、‘活泼’和‘色彩’否则任凭你艳装华服，总不能显出美感，现在上海女子的装束，大半都带些欧化色彩，寒季最流行的，当然要算旗袍和披肩，旗袍似乎更是来的普及，因为取他适宜大方，但是依我看来，还是不能十分完美，凡是一人必有一种形体的美，旗袍的式子本是和男子的袍子仿佛，腰部到臀部并不分出宽窄，因此着旗袍的人，就不能显出他天赋的形体美，所以应将旗袍的腰部，做的略微比臀部小些，方才觉得体态婀娜，举止活泼，旗袍的颜色，最好是黑、枣红、杏黄等色……”¹同时鲁少飞亦以为“中国女子装束，尚有一流行之习惯，盖一新装束出，则全社会无论贫富老少，皆竞相因袭效尤，故结果必致互相雷同为止”²。因而中国的女性着装缺乏独特性。而一位署名癡狂生的作者亦声援此种说法，称“西国妇女礼服，茶会、看戏、赴宴各有其式……美国富家女子，衣服每喜更新，即寻常女子，服饰亦年月百变，同一茶会跳舞，女子数百人，衣服鲜有同样者”³。同时作者认为造成这种不同性的原因是不同社会条件下女性思想的差异导致的，“西洋女子的生活是社会性的，伊们常常合着一大群在一起，所以伊们的服装，在单独出来的时候，在中国人眼光里，或者诧为奇特，但是到宴会场，跳舞场去看看，却如百花齐放，牡丹、芍药、桃、李、兰、梅各有其诱惑的趣味，中国女子度惯了单独生活，思想上充满了个人主义，所以着衣服时候，只要顾到一身，在单独的时候并不觉得不调和，而集合起来觉得色彩相近，式样雷同，甚为单调，或者是缺少创造性的缘故罢……”⁴。

但是传统的道德论调消失之后，一股新的用道德标尺衡量妇女运动成败的思潮却又悄然兴起。他们认为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为商品，在社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妇女解放运动失败的标志。而以旗袍为代表的服饰，是女性这种地位的典型标志。“近代的女人，随着生活程度提高的情形之下，益形被视为玩物和娱乐的器具，短衣变为旗袍，短袍一翻又变为长袍，因为这是适于舞蹈，闲步做男人伴随的，这些进步正是相反的是进步的障碍……女子在这个社会里脱不掉商

¹ 擷奇女史：《女子新装谈》，《申报》1926年3月10日。

² 少飞：《女子装束谈（四）》，《申报》1926年2月23日。

³ 癡狂生：《西妇之刺绣与衣服》，《申报》1926年5月21日。

⁴ 癡狂生：《西妇之刺绣与衣服》，《申报》1926年5月21日。

品的资格，所以她们的服装以博取美感为条件……现行的长旗袍我是反对的，因为迷醉男人的双腿同时也是表现女人美的曲线被掩盖了，不能让她自由的摆出来任人欣赏，这些都是女子的权威，决不应把她埋没。”¹也有人认为“妇女装束之“炫奇斗巧”，让那些唯美主义先生们去誉为社会文明的表现罢，我们若稍微仔细的考察他所表示的社会美意，则其结论不能不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过是女子主观的要这样趋时髦摩登么？又确乎未必。中国目前是整个国民经济破产动荡骚乱的社会，而在这破产动乱的过程中，则又分成两个绝相悬殊的阶级。上之是养尊履厚骄奢淫佚的生活，一双结婚皮鞋花去几百番，洗澡一次牛奶数桶，毫不为奇，至于无数打入饥饿群中的妇女，一方面是极端极端贫困使能够“成家立业”的男子减少，坤象过剩，一方面则因这许多妇女感于经济的压迫而被提到人肉市场来，供一般“色情狂”的去泄欲。前者为要争夺“三大两小”的专房宠幸，后者为要将货色打扮的以广找来，于是一肌一容尽态极妍，此妇女奇装异服之所由风靡也。基于此，作者认为“欲求妇女奇装异服之取缔禁绝，首先得根本上消灭妇女用此以取媚逢迎男子的心理，欲求妇女这一心理的除去，则赖乎事先将造成妇女纵欲享荣和肉体拍卖的社会基因予以废止”²。

但是一种更新的关于上海流行服装的论调，则将服装与民族特性结合在一起，“东方的服装，长襟大袖，并不见得怎么不适体，这就表现着东方文明中笼统和混沌这些精神，西方的服装，每人依着各自的线条制裁，务求其十分切贴，这就表现着西洋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和科学精神”³，因此作者认为上海妇女的新旗袍是一种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折射，但是关于中西方传统服饰到底谁更文明的问题，似乎林语堂并不赞同上面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服装哲学上之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因为能够表扬其身体美，西装比较适合青春美丽的女子穿着，但是对于又老又胖的女子，穿着西装露胸背，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但是这种妇人若是穿起中装便可以藏拙，占了不少便宜，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所以作者认为中装很符合德谟克拉西（即民主）的精神。作者认为中装代表的是自由与民主。并且作者认为，中装中服因为它蕴藏着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所以与中国人的气质性格是十分吻合的。而西装，尤其是男装，领带，领结的束缚，使得人的身体变的不自由，也不符合卫生学的

¹ 毓白：《谈谈提倡短衣的问题》，《申报》1932年1月4日。

² 宸：《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申报》1934年6月14日。

³ 二闲：《文明的象征》，《申报》1930年9月30日。

要求¹。

近代上海是一座商业气息和文化气息都很浓厚的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征也体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文化”特色。改良旗袍即是中西服饰文化交融的结果。近代上海社会中由文化决定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导致了改良旗袍的滥觞。人们在这种社会审美心态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改良旗袍代表都市的自由、繁华的心理认知。改良旗袍的样式与色彩也完全融入到上海社会生活的每一根线条中。改良旗袍出现于近代上海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体现了近代上海独特的风情和现代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女性的着装习惯，成为重塑上海市民性格的符号，并且因其独特的东方特性使得它的生命力至今不息。

改良旗袍时尚的背后有着传统的底色。近代上海市民一方面表现出对时尚和新潮的追求，一方面也固守着传统的文化。改良旗袍在展示时尚梦想方面走出一大步，同时，其保守封建性也是一览无余的。总之，近代上海市民对时尚的追求及其个人身份塑造的用心，在改良旗袍上昭然若揭。

¹林语堂：《论西装》，老品选编《名人笔下的衣食住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4 页。

结 语

服饰的变化是社会变动的重要指标。近代上海时尚的形成，反映在服装上最为明显。城市文化的时尚是这一时代主题，旗袍创新和改良使得近代上海社会弥漫着一股时尚的气息。诚如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所言：“一部服装史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¹。改良旗袍的变化可谓是近代上海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个体的服装选择和品味是一个人个性特点和心理特点体现的体现的话，那么群体服装风尚则可看做是社会文明和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一 改良旗袍的复兴与变化 法国作家法朗士曾经感慨地说：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中有所选择，我不想选小说，亦不选历史，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我仅要一本时装杂志，看我死后一世纪妇女如何装束。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以及学者。进入近代以来，上海妇女的装饰较男性装饰变化更加频繁，受社会风尚的影响也更加明显。改良旗袍的制式最早产生于 20 年代中后期“华洋杂处”、“名媛云集”的上海，亦可谓是上海时尚、妇女审美观念、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真实写照。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欧风美雨浸染的国际都市，因为家庭的收入增加与消费需求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成长等因素，使得社会经济与思想观念上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包括时装观念的普及、流行时尚的盛行等等。近代上海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得原来被视为贵族奢侈品和专用品的东西，逐渐成为庶民的日常用品。前代的服装变迁行为大多只局限于上层社会的极少数人，只有宫廷社会才有能力把某种新奇服装变为时尚，然而近代上海的时尚风气却普及到社会的中下层，时装的流行及时尚消费已经脱离了日常穿戴的层面，人们不只固定于喜好某种类型的服装形式，而是不断地追求变化和美感，并因此引领了服饰平民化的风尚，这是近代都市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旗袍在满清一代统治时期，因为制度的保护与礼仪的要求，成为了代表宫廷高贵与优雅的符号，成为了满洲人维护和突出自己权威和特性的文化因素。近代以来，因为有许多下层社会的人们模仿这种在前代属于上层阶级的着装行为，逐渐使得政府规定的身份等级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特许服装制

¹ 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 世纪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卷一，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367 页。

度，走向瓦解。同时作为近代化和带有革命意义的符号语言，改良旗袍又引领一种服饰平等化和革命化的符号，这两种符号语言的交融，促使改良旗袍逐渐在上海社会中风行起来。改良旗袍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时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服装变化与身份认同的矛盾 衣服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一种身体的语言，讲述的是一个“心理—生理—社会—政治”的故事。本来女性解放运动可以为走在革命前端的上海女性提供认识自己的好机会，但是在中国社会中，“社会革命”的恶性膨胀却又使她失去了良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仅仅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社会革命这一性质的突出化和极端化，使得女性淡化了对男性批判同时也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社会革命吸引了女性所有的注意力，女性在社会革命中完全进入角色，她们的眼睛关注的只是庞大的社会，看到的只是社会舞台上的人物和事件，而没有注意到隐藏在幕后的社会戏剧的实际导演者——男性，没有认识到男性是社会制度非合理性的真正肇事者。社会革命给女性套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使女性的精神视觉产生了对男性的色盲。而使男性批判趋于淡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使男性成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主体，成为了女性解放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领导人，因此作为革命参与者的女性是不会批判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的，她不仅不会批判男性，而且在她内心里还对男性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社会革命是一个过滤器，它清除了男性的污垢，留下了男性的洁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男性在中国女性的心目中始终是神圣的，崇高的，中国女性似乎很少用质疑的眼光去注视男性，她盲目相信男性的一切。男性批判的淡化导致了女性解放价值尺度的偏离，女性把男性作为自己的楷模，以男性的尺度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解放，而这正是“男人能办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办到”能为广大女性所接受，并被奉为“女性解放宣言”的心理基础。这是上海女性在职业生活中无法逃脱的宿命，当她们在职业中遇到挫折时，她们的苦闷的仅仅是自己的性别，她们内心里希望的是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样，她们努力把自己的形象向男性靠拢，改良旗袍的盛行正是这种盲目崇拜心理的折射，长袍是传统社会中有知识、有能力的男性着装，在近代时装的舞台上，在中山装、西装的冲击下，它仍然保持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深度的东方内涵使得它拥有坚定的中老年拥护者。与西装的刻意和坚挺不同，长袍马褂在穿着的舒适性上显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这身服装略显保守的风格，似乎也暗示了它的主人具有温厚可靠的个性。尤其是商场或政坛上，身着长袍马褂面带笑容

的中年人，似乎比身着西装，头发油亮，讲起话来不给人喘息之机的小伙子更可信一些，更容易得到对方的信任。近代上海的繁华为广大妇女提供了一个进入社会的机会，职业将她们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们彻底摆脱了闺房的束缚，打扮妥当，自信满满地迈步下珠楼，她们呈现出了传统中国女性从未有过的自由活泼的态势，她们追求与世界时尚同步，不断在穿着上追赶西方的步伐，但是上海社会发展的不健全性并没有充分给大部分女性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反而把她们推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家庭中她们的处境都很尴尬。她们的学识并没有足够的用武之地，无可奈何的再次沦为被欣赏和被消费的角色。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安全感和保障感的丧失是近代上海女性职业化带给她们的重大现实困境，这种现实困境与妇女渴望社会的身份认同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旗袍乃是这种矛盾心态的折射。近代上海女性是一群自由的人，通过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获得了自由的身份，同时她们也是一群失去了保护的女人，她们穿上盔甲在男人的世界里奋斗，她们的幸运与不幸，她们的忧思与欢欣，无不明显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她们，投向那个正在一天天扩大的独特的女性世界。从外形看改良旗袍这一服装样式处处流露着矛盾。领子高耸而圆润，密不透风，紧束的腰身，当时上海妇女的一种独特的寻求“自卫”的心态在服装中的具体折射。而其高开衩的下摆，透露着近代上海女性所特有的追求开放和性感的形态，也是对社会给予她们花瓶地位的无奈回应。它让女性的一双腿在若隐若现中闪射出无穷的撩人风韵。这样的美，使得上海女性平添了几分奔放，在稳重里又增加了几许妖冶，在娴静中又洋溢着不少妩媚。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为时尚和开放的性格在妇女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

三 时装与社会生活 服装是群体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要载体。改良旗袍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折射出在近代上海人身上传统与现代观念激烈碰撞的服饰符号。改良旗袍将东方传统和西方摩登风格混为一体，其朦胧性感而又矛盾的文化语义，代表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文化和上海社会本质上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是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社会的独特符号化语言，必须将改良旗袍放置在上海社会和文化的特殊语境下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旗袍特有的文化语义。从改良旗袍的中西合璧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上海社会在东西方文化取向中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改良旗袍之所以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也是东方与西

方，传统与开放，不断斗争的结果。上海的旗袍体现了纷繁的都市生活，它的样式与色彩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根线条中去了。大都市的富有、梧桐树下的外国情调、白领阶层的悠闲、交际花们的手段，都渗透着旗袍的情影。改良旗袍复兴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都是不可忽视的。在民国上海旗袍改良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政府的力量主要通过政策或者服装决议对着装进行调整。在改良旗袍变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始终贯穿其中，影响并左右着改良旗袍制式和材料诸方面的变化，政府的力量通过控制妇女衣着的款式实现着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和约束，以此来塑造符合新时期社会角色的女性形象，政治斗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态势越来越多的在旗袍中得以展示。而妇女也通过或反抗或迎合的态度来实现自身与社会的互动。与政府的角色塑造力量不同，舆论的力量也在从不同的角度加强对角色塑造和对妇女时尚认知的影响。改良旗袍所代表和折射出的活泼多变的文化语言迎合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妇女身份的期许，使得它最终从“奇装异服”走上了“国服”的神坛，并影响和左右了几代人的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 白云:《中国老旗袍 老照片老广告见证旗袍的演变》,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年版。
- 包铭新等:《世界服饰博览 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
- 包铭新:《近代中国女装实录》,东华大学出版 2004 年版。
- 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 1971 年版。
-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大华出版社 1974 年版。
- 包天笑:《上海春秋》,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
-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 2001 年版。
-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 1998 年版。
- 陈红民:《中华民国史新论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
- 程乃珊:《上海探戈》,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
- 程乃珊:《上海 LADY》,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 初旭、马清福、许科甲、李哲:《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晨报》,辽宁教育出版 1996 年版。
- 初旭、马清福、许科甲、李哲:《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大公报》,辽宁教育出 1996 年版。
- 初旭、马清福、许科甲、李哲:《旧事重新闻民国十大报文摘中报》上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 戴云云:《上海小姐》,上海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
- 樊树志:《上海谭 乌泥泾——绌布二物,衣被天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费著撰:《蜀锦谱》,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葛元煦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 葛元熙编著:《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 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
- 顾建华:《衣食住行话文明·服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费正清、章建刚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912 — 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郭建英绘,陈子善编:《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妇人画报社编:《美之创造——美容与时装》,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 哈瑟:《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 1842 — 1937》,文海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篇》，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华梅：《服饰社会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版。

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版。

华梅：《服装美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版。

胡祖德著：《沪谚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姜水居士：《上海风俗大观》，上海新华书局 1922 年版

江晓敏、王淑贵、张利民：《老新闻—民国旧事(1912—1915)》，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蒋为民：《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兰奇·佩尼：《世界服装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商务印书 1936 年版。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 2001 年版。

李少兵：《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维清著，吴健熙标点：《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秀莲：《中国化妆史概说》，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贞德：《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子云、陈惠芬等主编：《中国百年女性形象—美镜头》，珠海出版 2007 年版。

梁立诚等：《民国名人罗曼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9 年版。

刘国联：《服装心理学》，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5 年版。

刘业雄：《春花秋月何时了：盘点上海时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云、黄诚等：《老新闻—民国旧事(1920—1923)》，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云、周俊旗等《老新闻—民国旧事(1928—1931)》，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陆满平、贾秀岩：《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2 年版。

《民国春秋》编辑部：《民国艺苑风景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罗苏文、宋钻友、许敏：《上海通史》第 7 卷，上海人民出版 1995 年版。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罗兰·巴特著，敖军译：《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罗玛：《开花额身体：一部服装的罗曼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玛格丽特·米德著，宋践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马国亮：《良友忆旧—一个画家与一个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莫振良、汪寿松、滕兴成《老新闻—民国旧事(1932—1934)》，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南静子：《巴黎近代服饰史》，艺风堂出版社 1990 年版。

南兆旭主编：《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湾出版社 1998 年版。

鸥守机：《上海闺秀：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潘君祥、王仰清：《上海通史》第 8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普列汉诺夫著，曹葆华译：《论艺术》，三联书店 1973 年版。

苗莉，王文革：《服装心理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

原田二郎著，丹野郁等译：《西方服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服装讲座》，展望出版社 1981—1984 年版。

上海市戏曲学校中国服装史研究组：《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

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上海风土杂记》，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932 年版。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三）—行业写真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年版。

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1934 年》，申报年鉴社 1934 年版。

施莱贝尔：《羞耻心的文化史》，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沈从文，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 32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宋家麟：《老月份牌》，上海画报出版 1997 年版。

舒心城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

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唐纳德·雷诺兹、罗斯玛丽·兰伯特、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王芳、石仁主编：《百年老照片第一册》，经济日报出版 1997 年版。

王儒年：《欲望的想像：1920—1930 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汪寿松、周俊旗等：《老新闻—民国旧事（1916—1919）》，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宇清：《中华服饰图录》，世界地理出版社 1984 年版。

吴红婧：《职场丽人》，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台湾）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中华袍服织绣选粹》，1977 年版。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清代服饰展览图录》，1986 年版。

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中国图书杂志社 1948 年版。

夏衍：《包身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先施公司编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版。

谢其章：《老期刊收藏》，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年版。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 1929 年版。

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 1930 年版。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叶立诚:《服饰美学》,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年版。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禹燕:《女性人类学:雅典娜一号》,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袁杰英,沈菱:《中国旗袍》,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年版。

伊丽莎白·赫洛克著,孔凡军等译:《服饰心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巫仁恕:《品味奢华 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吴友如、庄子湾:《海上百艳图》,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赵平、吕逸华:《服饰心理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5 年版。

赵英兰:《民国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韩:《图说民国一百年叱咤风云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竞琼:《现代中外服装史纲》,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竞琼:《“西”服“东”渐,20 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乃仁、杨藕琪:《外国服装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张耀铭:《娼妓的历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郑嵘、张浩:《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4 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朱剑等:《民国影坛》,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朱谦甫:《海上光复竹枝词》,民国第一图书局 1913 年版。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论文类

包铭新:《20 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艺术设计双月刊》2000 年第 5 期。

卞向阳:《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陈婷:《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追述民国年间旗袍发展》,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年。

勾爱玲、赵凯:《浅谈旗袍的发展与审美》,《美与时代》2004 年第 8 期下。

郭斐:《从旗袍的变革看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走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郭慧娟:《民初京城旗袍流变小考》,《民艺之窗》2004 年第 7 期。

郭守运:《“病态美脚的文学呈现与指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9 期。

郭晓霞:《史话旗袍》,《美与时代》2004 年第 10 期下。

何晏文:《关于民族服饰的几点思考》,《民族研究》1994 年第 6 期。

胡敬萍:《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1 年第 1 期。

胡克庆:《旗袍——永远的时尚》,《武汉文史资料》2004 年第 2 期。

黄强:《变化中的时尚风景——百年女性服饰回眸》,《江海侨声》1999 年第 17 期。

黄展骥:《新旗袍的小风波及“余波”》,《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02) 年第 2 期。

姜长麟:《女学生的服装问题》,《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期。

李子云、陈惠芬:《谁决定了时代美女?——关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之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 年第 6 期。

乐正：《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文史哲》1988年第6期。

李健鸿：《身体与消费文化》，东吴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

刘建萍：《面料热塑性对旗袍塑型方法影响的研究》，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林育如：《「贩卖玩美」：女性身体意象于影像艺术表现之创作》，高雄师范大学视觉设计学系硕士论文2006年。

吕枫韵：《试论女性服饰文化的流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

邱丽珍：《女性杂志美容美体论述的结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家政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桑梓：《话说旗袍》，《中国对外贸易》1995年第3期。

宋晔生：《旗袍》，《上海工艺美术》2000年第2期。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第6期。

万芳：《民国时期上海女装西化现象研究》，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王国桓、陈宏、刘红弦：《旗袍的演变和流行》，《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吴家翔：《解读美体瘦身广告的身体形塑意涵》，世新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吴健陵的《重爱/宠爱身体——身体书创作与教学的行动历程》，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

吴珮琪：《解读少女杂志广告中的美貌迷思》，（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

夏惠芬：《旗袍小史》，《龙门阵》1992年第6期。

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年第3期。

阎玉秀、金子敏：《旗袍造型演变探讨》，《丝绸技术》1996年第4期。

张浩、郑嵘：《旗袍》，《说古道今》1997年第1期。

张阅：《中国女人：性感旗袍介于掩饰与暴露之间》，《南方周末》2004年4月。

张宏：《女性美审美标准的演变和时代特征》，《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10期。

郑逸梅：《服御之变迁》，《纺织染工程》1946年第4期。

周汛：《中国服饰的演变历程》，《上海艺术家》1996年第3期。

周爱红：《中国旗袍文化研究》，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周怡君：《化妆实践中女性认同的构成》，（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

期刊报纸类

《良友画报》，良友印刷公司1926年。

《妇人画报》，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22年。

《玲珑》，上海玲珑杂志社1934年。

《美术生活》，美术生活杂志社1934年。

《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出版社1932年。

《上海生活》，上海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部发行1935年，

《上海漫画》，上海漫画社1928年。

《申报》，上海申报馆 1872 年。

《申报月刊》，上海申报馆申报月刊社 1932 年。

《申报（图画周刊）》，申报馆 1930 年。

《新女性》，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 上海 开明书店发行 1926 年。

《永安月刊》，永安公司永安月刊社出版 1939 年。

《战时生活画报》，健康生活社 1937 年。

《紫罗兰》，紫罗兰月刊社 1924 年。

《永安公司时装表演特刊》，永安公司永安月刊社出版 1936 年。

后记

在本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最想告诉我的父母亲人，我即将毕业了，感谢你们多年的教育与培养。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洪煜先生对我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洪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从开题报告的修改、论文的架构拟定到最终定稿，他给予了殷切的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无论是在论文的选题、构思和资料的收集方面，还是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成文定稿方面，我都得到了洪老师悉心细致的教诲和耐心无私的帮助。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组的全体导师们，他们是唐力行老师，苏智良老师，徐茂明老师，邵雍老师，周育民老师，邢丙彦老师，吴强华老师和高红霞老师。感谢你们在百忙中抽时间为我传授新知识、新理论，巩固我们学习的基础。在论文的开题阶段，各位导师都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同时要感谢学院领导为我们用心提供的教学硬件资源和如此好的教学导师，感谢他们对我三年的悉心培养。也感谢学校图书馆、文苑楼资料室，阅览室等所有为我的资料搜集提供过帮助的工作人员。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朋友。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宝贵建议及相关素材的提供，对我来说都是我莫大的财富。你们的指导与帮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在学习期间，得到马瑞老师以及众多师兄师姐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马老师在过去的三年中给予我的在学习在生活中的很多的关怀。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学位论文的。

以上是我发源于内心的最真挚的感谢，在我的毕业论文的最初和最后的所有时间内，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人们。